

19846

论民主社会主义

(译文集)

[联邦德国]托马斯·迈尔等著

刘芸影等译



200128003

东方出版社

论民主社会主义(译文集)

LUN MINZHU SHEHUI ZHUYI

著者/[联邦德国]托马斯·迈尔等

译者/刘芸影等

封面设计/倪天煦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32 印张 8.25 字数/168,000

版次/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900

 **东方出版社**出版 书号3453·10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定价1.40元

(只限国内发行)

DG74/16

出版说明

本书收录了三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著。

本书汇集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简要地介绍了民主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民主社会主义的论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异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基本价值观念、社会党当前面临的问题、社会党国际和第三世界的民主社会主义等,对了解和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民主社会主义的

三十六个论点[联邦德国]托马斯·迈尔(1)

民主社会主义[法]雅各·德罗兹(137)

社会民主主义[美]卡尔·兰杜埃(225)

民主社会主义的 三十六个论点

托马斯·迈尔 著

刘 芸 影 译

导言

第一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则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国家观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道路、目标和根据的两种不同看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节 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改良的基本思想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分裂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第一节 社会主义必须靠斗争来争取

- 第二节 社会主义：一个漫长的进程
- 第三节 社会的分化
- 第四节 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动机
- 第五节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
- 第六节 经济的民主化
- 第五章 今日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概念的各个不同方面
 - 第一节 走向哥德斯堡的道路
 - 第二节 今日民主社会主义
- 第六章 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
- 第七章 社会党国际和第三世界的民主社会主义
 - 第一节 社会党国际
 - 第二节 第三世界的民主社会主义

导 言

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是要建立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在其中生活和工作并且享有自由、相互关心和平等权利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组织劳动，实现劳动收益的平均分配，从而为所有的人提供保障和平等的机会。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可以成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但并非必然如此，今后的事态发展，也有可能证明它们是障碍。

在德国，就象在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人们直到不久以前还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工业化的全面实现，认为只有全面发展一切技术和经济可能性，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就是：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消灭阶级，扭转劳动的异化和保证所有的人的平等自由权利。由于工业化占有首要地位，这就导致欧洲中立主义的建立，而且直到前几年，欧洲中立主义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今天，工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在许多部门都受到自然界、社会和人的限制。它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照现在的路线继续追求工业的发展，已不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而往往会损害这些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国的社会党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所信奉的

原则,并且比不久以前更加懂得,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继续提高国家的富裕程度。一个无愧于人类的社会不可能是自发的工业发展进程的副产品。只有通过自觉地重新组织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会诞生。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决定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社会主义不是要个人受别人的统治,而是要个人决定自己的行动。只有通过团结互助才能实现人人自决。自决的前提是政治、工作和教育领域的共决权得到有效的行使。自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它适用于一切领域。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目标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保障财富的公平分配。通向这些目标的途径将因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工业国家的现有条件而异。

今天,发达的工业社会愈来愈懂得技术和工业发展的限度。他们日益意识到过度的、无控制的工业化,有害于人们在合乎人性的条件下共同生活的机会。那些认为第三世界只有仿效工业国才能进步的人们已经几乎变得哑口无言了。合乎人性的社会的实体,并不是仅仅依靠它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水平,这个事实正在变得明显易见。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他们必须谨慎地对待技术成就。生活在工业国家的我们正在发现,我们可以从文明古国的社会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以下各章将追溯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的演变,以便使它的目标和经验能为人们所理解。这些章节不是描写德国社会主义的历

史,但将概述它的基础和宗旨。为此,只在有助于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地方才提到它的历史发展。

第 一 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论点一：民主社会主义是建立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在这种秩序下，所有的人都能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的组织而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

这句话总结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从诞生到现在，始终忠于这一原则。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实现这个目标的组织结构和机构制度的想法起了变化。为争取使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人都能获得平等机会，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共同工作而进行的斗争，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原动力。一直到今天，欧洲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仍然以这个目标为中心。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了强调它的开明性，把自己的纲领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做法始于列宁把他那种一党绝对专政的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概念有任何变化，而只是强调社会主义历来以民主原则作为基础。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社会主义是近代史上自由党人的自由权利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延伸。社会主义使近代的自由概念摆脱资产阶级财产权对它的限制和歪曲。自由党人主张不论出身如何，人应享有自由权利，但是他们只让社会上拥有产业和受过教育的阶级享有这一权利。社会主义要使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所有人都能实际享有自由。它把自由党人的自由权利运动看成是争取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并把这个运动的真正成就纳入自己的纲领。

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到工业革命

在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社会秩序都脱胎于封建主义，政治结构则脱胎于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不平等的世袭权利和义务。社会分为几个等级：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低于这些等级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多数农民依附于拥有采邑的贵族，不得不终身无偿地为贵族服务。市民只得到贵族授与的少数权利。

当时占优势的意识形态为世袭的不平等辩护的论据是：世袭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天生的不平等。不平等、农奴制以及不同等级之间的鸿沟，看来就象是自然界甚至是神圣的事物规律在社会上的真实反映。

这种制度对国家的经济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后果。几百年

来农业生产的方式几乎一成不变。其特点是受奴役的农民被迫进行无偿的劳动。农民不得不进行无偿的劳动，而这种状况又以法律为后盾，这个事实使农业生产的进步成为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制造业几乎全部由工匠经营，除少数例外，他们都参加行会。所有的工匠师傅都受到各自行会的束缚，所有重大决定都由行会作出。没有一个工匠师傅可以无视行会的规章，除非他享有直接由君主授予的特权。行会执行支配社会需要和工匠生活的传统准则，确定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它们决定每一个行业应雇用多少工匠及其生产方法，往往还决定工资和价格。

因此，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个人受到束缚、相互关系和传统僵化、生产力受到桎梏的一种制度。当时的秩序具有约束性，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种制度把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格兰开始的产业革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那个时代的一些开辟新天地的发明，如蒸汽机、织布机和纺纱机等，可以干上百人的活，但是行会制度的障碍使它们长期在德国得不到推广。

在德国，就象在大多数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种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是专制统治的制度。一切权力都属于君主个人。这种权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在两个方面成为绝对的。在这个过程中，贵族过去享有的政治特权逐渐受到削弱，直到十八世纪末。人民对影响自己的任何决定都没有发言权，统治者用不着尊重任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君主纯粹依仗这种权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借助于宗教上的托词，可以随意干涉臣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个人没有任何受到保护

的权利。统治者的侵犯及其行动的后果实际上是 无法 预测的。因此,专制主义既危害人类的自由,也同样危害任何长期的经济预测。它是私人企业发展的障碍。

自由主义作为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

自由主义是从十八世纪起反对欧洲封建制度和专制统治的伟大的、渐进的争取自由权利运动。开辟道路的是人道主义的哲学和启蒙运动,这两者从人的理性出发,推论出所有人享有天生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利。个人享有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这就是政治上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基础。这些字眼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后来又逐渐成为其他欧洲国家自由派资产阶级要求根本改组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口号。当时自由的意思是指人有权自决,平等则强调个人有权享受自由。而博爱则被认为是整个人类的所有成员互相协助的自然表现。

自由主义社会的国家和经济

自由主义的政治准则是:既然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和自由的,那就只有整个社会才有权使用政治权力和规定政治权力的目标和限度。任何政治权力都不应当是绝对的。政治权力必须服从各种规则和法律,而规则和法律只能由处于政治权力管辖下的个人来制订。这种信仰要求制订宪法,要求由议会监督政治权力,而且要求全体公民不问出身如何都能参与这种监督。政治权力要以受它管辖的人们的意志为基础,这样的政治权力决不能侵犯受其管辖的人们的天赋权利。

因此,从那时以来,不容剥夺的人权和公民权一直是所有自由派宪法的核心。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对法律的信任以及政治行动的可预测性,一直是自由派立宪国家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从其基本原则引伸出一种社会秩序,其主要特点是进行贸易和拥有财产的无限自由。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而不受社会或国家规定的限制。私有制和自由处置个人财产的权利是这种自由的经济发展的基础,甚至被列为天赋的人权。

以无限制的商业自由为基础的经济,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其他协调个人决定的手段。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看来,自由竞争及其后果是一种和谐的经济制度中的自然法则,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每个人享有自由、所有人得到公正的待遇和社会的进步,都将自动和妥善地融合在一起,而不会有摩擦。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支柱

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职业者和许多公务员,从这种新秩序中看到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丰富他们的生命的新机会。他们因而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但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纲领也使下层阶级产生希望,其结果是有些人甚至愿意为达到自由主义的目的而在革命斗争中冒牺牲生命的风险。

在欧洲,自由主义纲领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的程度和取得的进展各有不同。在德国,自由经济秩序到十九世纪中叶时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这时,它的真正后果却以出

乎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象以往在其他国家中曾经发生过的情况那样。

论点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再次把社会分成阶级。

这种分化确实不再是世袭的，也不是由法律规定的，但它事实上是存在的和有效的。这种制度只给少数人，即有产阶级，兑现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诺言。绝大多数的人，那些没有财产的阶级，发现自己仍然处于依附的、不平等的和被剥夺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处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者可以不受阻挠地发扬他们的经济自由和取得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开始拥有政治势力。在德国，很长时期内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拥有政治势力。

但是对人数日益增长的绝大多数人即不拥有财产的工人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开辟的新时代中，他们的实际处境同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诺言却愈来愈背道而驰。他们作为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因而不得不为吃不饱肚子的工资而劳动，其结果是他们的妻子甚至小孩都被迫为了生存而在工厂中的非人条件下劳动。他们完全受工厂主的摆布，由工厂主决定他们的全部劳动条件，从工时、劳动性质一直到工资的多少。在工厂里，大多数的工人只是他们操作的机器的附属品。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经过可以长达十六个小时的劳动回到家中时，已精疲力竭，无法过满意的家庭生活。因此，经常性

的过度劳动决定了他们的整个生活。而且,尽管工时过长,许多人仍然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供应自己和家庭的衣食。如果他们由于生病或年老而失去劳动能力,他们就得不到任何保障。许多人没有钱看病。他们离不开私人的施舍,否则他们就死亡,而这种施舍绝不是靠得住的。

在德国,一直到 1870 年,才允许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而组织起来。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工人才赢得建立工会和政治组织的权利。即使在他们赢得了建立政治组织权利的地方,其成果也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

论点三:资产阶级并没有把自由主义立宪制的思想发展到完全的民主制。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它都支持一种不是按公民人数计算选票,而是以收入和财产作为标准的议会制度。

例如,普鲁士直到 1918 年还在实行的选举制度规定,一个人缴纳的直接税愈多,他拥有的票数愈多。在有的选区里,一个工厂主拥有的票数多于为他工作的几千名劳动者。

论点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财产的阶级大多数人没有自由,没有平等,也没有博爱。新的阶级分化出现以后,要把自由主义的纲领作为整个社会的纲领,那是必然要失败的。社会主义是历史对这种矛盾作出的回答。社

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要求建立一种以平等的自由和公民团结互助为基础的社会,使社会摆脱一切由于财产所有制而产生的限制。社会主义希望通过团结互助和把社会组织起来而使一切人享有自由。

人民只有在政治上、在社会中和在劳动领域里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对他们才成为现实。自由首先意味着摆脱贫穷和匮乏。没有社会保障和足够的收入,自由仍然是空话。

第 二 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则

论点五: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把所有人的自决权变成现实。如果人们忙于互相争夺,那么自由就不可能对所有人成为现实,因为最强者会占上风。只有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平等的自由权利才是可能的。仅仅取消法律上的障碍,还不足以确保平等权利。新的特权可能取代法律上的障碍。事实已经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阻碍自由的一种特权。因此,这种特权必须取消。

平等权利和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机会要求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公平地分配共同生产的物资和所有人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

都有发言权。只有通过把社会组织起来，才能达到上述两个目标。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斐迪南·拉萨尔（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写道：

“贵族们认为个人的地位取决于特定的血统和社会地位，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则认为任何这样的法律限制都是不公正的，个人应完全被当作个人来看待，个人应当得到的唯一保证就是不受阻碍地证实他作为个人的能力。如果我们天生都是一样的富有，一样的聪明，受到一样的教育，那么这种道德观念就足够了。但是由于这种平等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并且由于我们出生的时候不仅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在财产和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又造成受教育的差别，因此，上述的那种道德观念就不够了。因为如果除了保证个人不受阻碍地证实自己的能力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保证，那么必然导致弱者受强者的剥削。因此根据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仅仅保证个人不受阻碍地证实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在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译者

个遵循道义原则的社会里，上述保证还应加上利益上的协调一致以及共同的和相互的发展。”^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1869年社会民主工党的共同创始人，曾多年担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写道：

“如果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可能有平等的政治自由……促使（工人们）去赢得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动力，是希望在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帮助下得到经济上的独立。对工人来说，如果他照样挨饿，如果他的处境得不到改善，如果他继续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劳累终生而只能在贫困中死亡，那么仅仅享有政治自由又有什么用呢？……社会民主主义把建立经济平等作为它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在完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创建国家和社会。在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损害其他人的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平等权利受到侵犯的地方，自由就不复存在。”^②

第 三 节 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缺陷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表明，只要生产资料受少数人控制，那就不可能实现所有人都能享受的自由，也不可能

① 斐迪南·拉萨尔著：《科学与工人》，见斐迪南·拉萨尔《演说和文稿》第22页，1970年慕尼黑弗里德里希·耶纳切克出版社出版。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我们的目标》第19—20页，1919年柏林出版。

公平地分配共同生产的货物。生产资料的私人（专制的）占有，立即导致无产的雇佣劳动者被剥夺权利和受到剥削。他们在有关他们的劳动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工厂主拥有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同工厂工人争取自由权利的要求是直接对立的。从整个经济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大家生产的财富不平等地集中在少数掌握经济权力的人手中，因为工资和物价也是由他们这些人决定的。

私有制本身也是全面的经济计划和协作的障碍。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其后果就是大批失业和生产力的浪费。

按照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看法，国家无权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其论据是：国家的干预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威胁个人自由。因而自由主义的思想阻止社会对经济进程和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它阻碍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的分析的结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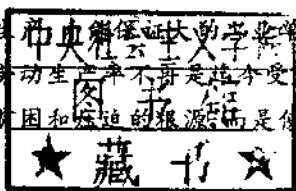
论点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必然使它许下的关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诺言，同劳动人民的现实处境之间出现矛盾。社会主义向往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的特点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经济计划和工人参与经济决策进程。

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多样性

欧洲社会主义在开始时，为保障劳动自由、公平分配财富

和国家控制生产而提出的组织建议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工业化过程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群众组织的建立，这些多种多样的主张逐渐形成共同的总观念。在早期阶段，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最好手段究竟是农村农业的组织结构还是城市一工业的模式，也存在各种不同的主张。德国社会主义群众组织受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学说的影响，选择了以全面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者最初为实现保证全面监督生产和工人平等权利的原则，也提出了不同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从限制财产所有权到国有化，从合作社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互助到统一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尽管这些建议各种各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以支配经济结构的两个基本社会主义原则为指针。

论点七：随着社会在技术上的不断发展，完成工业化进程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先决条件。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结构的两个原则采用了这样的提法来加以概括，而且这种提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有效，这些提法是：“只有将生产资料——土地、矿藏、原料、工具和机器、交通运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成公有制，将生产改变成为社会而经营和由社会经营的社会主义生产，才能消灭失业单位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这个受剥削的阶级遭受贫困和压迫的根源，而是使这个阶级享有



最广泛的福利和全面完美和谐生活的根源”。(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

全面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这个概念是随着德国迅速和全面的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在英国更是这样。这一进程的主要特点是农业的急剧没落和大公司的重要性的力量日益增加。资本主义集中进程的本身看来似乎会为经济发展的协调准备条件，而社会主义则只是加以完成而已。

在德国占优势的思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完成包罗万象的工业化，而且只有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拥护社会主义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不能保证生产持续不断地扩大。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排除生产不断增长的一切障碍。工业化的速度愈快，社会似乎就愈接近社会主义目标。这种看法一直到今天还影响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以下设想：

只有等到工业化进程已经实现，大部分的劳动已经充分自动化，人们才会有时间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有等到全而自动化生产出多余的货物，才能消灭匮乏和不足，从而结束分配方面的争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

只有生活富饶的社会，才能一劳永逸地克服分摊劳动和阶级分化。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才能臻于完

善；

只有由于实现技术发展而十分富足的社会，才能使所有的人分享自己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只有在这样一个富饶的社会里，个人的性格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他才能充分参与同他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决定。

但是，认为完成工业化同社会主义存在着必然联系观念，只有在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后，才是确定不变观念。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是通过恩格斯而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根据这种观念，人类的技术和工业的生产力的不断改进和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演变规律”。这种演变是生产环境（即生产的制度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逐渐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这种演变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将使生产力有可能有计划地和无限制地发展。

工业主义和殖民主义

这些想法促使欧洲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把技术发展同人类进步等同起来。他们相信技术发展的完成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许多人，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谴责同殖民主义一起出现的暴行，但认为这些国家只有通过殖民主义，才能有朝一日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换句话说，他们往往只批评伴随着殖民主义出现的情况，而不是殖民主义化本身。

论点八：以实现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孕育了社会主义运动中明显易见的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直至今日仍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占统治地位。

缺乏建设性的经济构思

论点九：“公有制”和“为社会而经营和由社会经营的生产”这两条社会主义原则，并不是作为一个实际可行的社会计划而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两条原则却往往被看成只是指出改组经济的方向的标志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表现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机构制度和组织形式直到几十年后才找到。社会民主党人直到在本国参政，从而有了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之后，才着手进行这项任务。到这个时候，正象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一样，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怎样在不同的情况下制订社会主义经济纲领，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发生变化和学到东西的一个主要根源，但同时也是出现不团结的一个主要根源。

具体阐明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制订任何切实可行的政策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以来这项工作却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一心信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受到阻

碍。“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的具体形式，不可能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建设性设计，而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自发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通向这些变革的途径、有待实现的任务以及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都要在伟大的革命之后才会展现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谁如果想要进行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设计，那就会被社会民主党人看成是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缺乏知识的表现。

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延续性

直到今天，民主社会主义仍然认为工人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对经济负责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并把这看成是一条不容争辩的原则。这两点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实现。今天仍然存在争执的只是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两点。从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以来，等到在苏俄实行的僵硬的计划和征用办法已经明显失败以后，人们曾经认为公开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是有好处的，可以保证在变化着的情况下按最好不过的方式运用社会主义原则。在关系到原则的问题上坚定不移，而在体制问题上则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这已经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第 四 节

社会主义的国家观

自由党人的国家观的缺点

自由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维护这样的观点：国家应负

责的是诸如安全、法律和秩序、外交政策等事务，但应避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任何干预。后者纯属私人的领域，不属于公家的责任范围。社会主义者的纲领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拉萨尔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认为国家如果只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把经济和社会事务看成只是公民的私事和采取“中立”的立场，那么它在实际上并非不偏不倚。如果这样，国家就是听任拥有权力的那些人自行其是，从而使国家本身成为这些人不受控制地扩大自己权力的主要条件。如果国家把经济和社会看成是应当由公民自行管理的私人事务，那就意味着国家没有负起它作为那些无权者的代表所应尽的社会责任。推卸这种社会责任的国家总是站在经济地位较弱的那些公民的对立面，因为在一个以财产和权力分配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在经济上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

论点十：经济地位较弱的社会成员取得平等自由权利的唯一机会，是发展团结互助的精神和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必须用人数众多的优势和自己的团结去对抗有产阶级的特权。他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可以对国家施加影响。这样就能使国家成为一个为全社会服务的工具。一个民主的国家能够改变工业界和社会的生活条件。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之后，就能取得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力量，他们需要这样的力量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上述的国家观是适用于建立完全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们认为要对国家进行彻底的改组，才能使它成为一个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的有效工具。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会工作没有多大用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强调，没有权力和财产的人必须团结互助，才能直接改善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他们要工会把工人的精力结合在一起，加强自己在同控制经济权力的人进行谈判时的地位。

团结互助和组织

从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团结互助在以下两个方面都是取得平等自由权利的关键：

一个方面是弱者通过组织工会和政党，应当把他们的人数优势和大公无私铸造成强有力的工具，用来争取平等的权利。这对改善日常劳动和生活条件能立即起作用，而这正是工会活动的中心。但是从长远来看，问题在于根本改造社会，使社会有一种以平等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政体，而这就是党的活动的目标。

另一方面是保证这些新的社会条件使团结和互助的精神永远同社会结合在一起。你争我夺的无情斗争以及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统治多数人的状况，将由大家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依赖所取代。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和合作的新形式将反映人民的团结互助。

论点十一：团结互助在社会主义者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和社会主义者关于人道的社会的概念中起关键作用。只有个人在人们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努力中表现出对他人的责任感，而且他能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这样做，才有可能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

从较小的范围来说，这种团结观表现在合作运动、工会运动和社会党成员为党做的无私的工作中。从较大的范围来说，这种团结感最终导致关于民主的国家的新观念，把民主的国家看成以这种团结为基础而塑造社会关系的手段。

社会主义需要民主

社会主义通过清除私有制的障碍而进一步发展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要求建立民主的国家。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写道：

“……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

斐迪南·拉萨尔在《公开答复》（1863年）中写道：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译注

“如果德国的立法机构是直接普选制的结果，在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你才能坚持要国家保证履行它的义务。”^①

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受国家决策影响的大多数居民能经常有机会施加影响。只有民主国家才能考虑到全体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因为民主国家是对人民负责的。在国家的职能方面，社会主义摒弃认为国家愈少干涉社会生活就愈好的自由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是同绝大多数地位软弱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事实上，社会主义让民主国家对整个社会负责。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国家不仅应保障财产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应建立必要的社会结构和提供公平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而维护所有人的自由。

社会主义者在国家观上的分歧

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国家问题上有三大派思潮，这三派思想今天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一、有一种观点主要在法国和南欧盛行，它是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普鲁东的学说的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论点是：应减少国家本身的职能，由小型的合作社会去处理互助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一派的拥护者认为这是赢得自由的唯一途径。他们论辩说，不管国家组织结构如

^① 斐迪南·拉萨尔〈为在莱比锡举行全德工人代表大会(1863)致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载多布和克洛茨巴赫所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1973年柏林—波恩出版，第134页。

何,它总是压迫人的(这种思潮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传统)。

二、另一种观点是拉萨尔提出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扎下了很深的根。这种观点认为应当使现有的国家民主化,并逐步增加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责任,从而使社会条件立即得到改善。长期的目标是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将不再存在任何界限。

三、第三种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它曾经长期地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支配地位。这种理论的实质是:国家在本性上只不过是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手中的工具。因此,国家应当用暴力来夺取并加以根本的改造。只有做到这一点以后,国家才能成为按社会主义的模式重新组织社会的工具。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愈是成功,阶级愈是趋于消失,那么国家就愈衰落(恩格斯语)。国家将由各种自发、自愿的社会关系所代替。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观的理论和实践

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民主化和争取使国家承担社会和经济责任的斗争,是同人民想通过团结互助,以后能使国家不再需要强制手段的愿望相联系的。

总结论点一至十一:

社会主义原来是指各界全体人民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并通

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来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愿望。

社会的改良是以这样一些目标为指针的：

对社会负责的民主化国家；

人们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自己工厂的决策；以及
由社会协调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纲领的实际贯彻依靠以下三个支柱：

组织一个政党，把它作为改革社会基本成分和以后实行
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

建立工会，使工人即使在现有条件下也有力量进行谈判，
来改善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小规模地预习社会主义的生活
和工作方式。建立合作社也是为了直接改善生活条件。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道路、目标和 根据的两种不同看法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早在它被德国皇帝(1878—1890)的专制国家取缔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受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理论。这个理论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纲领的基础。国家对该党的镇压激发了这个运动内部的激进思想,但它的原则和具体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论点十二: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所有思想相反,自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补充和修改,但这些补充和修改很少涉及目标的性质。这种补充和修改的中心内容,是断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影响着德国和其他许多西欧国

家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但对这些党的行动的影响却比较小。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以概括如下:

一、社会主义和随后的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由一些人提出来并为之斗争的要求,而是进化本身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可以科学地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可以得到科学的证明,这种必然性来自人类进化的两个基本事实:

在每一个社会中,经济条件是道德、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和政治等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的基础。从长远来看,经济条件总是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受一条基本法则的支配,经验、创造性和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即工艺、劳动组织、技术)不断地和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人们在其中进行物质生产的特定社会条件(=生产条件)只让生产力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原来的社会条件就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但是从这些条件中得益的社会阶级却为了私利而保持这些条件,因此,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消灭它。

迄今为止,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由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统治其他人。生产关系一旦使生产力受到过分的限

制，那就迟早会被受压迫阶级的革命打碎，而为新的经济秩序所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持续不断的，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会结束，这种社会将为生产力不受限制的发展提供外部条件。

二、为了回答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目标如何才能实现的问题，马克思在整个一生中都在两种可能答案之间动摇不定。这种情况可以在他的不同著作中看到，而且往往可以在同一部著作中看到。这两种可能答案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逐渐发展社会主义。

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由于国家始终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也由于历史的钟摆(如上所述)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回摆动，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靠革命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同资本主义状况突然彻底决裂。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被迫起来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不可救药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必然崩溃。

社会主义经济既不能积极地设计，也不能逐渐地推行。它将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将取得全部政治权力，使社会得以接管生产资料。马克思估计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将使生产集中到数目愈来愈小而规模愈来愈大的工厂里。他因此并不把“社会将没收生产资料”这条规律的具体贯彻看成是一个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集中将使一小撮巨型公司取代中小型企业，从而只剩下

利益截然相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即数目日益减少的资本主义大亨和占压倒多数的、处于依附地位和受剥削的、没有财产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规律本身就会使力量对比和生产组织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进程在各工业部门留下来的少数巨型企业可以由社会的中央机构接管。至于整个社会进行计划生产的需要怎样同各个工厂内部的自决权协调起来，以后的发展进程将会指明道路。

在这幅画面中，“革命”和摧毁资本主义、夺取政治权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行动是同时出现的。

逐步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一直在考虑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种可能的办法。特别是他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64—1872）纲领的形成过程中写的那些著作，概述了在政治民主的范围内逐步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一旦国家有了民主的结构，工人阶级又组织得很好和拥有强大的力量，那就有可能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愈来愈多地以社会主义原则，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民主的国家可以废除个别部门的资本主义原则，代之以符合社会主义标准的条件。马克思提到过的这种社会主义变革的因素是：制订保护工人的立法，限制每天的工作时间，对工人子女实行义务教育和发展合作制度。就这个意义来说，“革命”意味着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设性步骤和使用

和平的手段进行的。恩格斯后来补充说，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适当的组织是民主共和国。他论证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媒介。但恩格斯估计，如果社会主义政党在改组社会的问题上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那么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取消政治民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就是劳工运动被迫使用暴力进行反击，以恢复和捍卫民主。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就同建立和保卫民主联系在一起，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他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有目的地逐步对社会进行激进的（“革命的”）改造。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的两种矛盾的思想之间的冲突，也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使以马克思理论为背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存在含糊不清和矛盾的地方。这种冲突也使两种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即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某种理由可以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第 二 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将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但在实践中人们感到，既然有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运用自己的力

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改进社会和经济立法，那就应当有可能在实践中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实践中，这种做法似乎不符合理论所规定的真正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并没有公认的规范。其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愈来愈脱节。理论愈来愈不能指出明确和实际可行的道路。

赞成实际可行的改革的人同希望实现革命的决裂的人之间存在着矛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形势助长了这种矛盾。当时的德国还未进入民主的阶段，宪法的基本条款看来使得人们不可能继续采用实际可行的办法直到实现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这样，这个发展进程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中断。实现彻底民主制度的需要（必要时可通过军事手段）同社会条件的发展过程中预期会出现的决裂（这种决裂将使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崩溃之后出现）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但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长时间没有把这两者明确地加以区别。

现行社会制度中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的各种改革，不是被看成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阶段。这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新不会来自当前的变革，而会来自用革命手段同一切现存的关系决裂，而这种决裂又不是可以在事前就讲清楚的。

什么是革命？

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到底什么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存在很模糊的认识。“革命”一词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解

释，人们时而用这个，时而用那个，而从来没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多数情况下，谁也搞不清楚在具体使用某种解释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

一、“革命”被理解为社会形势的大变动，但并不讲清楚究竟是用和平手段还是暴力手段造成的结果。

二、“革命”被理解为在短时间内社会形势发生全面和激烈的大变动。

三、“革命”也可以被理解为强行改变政治体制，而不是让政治体制按照法律而发展。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说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为了建立或保卫政治民主才打算使用暴力。

四、“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清除老的社会秩序，并同时建立民主制，以及在短时间内社会形势发生全面和激烈的大变动。

因为关于革命有这些混乱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又信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就在一个长时期内阻碍社会党人具体阐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究竟是怎么看的。他们没有向自己和别人讲清社会主义社会将如何运转以及他们将采取那些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反对者指控社会民主党人追求的是乌托邦制度，而准备用暴力去进行革命。

论点十三：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的和一贯的概念，并不妨碍社会民主党人的日常斗争。工会和党为改善现状而斗争。但这种缺陷确实说明，社会党人日常的实际工

作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为什么缺乏确切的联系。

第 三 节

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改良的基本思想

论点十四：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裂缝的扩大，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因素有了发展。这种修正主义因素想弥合上述的裂缝，采用的办法是给基本的理论原则规定明确的定义，并将这些原则同社会的实际发展切实联系起来。修正主义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它批评马克思主义中那些阻碍建设性改良工作的因素，而肯定其中有利于这一工作的因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已经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得到发展，而在德国则还刚开始萌芽。这要归功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首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爱德华·伯恩斯坦，他从 1896 年起把各种修正主义思想融合成为一个完备的体系，用以代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看法。

修正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对社会的分析

1、复杂的社会

在某些关键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不同于马克思所预言的进程，而他的这种预言又是实现他的理论中的战略概念所不可缺少的前提。社会结构并没有出现愈来愈简单化的趋势，反而变得愈来愈复杂。尽管经济集中的进程十分迅速，但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中小企业的数目，象大企业的数目一样在继续增加。因此，国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没有由于经济的集中而消灭。决策者的人数仍然多得无法计算。

2、社会的分化

中小企业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必然保留了一个自主的中产阶级。由于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关的增加，这个阶层又得到“新中产阶级”，即白领工人和公职人员作为补充。甚至工人阶级本身也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分化。尽管私营公司纷纷合并，但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却使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数在增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的结构象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减少为两个在很大程度上统一的阶级，而是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倾向。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分化一点也没有减少。

3、危机没有加剧

资本主义经济也许无法摆脱它固有的出现危机的倾向，因为在社会需求同单个公司的生产决策之间缺乏协调，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同马克思所预期的相反，经济危机并没有增加或扩大，没有形成导致经济灾难的威胁，这种灾难假若出现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致命的打击。相反，现有迹

象表明，由于更广泛地使用信息和信贷制度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开始有了经济组织(如卡特尔)，经济危机及其影响趋于减弱。因此，人们并不能从经验中找到根据来加强资本主义必然会由于经济原因而没落的希望。

4、工人处境得到改善

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工人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虽然工人的收入同生产资料所有者收入之间的距离在扩大，但是工人的实际收入明显地在不断增加。马克思预期工人会愈来愈贫困，直到终于触发一场革命，但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5、有序地解决争端

阶级斗争并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加剧。国家的民主化和劳工立法由于工会的努力而得到改善，为解决工会和

图表 7: 德国工业公司和农场的类型及其增长格局

按规模划分的工业公司

1882、1895 和 1907 年各类公司的总数及其职工人数

年代	1—5名 工人	6—50名 工人	51—1000名 工人	1000名以上 工人
1882				
公司数	2,882,768	112,715	9,847	127
职工人数	4,335,822	1,391,720	1,400,087	213,160
1895				
公司数	2,934,723	191,301	18,701	252
职工人数	4,770,669	2,454,333	2,595,533	448,731
1907				
公司数	3,124,198	267,410	31,501	506
职工人数	5,353,576	3,614,115	4,395,380	954,645

资料来源：尤尔根·摩兹辛斯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情况史》(东柏林出版)第2卷第253页。

商业和交通业公司(在普鲁士)

普鲁士商业和交通业的职工人数(铁路和邮政除外)

	1885	1895	增加
2或2名以下职工的公司	411,509	467,656	13.6%
3—5名职工的公司	176,867	342,112	93.4%
6—50名职工的公司	157,328	303,078	92.6%
51名以上职工的公司	25,619	62,056	142.2%

农场(帝国时期)

土地面积(公顷)	农场数		耕种面积	面积总数
	1882	1895		
微型(不超过2)	3,061,831	3,236,367	1,808,444	2,415,414
小型(2—5)	901,407	1,016,318	3,285,984	4,142,071
中型(5—20)	926,605	998,804	9,721,875	12,537,660
大型(20—100)	281,510	281,767	9,869,837	13,157,201
巨型(100以上)	24,991	25,061	7,831,801	11,031,896

资料来源: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73年波恩出版,第102—103页。

雇主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事实已经证明,民主制适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

我们重新考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将在经济上崩溃,工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有增无已。从这一事实出发,伯恩斯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的新概念。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基础来这样做的。

二、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

6、社会主义是一项建设性任务

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在革命之后，社会能够接收和管理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在拥有几十万个独立的生产实体的复杂社会里，这种希望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没有国家组织或代表整个社会的其他组织能指导几十万个独立的实体，而又能保证在这些实体中工作的人享有自由，同时又能最好地提高经济生产率。社会主义本身是一项组织任务，而根本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社会计划可以指明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解决办法。

7、社会化本身不是目的

在复杂的社会里，由一个中央机构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的全面社会化，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这种做法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要求的，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宗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真正目的，归根结蒂是在平等和由整个社会负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让所有的人都得到自决权，在这个进程中，全面社会化的概念只能看成是一种手段。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为了创造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和使所有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的物质条件，那就必须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才是社会主义作为组织社会的手段真正目标。一切社会协调的因素和一切决策的进程必须以此为方向。社会化本身并不是目的。

8、社会主义必须靠自己动手

在复杂社会里，突然的剧烈的变革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这主要有两个理由：

(1)从经验中学习

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使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掌握在雇主手里。因此，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用的方法，必须使处于依附地位的工人从过去掌握这些特权的人手中直接地取得和亲自行使管理权。每个变革的步骤都应是朝社会主义方向迈出的一步，都必须使那些迄今为止被剥夺的人们能有效地取得真正的自决权。

只有当工人得到自决的第一手经验时，他们才能学会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一权利来达到原有的目的。只有通过这样实际使用，他们才能学会如何得心应手地使用他们的自决权。走向自决的各个步骤的性质和范围，都能根据实际的经验来决定。这样做的话，工人们自己就能对这种决定负责。

(2)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改革

在用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取代资本主义的时候，决不应危害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每当取消资本主义结构的任何因素，就必须立即用建设性的、行得通的社会主义因素来取代，例如：用社会管理或社会化来取代私有制所拥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权力，由政府保护和管理劳动条件来取代工人得不到保护的自由市场，由国家管理的经济来取代易于引起危机的竞争等等。只有用能很好起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来取代被除去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因素，才能按照社会主义目标在不破坏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变革。

9、社会主义是一种原则

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立即和全面地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规定

的机构制度的社会模式，而只是组织社会的一种原则（就是说，各阶层的人由于团结互助和组织起来而都享有自由）。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模式来决定哪种体制最好，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按照那个阶段人们的经验和态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则。这个问题必须由有关人民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无论建立了什么样的机构制度，都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经验来经常对之进行复核。

10、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政治上都应有同等的发言权，因此，民主就不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可能的道路，而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一个基本因素。其次，民主制是实现社会变革最适合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都将平等地参与决策，而决策则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具体问题都由多数人承担责任。民主制可以在多数人的觉悟和经验所规定的范围内实现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革。民主保证走向这些改革的步骤符合有关的人们的意愿。

11、什么是社会化？

对“社会化”这个词需要作一些解释。它意味着保证整个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证所有人对影响到自己的决定都有发言权。在各个具体情况下，社会将通过哪些组织或团体（“社会”是一个概念，它自己当然永远不可能采取行动）来行使上述参与决策权，必须视社会活动或事业的不同而分别作出决定。在这个过程中，衡量的标准是平等和便利。决策的“社会化”究竟应当采取由一个社会机构（如国家或劳动集体）来作出所有决定的形式，还是应由若干机构来作出决定，每次

都应当取决于是否便利和取决于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一种情况是由国家官僚机构全面取得工业的决策权，另一种情况是制订一部工厂法，它虽然允许私有制继续存在，但是把原来的某些决策权切实转到工人、工会或民主的国家手中（如保障职业安全、保健、参与有关生产过程和人事问题的决定等规定），那么前一种情况的社会主义成分只会少于后者。

正象“社会化”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一样，总的经济协调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在市场适当运转的情况下，它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作为提高生产率的工具而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市场在某些部门到底是需要由总的经济计划来补充，还是应完全由中央的计划来取代，取决于生产和权力的结构，取决于各个生产领域的发展水平。

12、来自基层的运动

社会主义改革如果只靠议会决议和政府行动来贯彻，就不可能成功。它的内容和方向必须来自人民现实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重新组织社会首先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如果社会主义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为他们提供更为人道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和自己作出决定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必须从人们的经验和需要中汲取动力和建设性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能够在走向变革的各个步骤中明白自己的意图并最好地利用提供给他们的新机会。只有通过社会基层互相交流经验和利用政治权力去争取变革，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三、赞成社会主义的论据

13、科学和社会主义

从科学体系一词的以下两种意义来说，社会主义都不是

一个“科学”体系：用科学的方法能证实该体系的必要性或合理性；从科学的知识能明确地引伸出创造性的思想。诚然，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对那个社会的运转方式和支配那个社会及其发展的规律先有一个科学的了解，但是选择和献身于社会主义原则以及创造性的思想，都决不单纯是科学的行动，而是人民的利益或正义感的结果。说到底，社会主义完全依靠人民。科学对社会主义起辅助作用，但它总是受多数人的具体经验和决定的限制。

14. 不是反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并不反马克思主义。它批评和否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些因素和倾向，这些因素和倾向反对以建设性改良为宗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修正主义还突出和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强调有益的改革原则的部分。修正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比较好的部分作为论据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成问题的那些倾向。

德国社会民主党演变过程中的修正主义

当修正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时，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加以摒弃的。这多半是因为在进入民主时代以前的帝国时期，实现改良的余地很小，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是社会上一个孤立的部分。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担心许多党员的战斗精神会失去锋芒，因而必须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现实，补偿他们为之作出的牺牲。

然而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变得愈来愈修正主义化。在由德国历史的进程所决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中,民主社会主义逐步用修正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纲领。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使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1933—1945,当时社会民主党再次被取缔,它的主要倡导者流亡国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大体上也是具体表述和进一步发展修正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

爱德华·伯恩斯坦写道:

“对社会主义最确切的描述,是从合作思想出发的描述……因这种描述既表达了经济关系,也表达了法律关系……。将社会主义描述为通向合作秩序的一个运动或者是这种秩序的一种状态,都与此相符合……。提出合作性只是为了表明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法律原则:民主。合伙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①

“一部好的工厂法比一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内容。”^②

“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③

“那么,政治革命中的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

① 伯恩斯坦:《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901年柏林出版,第42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901年柏林—伯尔尼出版,第234页。

③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73页。

图表8： 总结,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 (改良主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p>社会主义是由于历史必然性而出现的历史时期。</p> <p>社会主义是根据统一计划进行管理的全面社会化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一切特权均被取消。</p>	<p>社会主义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原则,其体制结构和组织结构可以因社会发展阶段和经验的同而具有很多不同的形态。</p> <p>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参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p>
为什么社会主义要搞?	<p>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产生的必然性,它尽量反映工人阶级的目标,但同时也服务于全人类的利益。社会主义是注定要崩溃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p>	<p>社会主义是一种道义的必然性,它为所有那些由于不公正的社会条件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服务。</p> <p>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和方式都取决于有关的人们的行动。</p>
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p>工人阶级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将自行组织起来,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p> <p>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将会摧毁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将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在同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决裂之前的改良,对社会主义没有建设性的作用。</p>	<p>工人阶级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宣传社会主义原则,提出取代现存条件的办法。</p> <p>必须设计出具体的替代办法作为社会主义因素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这些因素必须以工人的利益、社会主义原则、工人的经验水平和现有的社会可能性为基础。</p> <p>社会主义将由于建设性社会变革的相互作用和这种相互作用使工人有可能积累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就是民主逐渐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p>

<p>什么是社会化？</p>	<p>社会在名义上取得完全的所有权，但并不确切规定体制和组织形式。</p> <p>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但并不确定集中的和分散的权力机关的明确模式和相互关系。</p>	<p>社会整体拥有一切生产资料。</p> <p>社会化不一定意味着国有化或名义上的征用，它也可以意味着把生产资料的私人管理权转到代表社会利益的各种机构手中。</p> <p>社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市场。有些运转良好的市场是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协调的。</p>
<p>国家和民主的作用</p>	<p>国家总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p> <p>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仍把民主的国家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舞台。</p> <p>马克思并未肯定是否应把民主的国家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工具，这一点一直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信奉民主而得到调整。</p>	<p>国家能否起作用取决于它的组织和它的合法性。</p> <p>民主的国家能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p> <p>民主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而且民主本身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体现了让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享有平等的自由权的社会主义原则。</p>
<p>革命能有什么成就？</p>	<p>革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暴力行动，其目的是摧毁资本主义，同时建立社会主义。</p>	<p>革命的一个意思是指非法使用暴力。这种意义上的革命也许是保卫民主或实现民主的适当手段。但使用暴力引起的革命大动荡不会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设性地改变社会的结构。</p> <p>在民主国家中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只能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逐步实现。</p>

用会愈来愈小。它可以打碎已经变得无法容忍的锁链和结束过时的制度，但除此之外它却不能创造任何有永久价值的东西。”^①

^① 伯恩斯坦：《市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未发表。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分裂

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分裂成民主社会主义派和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派，是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对本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执行的政策采取了不同立场。在这次战争前，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组织是社会党国际。在战争中，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除了少数例外，都支持本国的政府，这时社会党国际瓦解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坚持应把战争的爆发作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推翻本国政府的机会。这一计划未能奏效时，列宁便制订了用革命的政策全面代替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并且开始为具体贯彻这个理论而进行组织工作。

列宁的党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之后，他坚决把他的社会主义概念变成现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了表明他们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在1918年改名为共产党。不久其他一些党也跟着做。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社会主义

政党内支持他们的那些派别的理论和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倾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批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为了更有力地证明他们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差别，从那时起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民主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炽热的论战继续了许多年，两者之间的大部分分歧至今仍然存在。这些分歧是十分明显的。双方都引用马克思主义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因此，把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而把民主社会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分支，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民主社会主义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因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伸出论据来支持同民主决裂的“无产阶级专政”。

论点十五：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于：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本身具有价值，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而永远不取消民主。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用马克思断言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共产党人想建立这种专政来代替民主，直到建立起无阶级的社会。但双方都不对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共产主义和不发达状态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俄国的传统以及1900年左右的形势来解释。那时的俄国几乎没有任何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政治思想或议会制度，而且几乎没听说过出版自由和自由的工会。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合法地进行活动。俄国工人人数仍然很少。他们当中多数人不久前才从农民转为工人，没有当时西欧工人的组织经验、知识和信息来源。百分之九十的劳动群众是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

然而，绝不能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适合俄国落后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从一开始起就不得不同民主的劳工运动和民主的农民运动竞争。列宁的党刚取得政权就对这两种民主的运动进行镇压。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反自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因素，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劳工运动中也得到若干阶层的某种支持。

第 二 节

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论据

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来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被认为是驳不倒的真理。支配马克思主义行动的主要信念是，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维护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家用历史的真理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列宁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给“科学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是一个既统一又存在矛盾的整体。消灭它的努力应当从发达水平较低的外围开始。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边缘是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列宁就以此为论据而主张革命从俄国开始，而不是象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从发达的工业国开始。

二、工人的作用

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不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知识，因此他们还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这是因为：

由于缺乏时间、训练和基本知识，工人们不可能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也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应用和宣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的确看到自己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相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看不出只有靠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能为他们赢得利益。他们只能产生组织工会的觉悟。在资本主义下，他们不能产生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阶级觉悟。这种阶级觉悟要由知识分子中的职业革命家“从外面”带给他们。

职业革命家是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因此在摆脱资本主义之前和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应当负起领导工人阶级的责任。保证这种领导的办法，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改党和把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从职业革命家受到切实的教育，因而能变得

有充分的阶级觉悟和具备自决的能力。

三、民主集中制

只有一个集中领导的有纪律的党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党必须排斥其他一切思想，以确保科学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必须意志统一；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领导人是从这金字塔式组织的底层选出来的，但他们一旦取得最高职位，大家就必须几乎绝对服从。在俄国革命后的一段短时间内，列宁曾计划在党内建立集团。由于批评是不允许的，而且领导人一旦当选就行使全面的控制权，因此普通党员基本上没有真正影响决定的机会。

实例：在共产党内，一个具体问题只有在事先由党的领导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党内辩论的题目。各级党内职务的候选人必须由上级领导机构批准。

民主社会主义

一、论据

对论证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绝对有效的，并不是一种被提高到意识形态水平的历史观，而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宣传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可以打开眼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理论代替不了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表明政策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它同自由、平等和团结互助的原则的关系。这些原则规定，凡是受到影响的多数人所不赞同的措施，都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确立平等的自由。社会主义政策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以此为方向。

二、工人的作用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认为阶级觉悟必须“从外面”带给工人阶级的观点也同样占有突出地位。这个观点最初是由卡尔·考茨基提出来的，但在民主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它为党的组织工作提出不同的先决条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很难受到教育。因此，不能期望他们自发地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必须作出坚定不移的努力，把这种知识带给工人阶级。

如果提供恰当的机会和作了必要的努力，如果多数工人愿意，那么他们即使在受资本主义控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了解自己所处境遇的原由以及改变这种处境的必要条件。工会工作愈有进展，工人愈能吸收自己时代的文化。社会民主主义者高度乐观地着手执行教育工人的任务。

工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绝不能因为工人对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理解而限制他们的自决权。在党内和社会主义国家内，民主必须高于一切。社会主义改革的速度和方向必然取决于工人的实际利益和知识。

三、党内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以赢得多数人的支持为目标的群众性政党。这些党以党纲所规定的原则为基础，允许党内存在批评的广泛自由和成立不同的派别。批评党的执行机构，提出不同的建议或要求改选领导人，这些都属于党内的正常生活。党的政策不是从一开始就碰不得，而是在一个延续不

断的争论和公开辩论过程中形成的。党员没有忠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义务。

实例：

对领导推行的政策提出批评，是民主政党的共同特点。党内反对派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代表领导机关的候选人，这也是常有的事。

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认为，国家总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者的强大机器，因此，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由是：

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为工人的利益而利用国家。

国家只是资本家的工具。

因此，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才能征服国家机器。列宁认为议会民主是资本家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在革命之后应加以摧毁。取代议会民主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的主要特点是工人阶级拥有不受限制、不与人分享和不可剥夺的权力。这种权力由代表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来行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参政权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在有利于巩固党的力量，在有益于实现国有化和全面的集中控制的情况下，才允许行使参政权。国家集中地指导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国家的合法性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多数人的决定不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提出异议。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在建立无阶级社会。这个目的
一旦实现,国家机器就可以消亡。

弗·伊·列宁1919年写道: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
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
权。”^①

五、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实现(无阶级的)共
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
自始至终必然有以下四个特点:

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

生产资料私有制将逐渐被全部消灭,代之以国家掌
握的“共有制”。

经济和所有其他社会领域都受集中的控制。

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六、国际

列宁在1919年建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每个党若要参加
都必须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约束力的理论。合作的主要
原则是无条件地支持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
条件地把苏联的利益放在高于其他政党的民族利益之上,这
被看成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遵循苏联的模式。这就
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终于分裂。

^①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译者

民主社会主义

四、自由民主主义

组织形式对于国家的社会职能起关键作用。民主的国家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为全社会服务。民主社会主义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只有民主的结构才是适合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构。

民主制度的目的是消灭社会决策过程中的特权。因此,只要拥有广大多数的支持,民主制度就能成为除掉资本主义的有用工具。

民主的国家允许自由的批评,允许建立对自己的活动负责的各种组织,让人民能不断增加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发言权。民主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它使大多数居民能承担行动的责任,达到民主社会主义在多方面所设想的程度。以对决策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是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是完成社会主义进程的最佳方法。民主容许公开的批评,使政治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保证社会的发展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但与此同时,民主又要求保护人权,保护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权利。

在复杂的社会中,规章制度必须有愈来愈大的约束力,这个任务只有国家才能完成。重要的是应当使国家尽可能地民主。

卡尔·考茨基1918年写道:

“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讲的现代社会主义,不仅指由社会组织生产,而且指

民主地组织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①

五、社会主义

不能以某种体制，如所有制的形式或计划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通向具体目标的过程，这个目标要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由平等自由的原则来决定。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无愧于这个原则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能因经验和发展水平而变化。世界上存在着取消自由和平等的国有化制度，但是也有些国家对私有制进行监督的形式是符合上述原则的。

社会主义并不是为社会制订的一个固定不变的计划。它是组织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原则。它谋求在变化的形势下给予人民最大程度的自决、平等和团结互助。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总是以民主、社会负责经济、和社会各级协作作为前提。

六、国际

在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国际中，各国的党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承认民主。这些党根据平等和团结互助的原则进行合作。它们追求和平的政策不谋求霸权主义，为争取自由和防止再有任何剥削而斗争。

总结论点十二至十五：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

社会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突

^① 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出版，第5页。

出了在复杂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和限度。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崩溃的说法是不可认真对待的。一场革命可以除掉妨碍社会发展的不民主的东西，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逐步的改革。人民必须一步一步地取得自决的机会。改革的过程必须由人民来进行。执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每个步骤都必须增加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相助。社会主义并不是为社会提供一个现成的计划，而是指导社会全面民主化的原则。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受到镇压和孤立，那就只会有少数人倾向修正主义。更为激进的建议看来增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战斗精神，修正主义逐渐成为党内多数的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争论，把国际劳工运动分为两个阵营。共产党人从“科学社会主义”推论出有觉悟的领导有权控制党（民主集中制），并通过党控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受任何限制。“有觉悟的”权贵的专政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前提。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有制加上中央计划。民主社会主义者则把社会的完全民主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执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每个步骤，必须也是有意识地让多数人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更多自由平等的步骤。应当把这一点作为标准来选择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手段。

第四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通过哥德斯堡纲领

社会民主党人鉴于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的经验，看到自己不得不提出一种明白、不含糊和非幻想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必须放弃自己一直珍惜的希望。这个学习过程在某些方面，如党认识到需要采取改良政策，是相当迅速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如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党，则是缓慢的。这个过程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挫折的。显然整个党只有在新的思想来自现实经验（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痛苦的经验）的情况下，才能采纳新的思想。本章的这个部分对基本经验进行回顾，这些经验对于社会主义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冲动转变到哥德斯堡纲领所反映的新面目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转变说明，由于不可避免的经验，修正主义的支持者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成为多数人的意见。这并不是由于人们有意识地传播修正主义的看法，而是来自党本身的经验。

第一节

社会主义必须靠斗争来争取

社会民主党人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运动规律会带来导致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1939—1945)的灾难,由于德国希特勒独裁统治(1933—1945)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重新退回到他们以为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总归是有可能的。未来取决于人们自己的行动。因此,只有不顾一切阻力,寸土必争地争取胜利,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现实。无论社会主义取得了什么进展,这种进展总是处在危险之中。

实例:

在1921年的格利茨纲领中,社会民主党人曾经这样说过,现在又已经赢得民主,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演变过程的结果。有些人相信不再会退回到民主制之前的局面。希特勒独裁统治在德国掌权(1933)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一步步斗争得来的成果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当社会民主党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得到相当大的支持时,他们同工会合作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进展。例如,法律规定了八小时工作日和失业保险。但当经济形势恶化和雇主的组织得到发展时,社会民主党人就不能阻止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工人失业救济的减少。

第一条基本经验

论点十六：社会主义的建立只有依靠大多数人出于信念愿意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并警惕地保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总是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第 二 节

社会主义：一个漫长的进程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曾希望在资本主义垮台之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出现。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大概不会垮台。在1918—1919年的革命中，以及在魏玛共和国的有些年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政权，但是他们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的解体，并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解决哪怕是一个问题。他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纲领。他们了解到在任何时候社会主义目标都只有通过妥协的手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社会条件和政治上的多数。这些目标一旦实现，也仍然是不充分的并且处在危险中。仅有原则是不够的。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革，只有在形成具体的概念和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第二条基本经验

论点十七：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目标的实现只能是不完善的和大体上

的。需要具体的纲领。这些目标同社会主义原则接近的程度，不仅受政治权力的限制，而且受到社会阻力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实例：

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实际上许下了社会化将带来新社会的诺言，使社会主义的追随者相信，一旦社会主义获胜，就会使生活条件全面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分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8年11月这两派执政时，实现了全面民主并推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是生产资料并没有社会化。

社会党人认为，战争时期受到打击的德国经济不可能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根本改造。他们也没有制订进行这种改造的任何计划。1919年的宪法规定由国家控制经济，并通过了为今后社会化奠定基础的律。工会拥有进行工资谈判的充分权利。1920年通过了工作场所宪章法，规定在工厂中实行(劳资)共同作决定。但是并没有试图对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尽管社会化一直被当作一项主要要求。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情况困难，而且还因为缺乏关于社会化的具体概念。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垮台而出现，但这种希望并没有实现。当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哪些经济部门适合社会化以及如何组织社会化的整个进程。但是等到研究出初步的结果的时候，政治形势再次发生了不利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变化。没有制订出一项纲领把社会主义作为建设的任务。这就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感到失望，许多人丧

失了信心。社会民主党人甚至难于使人们接受一些重大的改革。人们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诺言作为判断他们的标准。有些支持者背离他们，投向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坚持通过社会化实现革新的诺言，并宣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背叛了群众。这些经验教育了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从那时以来对可能性作比较实际的估计。但是他们又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用可以使人相信的方式把他们纲领中的诺言同真正的可能性协调起来。

第 三 节 社会的分化

拉萨尔、马克思还有社会民主党人都预期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数还会继续增加。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人阶级会成为压倒多数，同他们对峙的将只是一小撮大资本家。

但是，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已经开始按不同的模式在发展。“新中产阶级”，即私人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职员和公务员，人数和重要性都不断增加。尽管他们同工人一样处于依附地位，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社会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有些人还采取了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聊以自慰地希望，这些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懂得他们的利益接近工人的利益，因此会把他们的命运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大选中获得约百分之三十的选

票,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以及后来在联邦共和国的头十五年中(1949—1960左右),他们未能超过这个比例。这并不是由于共产党的竞争,因为共产党从1918年以来几乎从未赢得超过百分之五的选票;而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料到的另外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他们没有获得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选票,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工人。另一个情况是,同劳动人口相比,工人的比例在1925年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而之后就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却稳步上升。在今天(1980)的联邦共和国,白领雇员和公务员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蓝领工人的比例一样大,前者的经济情况同工人有许多共同点。但他们的意识却不同。按照工人阶级的需要而制订的传统的纲领、态度和语言,不能吸引他们,而没有他们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掌握多数选票,就不能在民主制度内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的政策。

第三条基本经验

论点十八:专为工人阶级提供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机会为一个工人并不占多数的、划分为不同阶层的社会所接受。社会主义纲领应为居民中更广泛的阶层的利益服务。只在口头上强调这些阶层的利益同工人阶级利益一致性的重要性是不够的。而必须使他们信服地看到这种一致性。民主社会主义的党必须成为一个人民的党。

实例：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仅考虑到经济利益的基本一致之处；还要看到不一致之处。如果想要争取各种社会集团的信任，那就不应当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看成是无关紧要的。

尽管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也作过几次努力，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实现突破而成为人民的政党。直到六十年代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绝大多数的白领工人和公务员都不愿同社会民主党发生任何关系。部分原因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各种体育、文化和保险协会过于遵循工人阶级的模式。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联系其他阶层的障碍。白领工人和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表面上比较高，他们认为，如果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那就等于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向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使这个党在1933年取得政权。社会民主党的形象不能吸引这些集团。由于这些集团只关心自己的基本经济利益，这就使社会民主党难以形成一个有号召力的社会多数。1921年的格利茨纲领标志着走向一个人民政党的起点。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再次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的利益上。

1921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格利茨纲领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政党。它的目的是使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联合起来支持共同的原则和目标，以便共同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1925年重新统一后的社会民主党的海德堡纲领写道：

“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激烈，统治企业的资本家同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垄断。”

埃里希·奥伦豪尔（1933年至1945年任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52年至1963年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在1942年对“旅居英国的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说：

“一个民主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党，本质上应不懈地努力争取居民中更多的阶层来支持它的观点和任务，并使他们相信它的主张和宗旨的正确性。因此这个新党在原则上必须向赞成并愿意协助实施它的宗旨和政策的每一个人开放。”^①

其他的经验

除了上述的经验（这些经验表示放弃了早期怀有的希望）外，还有其他一些学习过程对于形成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 四 节 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动机

从社会民主党被取缔的时期（1878—1890）以来，在拥护

^① 见D·多亨和K·克洛茨巴赫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集》，1973年柏林—波恩出版，第236页。

党的人中间和党纲中占优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批评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在一个长时期内，修正主义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者面临危机。他们曾经预言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社会主义即将取胜，但这种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且马克思主义当时在苏俄的实验又使人们集中注意它的弱点。这种情况使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道义和哲学的论据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思潮从人的尊严引伸出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同等的权利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它论证说，只有在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亦即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些用基督教教义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人，则强调全体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和处于平等地位。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感到难以完全平等地对待这些集团。其后果之一就是使它难以接近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纲领但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阶层，首先是德国的天主教徒工人。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派别都遭到希特勒政权的镇压以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再取得任何进展。由于大家都受到希特勒的镇压和反抗纳粹的压迫，这就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共同的政治信念和个人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从那时起，人们为了理解不同的社会主义动机的同等价值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第四条基本经验

论点十九：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证明社会主义目标的

正确性。认为某一种动机高于其他动机，既没有意义，也无益于任何政治目的。为了争取政治上最大限度的一致，也为了尊重社会主义者个人的信仰，一切动机在党内都应有平等的地位。

莱奥纳特·内尔松（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社会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和导师，这个小组1918至1925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内积极活动）写道：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亦即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法律上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能再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现实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只是现实斗争在工人阶级思想上的一种虚构的反映。”^①

德国社会主义者宗教同盟1928年通过的指导方针写道：

“信教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革命无产阶级队伍内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才有可能清除有缺陷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宗教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②

1921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格利茨纲领写道：

“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解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和道义的指令。”

① H·J·海道编《莱奥纳特·内尔松选集》，1974年法兰克福出版，第202页。

② 汉斯·拜尔著《魏玛共和国的宗教社会主义》，刊载在《德国哲学杂志》1960年第8期。

第五节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

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些阶层长期认为政治民主从当前来看不利于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只有在迅速导致全面社会主义改革的情况下才有价值。但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缺乏令人信服的进展的情况，使人们大失所望。劳工运动在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摒弃劳工运动）的反对下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看不出任何走向胜利的捷径。魏玛共和国时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六百多万人失业，动摇了全国对政治领导的信任。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分子都责怪民主制度。他们要用一种极权政治来取而代之。这就使坚信民主的社会民主党人再次受到孤立。他们的党是在受到报复的威胁下，德国唯一拒绝给予希特勒他所要求的全权的政党。

德国的希特勒专政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怕地证明，没有民主就既不会尊重人的尊严，也不能有效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第五条基本经验

论点二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法治及批评和反对现行统治制度的自由，是无愧于人类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凡是民主受到践踏的地方，自由就不再存在，

工人的利益就不会再得到有效的保护，工会工作就会瘫痪。

实例，

当俄国布尔什维克赶走民主选出的议会，并建立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就不再允许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法地进行活动。他们使工会从属于共产党。工会不可能不受主要当权者的支配而进行活动。列宁事实上让苏维埃工会起“传送带”作用。工会的目的就是把领导党的意志传达给群众。这使劳动人民比在有着民主政府和结社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依附于政治领导。

在劳工运动中，政治民主常常被贬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在经济大危机时期的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多数只在民主不干扰他们的特权时才对民主有兴趣。大资本家出钱支持希特勒的党，资产阶级的选民涌向该党。除社会民主党外，所有其他政党都默认希特勒取得全面的独裁权。当民主制同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就用选票来保护他们的特权，从而背叛了民主。只有劳工运动把民主制看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的利益是起作用的。

奥托·韦尔斯（社会民主党主席）1933年3月23日在德国国民议会中解释他为什么反对授与希特勒权力的《授权法》时说：

“魏玛宪法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但是我们赞成这部宪法规定的法治国家、平等权利和社会正义原则。”

“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庄严地宣布拥护人道主义、公正、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可能授给你们权力去消灭永恒和不可摧毁的思想。”

1921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格利茨纲领写道：

“社会民主党决心始终保卫已经得到的自由。它认为民主共和国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的政治形式，对民主共和国的任何攻击，都是企图取消人民的重大权利。”

埃里希·奥伦豪尔（1933至1945年任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52至1963年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42年对“旅居英国的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说：

“全面的专政再次唤醒人们要求正义、法治、保护个人不受专断和暴力之害的愿望。除了对社会安全的向往之外，要求自由和法律保障的愿望，是一切反对纳粹政权的反对派运动的最强大动力。在推翻了希特勒的专政之后，人们将谋求实现这些愿望。”^①

库特·舒马赫（1946至1952年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45年说：

“民主和社会主义同时成长，它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和政治基础。民主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伦理不可分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争取精神、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斗争。社会主义同时也是为争取正义，争

^① 埃里希·奥伦豪尔，前引书，第234页及以下。

取权利不受侵犯和摆脱桎梏而进行的斗争。用专政的手段争取的和强加于人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至多也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其他某种超级个人主义的经济形式。”^①

第六节 经济的民主化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的老公式是，“社会应没收生产资料”。人们曾经希望事态发展会使这个公式具有实质内容。但是社会化的真正含义仍然是不确定的。中央政府是应当接管所有的生产资料呢，还是只接管一部分？还是应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来取得这种职能？劳动大军是否应作为社会的代表采取这一步骤？工会在这个过程中应起什么作用？是否事无巨细都应有计划，还是只对总的发展进程作出计划？市场应当完全消失呢，还是应受到监督？这些问题都仍然没有得到答复，而且随后的事态发展也没有提供答案。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和可以采取行动时，发现自己面临着这些问题。他们必须靠自己来提供答案，这就使他们懂得，社会化并不只是政权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组织问题，而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和工会都必须用简单明确的语言来阐明他们的想法。

^① 库特·舒马赫著《与其他政治因素相关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准则》（1945），载多韦和克洛茨巴赫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集》第246页。

苏联从1917年起没收一切生产资料，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十年后又建立了指令性中央经济计划体系，并制订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事实让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出，这次试验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并不只是一个过渡的问题。一个巨大的经济官僚机构随着全面的国有化和计划化而形成，它比资本主义管理部门作的决定更脱离劳动群众的意愿和需要。生产率达不到本来可以达到的指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仍十分匮乏。关于生产的决定很少适合人民的需要。工厂里职工几乎没有发言权，万事都由上面集中决定。决策过程中由大家共同作出决定的情况也不多。个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实践比理论更清楚得多地表明，这种做法不可能导致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仍然不让工人参与影响他们的决定，无论在工厂或是在管理机构中都是这样。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出现全面的经济合作。社会民主党人从中得出结论：除非包括经济的民主化，否则社会化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德国的劳工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有所发展，制订了关于工人参与管理的法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又继续有所发展，特别表现为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法。这就说明，在整个制度没有革命化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使工人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1920年的法案规定，有关劳动组织和人事问题应征求工人意见。1919年的德国宪法规定成立包括工人代表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在有关整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上工人代表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平等的发言权。

但主要在工会运动内部和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内，这些实

际经验产生了工业民主的思想。工业中的各级政策机构，从工厂车间经过工厂管理机构，直到有关的工业部门以至整个经济，都逐步规定了有效的工人参与权。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灵活性。

第六条基本经验

论点二十一，只有各级都建立民主决策机构的混合经济，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把自由、平等和效率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把市场原则同计划、把受监督的私有制同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管理结合起来，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

工业的民主化可以按照进一步的发展和经验而逐步扩大。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考虑

工业民主的思想1928年曾主要由弗里茨·纳夫塔利、胡戈·津茨海默和鲁道夫·希法亭加以阐明，这种思想同希法亭以前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是有联系的。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愈发展就愈严密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它建立了市场调节体制(卡特尔)，抵销了各种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大的工业集团对生产进行计划。银行对所有经济部门施加影响。社会主义应该利用资本主义自己组织的体制。民主国家应设法影响资本主义的管理机构。工人及其工会应

当在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以及在将要成立的新工业联合会中，逐渐扩大自己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

弗里茨·纳夫塔利1928年在《经济民主》中特别写道：

“工业民主一方面民主的一种，即不同于并补充政治民主的一种工业上的民主。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即民主地组织经济，而不是实行经济上的极权。”

“但是，除了增加国家对工业的权力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之外，占有某种垄断地位的那些公司的管理机构中必须有劳动者的直接代表。”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既完全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同时又保持一种由各个经济部门管理自己事务的经济管理制度。换句话说，建立公有制，但并不使经济官僚化，而要使各种经济力量在自治的体制内有效地发挥作用。进行这种改革时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在消灭今天仍然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使经济管理机构继续象企业家那样起作用。”^①

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如爱德华·海曼发现，市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社会的利益。他认为，如果市场能适当地运转，并受国家的监督和调节，那就可以比集中计划更好地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

爱德华·海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1930年写道：

“市场是现代工业的唯一真正的经济因素。破坏市场

^① 弗里茨·纳夫塔利著《经济民主的性质、道路和目标》，1969年法兰克福出版，第20、40、56页。

就是跳进黑暗……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同社会公有观念为敌的资本主义统治，同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体系。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同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和资本主义绝不是同一回事。如果没有人除草而导致草盛苗稀，你不能因此责怪土地。同样，如果资本主义征服了任其自流的市场，那么也不能怪市场原则。真正重要的在于分清哪些是现实市场过程的社会历史状况，哪些是在社会关系中起中立作用的市场技术原则。”^①

总结论点十六至二十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是要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直到今天这种原动力仍然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因素。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经验迫使他们一再重新考虑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这就引起了变化，对将要遵循的道路作了更精确的说明，有时还引起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并不是预先制订的现成可用的社会模式。它的原则总是不完善的，必须在面对多方阻力的情况下，一步步地付诸实施。社会主义变革必须永远从现有情况出发。一个不现实的纲领会使人们充满热情，但它却不可能实现，其结果必然是后来引起失望，使人们脱离社会主义。

在包含许多不同社会集团的人民群众当中，社会主义政党只有成为人民的政党，才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它必须把

^① 爱德华·海曼：《社会化》，见《现代社会的变化中的社会主义》，1975年柏林一波恩出版，第43页。

几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习性结合在一起。在努力为这个目标奋斗时，社会主义政党还必须懂得，不同的个人信念中都能树立社会主义目标。因此，为了取得尽可能广泛的政治一致性，也为了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应当规定大家都信奉任何一种基本原理。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和目标之一。民主制符合工人的利益。民主制能使多数人对决策施加影响，并使工会能不受障碍地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在国有化和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下，自由、平等和经济效率都处在相当大的危险之中。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要求工人民主地参与各级工业单位的决策。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要求工业民主。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受监督的私有制可以适当地同公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联系起来。

第五章

今日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 概念的各个不同方面 (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 及其《八五大纲》)

第一节 走向哥德斯堡的道路

1933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打垮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千千万万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会会员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了生命或遭受长期监禁。其他一些人流亡国外，努力为击败希特勒而战斗，为随后重建新的德国而工作。他们在魏玛民主制时期斗争的失败，他们在集中营、在地下和在流亡中共同斗争的经验，使他们更快和更强烈地反对过去的疏忽，并寻找新的共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德国彻底崩溃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立即重建了。由于当时不可能依据已获得的全部经验马上塑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面目，因此各种传统的观念曾一度占据上风。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重建遭到摧毁的德国。战后初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库特·舒马

赫经常在他的演讲和著作中回顾党的理论和经验。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明确地宣布，马克思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以哲学的认识为指针的社会主义者，只要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和原则，都能在斗争中平等地起作用。他强调，任何国有化措施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必须是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现实的一种权力手段。他认为，政治民主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不言而喻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舒马赫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明确地谈到社会主义的主张同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原则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坚决反对共产党人的宗旨。他试图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理论变为现实，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全体劳动者的党。舒马赫的思想就这样在社会民主党新生的重要阶段，依据党的最重要的经验塑造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新面目。

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起草新德国的宪法。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了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这个基本法在1949年生效。它的一些重要部分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对民主的理解。德国第一共和的崩溃是一个教训，促使基本法的作者们写上了许多保护民主制度的条款：可直接行使的基本权利，能取缔反民主政党，议会的权力高于总统，后来又增加一个条款规定只有在选举中至少得票百分之五的政党可以进入议会。基本法（即宪法）宣称联邦德国是一个“社会国家”。这个规定使国家有义务建立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当时德国那些谋求多数支持的政党关于什么叫平等的社会秩序有十分不同的概念。因此，宪法本身并没有规定任何特定的制度，而是有意让今后议会的多数来实现宪法的要

求。宪法提供了一个民主的框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充实。可能性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基本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能将土地、自然资源和生资料转为公有。因此，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争取大多数居民支持他们的政策。战争刚结束，以伦理社会党人（维利·埃希勒、格哈德·魏塞尔等）为主的一个集团就发动一次辩论，以决定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他们的目的是清除把社会主义看成历史必然性的残余信念，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使这种责任感在党内生根。这一点很快成为党内多数人的目标。这时，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再次未能超过百分之三十而出现了失望情绪，因而开始了一个进行反省的新时期。这时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目标同时照顾到基督教徒工人和新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却不能制订出一个能够吸引这些阶层的纲领，不能使自己取得能够吸引这些阶层的形象。在许多问题上，党的领导成员公开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此外，党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划清自己同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些国家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这些缺陷加速了制订新的基本政策纲领的工作。

哥德斯堡纲领是1954年在维利·埃希勒的领导下开始起草的。经过全党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后，1959年全党以压倒多数通过。

在哥德斯堡纲领的基础上，《八五大纲》（《德国社会民主党1975—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用更精确的语言阐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党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政策、

国家观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战略。这个到1985年为止的长期纲领提出了党对于在哥德斯堡纲领以后的年代里才引人注目的那些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它的基本内容是较为详细地重申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

论点二十二：哥德斯堡纲领概括了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诞生以来近一百年中积累的经验，使这些经验凝成一个新的前后一贯的社会主义体系。它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已正式脱离早期那种不现实的幻想。它使党纲同实现党纲的任务相协调。它坚持按照自由、平等和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来根本改造社会的目标。党已不再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进行一次大的努力来改变制度，而是理解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改良过程。

这个新纲领在德国引起了三种不同的反应。右翼各派声称，这个纲领旨在欺骗公众，因为纲领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无害的，而实际上它的目标仍然是用革命手段实现社会变革。激进的左翼各派则把纲领看成是社会主义传统的胜利。他们对纲领不象过去那样片面地支持工人阶级和写上传统社会主义要求，感到失望。他们特别不喜欢纲领所设想的有区别的经济政策、改良思想和争取成为全民政党的方针。但恰恰是新党纲的这些因素使绝大多数人产生了希望，认为党现在终

于有可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通过纲领之后，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同各种社会和政治集团讨论纲领的内容，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同教会的关系。这些讨论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关系得到了改善。在历次选举中支持党的选民一次比一次多。1966年社会民主党在联合政府中成为小伙伴，而到1969年大选中就成了新联盟中的主角。

但是在党的内部，向青年一代宣传新纲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的任务，却受到了忽视。青年一代不再能充分理解党以往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正是党纲的基础；也不能充分理解纲领阐明的目标包含着的各种社会变革行得通。其结果是，党经常采用社会主义的某些老概念。这证明只是通过党纲并不就意味着它已经在党内生根，只有经常进行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

威利·勃兰特（自1964年迄今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在1979年说过：

“哥德斯堡纲领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民主。不时有人断言哥德斯堡纲领意味着摒弃社会主义，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错特错了。”^①

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是这么写的：

“只有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才能开辟通向自由的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努力建立这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

^① 威利·勃兰特著《哥德斯堡纲领没有错》，1979年柏林出版，第4页。

会制度。”

“社会党人努力建立一个社会，使每个人得以发展自己自由潜力并作为公共生活中服务性的一员负责地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自由和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的尊严就在于享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权利，同样也在于承认别人发挥潜力和平等地参与缔造社会的权利。”

“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

“我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民主必须成为普遍的政治社会制度，因为只有民主才真正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人的自我负责的尊重。”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成。”^①

第 二 节 今日民主社会主义

基本价值

论点二十三：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的内容、它们的平等地位以及它们在生活各个领域的有效性，规定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译者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完全民主,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切塑造社会的方法都必须以此为目的。

一、基本价值的作用

哥德斯堡纲领把这些基本价值具体化,作为评价现有条件和改良方案的标准。这样做有助于阐明社会主义政策的目的和手段。根据哥德斯堡纲领,决不能象苏维埃共产主义那样,用手段(例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代替目的。不仅如此,还必须毫不怀疑地肯定,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是“历史”,而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办事的人民。这些基本价值都适应改良政策。同预制的社会模式相反,这些基本价值允许一步步地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为经验和变革的相互作用留有余地。

实例:

共产党纲领中所说的目标,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而不是实现基本价值。这两者一旦实现之后,如果发现它们并不符合人民的需要,那就不能加以重新考虑,因为它们本身就被看成是目的。如果允许对此进行更正,那么党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特性。民主社会主义则把基本价值作为要实现的唯一目的。如果一家公司社会化了,这将被看成是肯定基本价值的手段。如果事实证明社会化并不成功,那就可以公开地讨论可能作什么改变而党并不会失去自己的特性。

二、基本价值的内容

自由、公正和团结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公正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的自决机会。团结要求每一个

人作为服务于社会的成员来行使他的自由权。只有这些基本价值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都有效，才能认为这些基本价值已经得到肯定。

经验

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和莱奥纳特·内尔松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对于阐明基本价值都起了作用。在辩论纲领时，内尔松的学生威利·埃希勒和格哈德·魏塞尔引进了这些因素。纲领本身对基本价值只作了简短的解释。由于两个群众性政党在联邦德国的政党体制中占有统治地位，也由于联邦共和国实行比例代表制，因此，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政党争夺的选民，都是在政治上处于中间地位的那些大社会集团。六十年代，德国出现了某种左转的趋势，表现为1969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即所谓的社会—自由联盟。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党也用同社会民主党一样的词汇来表明它们的原则，即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政党之间确实存在某些一致的地方，但也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些分歧，社会民主党的《八五大纲》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作了更精确的阐述。

自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权在公正和团结互助的限度内发展个性。自由也意味着摆脱低人一等的依附地位。用正式的法律用语来说，自由是指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但是只此还不足以保证自由得以实现，而必须加上物质—社会方面的因素。这意味着个人必须确实具有可以自我负责地过生

活的物质条件，亦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

因此，自由要有一个前提，即人人都有可能得到培养和进一步受教育。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公正意味着平等的自由，亦即人人天生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就象自由只有在具备物质和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样，公正也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有平等和真正的机会自我实现时，才能取得胜利。

团结给自由以实质和节制。它有双重含义。从社会主义的传统来看，团结是指共同为平等权利而斗争的人们联合起来互相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力量较弱的社会成员也能得到自由。团结还有一个一般性的含义。团结是人们相互依存的表现，它鼓励人们互相帮助和用负责的态度处理相互关系。团结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人们愈是把其他人看成自由和平等的人，团结的情谊也愈有可能形成。

平等的地位。上述基本价值除了它们的内容之外，还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适用于生活的一切领域而取得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种平等的地位意味着不能为了假想中的平等而取消自由。也不能把自由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这样做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团结是不能强加给社会的。

实例：

在英国，公学制度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一种表现。由于学费昂贵，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才能上这些学校。这种方式造成了一个上等阶层，更重要的是还形成了阶级的结合。这就意味着这些学校的学生得到特殊的待遇，在工商界和政治界取得最上层的职位。他们互相帮助。这种自由观导致极大的不平

等,这种不平等一代传一代,减少了无特权阶级行使自由权的机会。

而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挪威的纳维亚国家,建立了为全体人民提供教育的综合学校。每个学生都有发展自己才能的同等机会,而不论他们的社会出身有什么不同。学生们尽量在一起活动,天资较差的人也有机会享有最好的培养条件。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超越社会出身的界限,加强相互之间的社会团结力,平等和团结是自由的前提。

在联邦德国,保守派把公正解释成公正地提供机会。他们反对机会平等。他们要保持德国的传统学校制度。他们认为,天资较高的儿童应尽早上特有的学校,其目的是使他们将来能受到高等教育。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有些看来能力比较差的人常常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保守派主张从小就把儿童区别对待和选拔较有天赋的儿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使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社会差别固定化,因为“较有天赋”的往往是中间阶层家庭出身的儿童。保守派忽视机会平等,而赞成让有特权的人享有更大的自由。社会民主党人选择综合学校制(如上所述),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公正概念。

动机的多元性

论点二十四:大家同意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这是社会民主党人共同行动的前提。基本价值可以有不同的动机;可以是宗教的、哲学的或人道的动机。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共性,也为了尊重宗教

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把一切动
机都看成是平等的。

在一个长时期内，社会党人内部由于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而存在分歧。但是，不同的观点，甚至看来似乎截然对立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科学目标和信念，都能在它们关于人和社会的思想的基础原则上找到共同点。应当用这种共同点来建立一个无愧于人类的社会。

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社会党人的观点主要来自人道主义传统，古典哲学和基督教道德。

人道主义传统把人及其需要和能力，看成是社会的最重要因素。乌托邦关于一个美好社会的计划，是把人作为对象的，这种乌托邦计划十六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它在许多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们，尤其是康德，提出了人道主义的社会观。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应组织得使任何人都不会只是为他人目的服务的工具，相反，必须保证社会所有成员都享有自决权。这种“绝对命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这就是哥德斯堡纲领在列举社会主义的各种可能的动机时没有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把基本价值作为标准，那么民主的马克思哲学也可以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一种动机。修正主义和内尔松及其门生的伦理社会主义都从康德得到启示。基督教教义认为社会应该建立在兄弟情谊的基础上。从一开始（早在1842年魏特林时期）基督教教义就被看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动机，而从魏玛共和国以来，情况更加

如此。

为什么会存在动机的多元性

1970年在东京举行了亚洲民主社会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的讨论表明，哥德斯堡纲领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亚洲多种多样的宗教。尽管各种宗教的教义和仪式差别很大，但是一致同意人道的社会必须保证团结和平等的自由。全世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联合所有赞同这些基本价值的力量。党应当尽可能地取得最大效果和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基于这个观点，党不应规定人们承担政治义务的动机。党内当然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但如果就这样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那将是错误的。适用于党内的原则，对整个社会也是适用的。

国家必须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个限度内，国家不得为某些价值而采取行动。至于个人如何运用他的基本权利，那就完全应当由个人自己决定。至于国家愿意用什么动机来为这些基本权利辩护，从法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

哥德斯堡纲领清楚地说明，党尊重教会及其社会责任，这就结束了民主社会主义把教会看成对立面的长期历史。

实例，

对共产党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决定人和宇宙的起源。党领导不允许党员在这些问题上其他的信仰，尽管这些信仰同政治毫无关系，而那些真有其他信仰的人就象任何抱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一样受到迫害。因此，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掌权，都

禁止发扬其他意识形态观点。不同的意见只能秘密或私下发表。1978年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基本政策纲领宣称，该党的政策以基督教的原则为基础。他们不同意说他们的政策也可以出自其他动机。这样，他们就把非基督徒变成二等公民。

库特·舒马赫在1946年写道：

“作为德国人，我们必须理解，同一个人既可以是社会主义者，又可以是民主主义者，无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是经济分析方法、理性哲学的哲理、道义和伦理原则，还是基督的山上宝训。”^①

哥德斯堡纲领写道：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道德、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宣扬任何终板的真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赞赏或漠视各种信仰、观点或宗教的真理，而是出于尊重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关于这些问题政党和国家都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威利·艾希勒1968年写道：

“这是一次伦理革命……使伦理离开党的意识形态的总框架，直到可以把伦理作为信念提出来，这种信念应当作为总的伦理准则为政治服务。这种做法之所以是新的，并不在于它确立了新的规范，而在于认识到不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伦理规范之间的差别，主要不在于它们

^① 库特·舒马赫的这段话见于《民主的守卫者——库特·舒马赫传》，1954年柏林出版，第二卷第308页。

的内容,而在于它们的哲学上和宗教上的动机;就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中所说的,它们的不同在于各自都要找终极真理。”^①

一个无愧于人类的社会的基本要求

论点二十五:如果要使基本价值成为政治行动的有效准则,那就必须具体地加以表述。一个无愧于人类的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根据历史经验来决定基本价值的。这些基本要求规定了组织条件,没有这些组织条件,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些条件是:把民主作为总的生活方式,排除任何形式的专政,平等的教育机会,在社会各个领域都鼓励健全的(多样化)生活和国际团结。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党在对自由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无效纲领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实例:

主张社会主义应以基本价值为指针的人想要避免两个错误:(一)过于抽象而实际上没有约束力的原则;(二)过于详尽而使社会变革成为不可能的规定。南美洲的独裁者总是声称,他们为了自由而取消民主。他们说,他们想要阻挡共产党

^① 威利·艾希勒著《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个人和集体》,1970年汉译版出版,第72页以下。

势力,而且他们多次把任何改良运动都说成共产主义。他们避免具体说明他们所谓的自由和行使自由权的必要条件。他们给自由下的定义过于抽象,使他们只要引用一下关于自由的某种毫无意义的定义,就能随心所欲地削弱或摧毁自由。

共产党也说要自由。但他们的纲领中连篇累牍地谈的并不是关系到人民本身的事,而是理论。他们从上而下地详细规定社会的结构,以为这种社会将让人们行使自由权。但是,他们由于坚持这种结构,就取消了人们提出批评的机会,也使这种结构失去了发展和改进的机会。

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

论点二十六: 民主国家不只是实现多数人支持的政策的最佳方式,并且民主国家本身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政治上确保平等和自由,并保护工人选出代表的权利。

由于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得到贯彻和实现而建立的国家,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传统的自由的和多元民主的国家。国家必须尊重其公民的尊严,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为公民服务。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制订联邦德国的宪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宪法的第一条就宣布,国家的一切活动必须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因此,国家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这也表现了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维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侵犯。

哥德斯堡纲领在这方面引用了联邦德国基本法的有关条款,其中规定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迁移自由,信息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利,不允许任何法律或国家的任何法令把它取消。这个原则是法治所必需的,而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分权对它又作了补充。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民主国家里,一切政治权力必须来自人民。这种权力由议会中的人民代表行使,议会则由全体公民平等投票选出。

同多数派的权利连在一起的是少数派一定要有采取反对立场的权利。如果认真对待民主自决的思想,那么各党就必须不受任何阻挠地为争取人民的支持而进行竞争。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以平等条件同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竞争,以取得多数人民的授权,来实现它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民主制度不会只靠定期的选举就得到实现。它需要有尽量多的公民经常地和积极地参加政治进程。政治权力愈是分散,公民就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采用联邦制结构,并授与地方当局尽可能多的自决权。

虽然民主国家同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原封不动地保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相反,国家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国家必须塑造社会结构,使之适应于每个人都有权使自己的尊严得到保护。民主国家的责任和任务是创造条件使个人能自由地自行作出决定来发挥自己潜力。因此,社会的组织并不是为了当监护人,而是为了向个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使人人能行使自决权。

民主国家要按这种方式塑造社会,就必须具备一个必要

的条件,这就是:只有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某些强大的团体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势力能对国家的行动起最大影响。各种团体有权参与制订政策,但是多数人的意志必须永远高于这些团体的特殊利益。

实例: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69年上台时,立即着手改变那些阻碍权利平等的社会结构。他们首先改革教育制度,使之更加平等。其结果是,下层阶级有天赋的儿童在中学时就开始领取奖学金。这是为了保证家长不致由于经济原因而过早地被迫让子女停学。父母收入低于某个标准的学生也同样有资格领取奖学金。高等院校的数目增多,并免收全部费用。社会民主党认为国家也有责任防止失业。从1974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联邦德国失业人数增加以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向工业部门提供各种资助,鼓励工业部门改革结构,以减少失业。它把这样做看成是政府的任务。1978年英国保守党上台。他们从那时以来逐步地减少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责任。他们认为应该让私营部门的各种力量对经济和社会起作用。为贯彻这种政策,他们听任失业数字不断增长,听任社会对穷人的资助减少。这就再一次表明,这种政策只有利于掌握经济权力的人,而反对多数人的利益。

哥德斯堡纲领写道:

“国家有义务保护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并按照个人的意志而行动。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尊重其他公民的信仰。国家有义务保障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

“国家应当创造条件,使每一个人得以发挥自己的潜

力，表现对自己和对整个社会负责。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应该保障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而且还应该作为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权利而成为国家的基础。”

“一个社会国家必须照顾公民的福利，以便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行使自决权，并且促进一个自由社会的发展。”

“通过把民主的社会价值同公正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国家将成为一个由各种社会力量确定其实质并且为人民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

《八五大纲》进一步发展国家概念

1969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后推行的改良政策在联邦德国遇到了反抗，这引起了新的问题。这个联合政府建议的有些改革，如职业教育方面的改革，由于受到雇主的反抗而未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认为，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民主制度还不足以推行真正的改良政策。他们论证说，只要资本主义因素还存在，国家就会受到限制，即使政府有良好的愿望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们认为，现在统治国家的是生产资料的强有力的所有者及其团体。不仅如此，即使民主国家也必须尊重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国家在原则上不能推行同大企业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条件相冲突的社会政策。因此他们说，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即使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无力在自己的政策中注入社会主义原则。

《八五大纲》研究了这种批评，也研究了另一种指责，即社会国家日益增多的措施导致国家集权主义，正在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缩小个人自决的范围。

西方工业国的国家、经济和社会之间存在多重的相互关系，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按照私有的方针组织的，因此国家在许多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国家不是一个居于社会之上的中立的裁判，而是被卷入各种社会利益的冲突之中。国家的行动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国家每贯彻一项新的改革，都得看到和考虑它的许多方面的从属地位。但是在民主国家中，这种从属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和工业也要依靠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各种服务。另一方面，民主制的国家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必须使多数人看到这些行动对他们的好处。凡触犯经济利益集团的国家行动难免会遇到相当大的抵抗，但民主国家可以顶住这些利益集团而为自己打开道路。能走得多远取决于多数人积极支持政府政策到什么程度，也取决于在遇到抵制和发生动乱时多数人是否继续支持政府政策。因此改良政策也要依靠人民广泛和自觉的支持，使政府可以不顾压力集团的反对而执行这些政策。这种支持不能只表现在议会中。只有通过拥护改革的广大群众运动，国家才能实行有利于多数人而不利于社会上有势力阶层的政策。

《八五大纲》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国家和社会决不能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赃物’（引自哥德斯堡纲领）。必须力争使国家对大企业保持独立，必须加强国家自由地、公正地本着团结精神发展社会的能力。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同时必须给予职工更广泛地参与决策进程的权利，捍卫工会对资本主义的‘抗衡能力’，扩大政府对私营经济

采取行动的范围。”

“社会民主党建设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的政策，需要多数人民的信任。这种政策必须谋求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发展，同时稳步推行改良。如果改良的诺言没有兑现，或者经济的发展受到破坏，人民的失望情绪就会动摇信任这些政策的民主基础。这种信任的基础也包括社会国家继续保护人民，特别是保护经济和社会上力量较弱的社会成员。”

人民的政党

论点二十七：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谋求确立新的特权或偏袒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它为一切向往权利平等的人服务。它必须在能够接受这种纲领的社会各阶层中谋求支持。在一个拥有许多社会阶层的社会，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赢得多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是人民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在其以基本价值为基础的公共福利的总概念下，将一些个别的社会利益集团联合在一起。为了使这一概念成为现实，它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既适用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内容，因为扩大自决程度的政策要依靠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也适用于在民主的社会中争取到多数人授权的机会，因为在具有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中，只有把一些不同的

社会集团联合在一起,才能赢得多数。社会民主党自称是“人民的政党”,并不是因为它简单地反映了居民的构成,它也不想这样做,因为旨在消灭特权的政策只会得到特权集团中个别人的支持。党向一切支持其宗旨的人开放,因为党的主要宗旨是给每个人行使自由权的平等机会,人民中因为消灭特权而得到好处的阶层在党内所占比例是很高的。

实例:

如果只是按照党自己的理解去代表一部分集团的利益,那还不足以成为人民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从其成立伊始直到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很久已经这样做了。党还必须考虑不同集团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必须使这些集团把党的政策和提法看成自己的东西。社会民主党已经变得习惯于让来自各阶层的人民积极参与它的工作。

基层工作

论点二十八:一种旨在给人民更多自决权并从而改变他们生活的社会秩序,是不能由上面强加于人的。这种秩序必须产生于人民自身的经验和生活条件,才有可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时刻准备对付强有力的反抗,因为它是反对现存特权的。民主社会主义需要得到全社会的一个强大运动的支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靠议会和政府工作是不够的。

图表21: 就业人数占居民人数百分比的变化

就业人数占居民人数的百分比								
日期	总数	职业类型				产业部门		
		独立经营者	当助家庭的成员	公务员和职员	工人	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其他
1882年6月5日	42.3	25.6	10.0	7.0	57.4	42.2	35.6	22.2
1895年6月14日	42.9	23.3	9.1	10.7	56.9	36.2	38.9	24.9
1907年6月12日	45.6	18.8	15.0	13.1	53.1	33.0	39.9	26.2
1925年6月16日	51.2	15.9	16.9	17.0	50.2	30.3	42.3	27.4
1933年6月16日	49.4	16.4	16.4	17.1	50.1	28.8	40.5	30.7
1939年5月17日	51.6	13.4	15.8	21.7	49.1	25.0	40.8	54.2
1950年9月13日	46.2	14.5	13.8	20.6	51.0	22.1	44.7	33.1
1961年6月6日	47.7	12.1	9.9	29.9	48.1	13.4	48.1	38.5
1971年4月	44.0	10.2	6.3	36.8	46.7	8.4	48.9	42.6

萨尔州1951年11月14日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

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的基本内容,朝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使个人能行使自决权,而把这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正因为这样,所以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它本身就是完全的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

看法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从上而下地改变社会生活，不管其动机多么好，都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内容。只有在社会的变化反映了人民自己的实际经验和表达出来的意愿时，人民才会承认并接受他们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和自决的新机会。

因此，仅仅根据这一条理由就可以说，社会的任何变化如果是强制的结果，或者有关的人没有参与其中，那就必然失去其社会主义内容。也就是说，那么也就失去取得更多自决经验的机会。如果要使导致社会变革的步骤成为正当的，甚至仅仅为了使它们行得通，那就必须使受其影响的人民能把这些步骤看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即使能够违反人民的意愿推行这样的变革，那么这些改革既不会取得最好的效果，也不会使人们看成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旨在通过自决维护所有人的尊严的政策，如果是命令人们干这干那，就决不会达到原来的目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而如果要让这两者真正结合在一起，那么社会变革的前景就必须产生于人民亲身的经验，而不是由制订计划的少数上层分子越过人民头上来起草纲领和加以实行。为了使社会变革的前景能够成功，首要的是通过有关的人民和负责的政治家之间的对话，讲清楚行动的道路，以及对变革的阻力和变革的影响。

经验和问题

1969年更换政府之后，社会民主党改良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在人民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州政府之间引起了信任危机。

其原因在于人民中某些阶层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的具体意图缺乏了解,以及对改革会带来问题缺乏准备。许多人只看到变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不理解政策的目的,这是因为他们很晚才得到消息,而且消息往往还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因为有些政策的目的没有讲清楚而感到恼火,这就使保守力量有时颇为轻而易举地就使人们转而反对改革,尽管这些改革本来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由于这些经验,也由于懂得了改革国家的可能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因此,《八五大纲》就如何建立信任作为顺利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政策的主要前提,提出了建议。

《八五大纲》规定的目标

建立信任的工作有两个目标。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通过不断同人民对话,可以了解公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真正经验、愿望和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政治行动同人民的直接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从人民的实际信念和经验出发的。在另一方面,它向公民传达党的原则、长期的改革建议和讨论的结果,从而使公民知道党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要使这种意义的信任建设取得成功,那就必须认真地进行人民认为可信的双向交流(即从党外到党内和从党内到党外)。只靠党的宣传无益于这个目的。

建立信任也是组织党同其他民主力量和倡议合作的手段。它鼓励和支持人民努力找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向人民解释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所作出的决定,说明必要的妥协同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和公民利益

之间的关系。

基层工作和议会工作的配合，给予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策以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并根据有关的人们的经验和需要对这种政策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在有关的权势集团的阻力引起社会不安的困难阶段，这两者的配合可以使建议中的改革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两者的配合通过同人民的对话可以解释改革的目的、全体有关者的利益同出现的任何冲突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可以使人们出于信念而积极支持改良政策，这是进行改革并随之使改革见效所必要的。

实例：

无论一个党的干部多么善于执行政策决定，总归不能满足于执行党的领导“在外面”决定的政策。他必须同党的积极分子一起去找那些受这些决定影响的人民谈话。他必须清楚地说明人们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说明哪些社会力量反对这些决定。他还必须能够解释政策的目的是。这种对话根据有关集团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但绝不能用职业政治家的套话，而要用有关的人熟悉的语言。如果只是偶尔这么做，而且几乎只在快要选举时才这么做，那么党员就不会感到自己是当事人。他们将认为党只是要他们的选票和他们的支持。因此，对话必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必须进行讨论，尤其在作出决定之前要进行讨论，使有关的人们的愿望、担心和意见能受到考虑。这样才能使那些受影响的人感到自己受到认真的对待。

如果有一些人为了提出他们的情况和理由，或者为了自己动手解决一个问题而成立自己的组织，例如为宣传建立养

老院或儿童游戏场而成立一个公民行动团体，那就宁可帮助他们，不要试图把他们拉进来做党的工作。这样他们就会看到党并不是采取自私的态度，而是想要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样的讨论中，一个党员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说明犯错误的原因，就会赢得信任。任何人想显得从不犯错误，总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

党的干部和党员的任务是在持续不断的对话中证明，党是现存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机构。

混合的和民主经济

论点二十九：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自决和社会责任感。只有建立一种把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和监督手段结合在一起的 经济，才能实现这些目标。经济决定必须民主化，从而使有关的人能尽可能地直接参与决定。

基本原则

对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经济进行衡量的标准，是它必须反映民主社会党人的基本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在应用于经济的具体社会职能时，需要有稳步增长的繁荣来创造条件使所有人都享有自由，使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经济的成果，从而使大家的个人自由有相同的基础，使所有人在企业界和工作中都能摆脱屈辱的依附地位和经济剥削。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不可能只用某一项措施，如全

面社会化，来实现基本的经济价值。全面国有化和集中管理有可能导致财富的公平分配，但不能带来个人自由和全面社会繁荣的最大增长。负责集中计划的官僚机构缺乏灵活性，不能保证最有效的经济发展，也不能让劳动者有效地参与决策。如果用不受集中控制的独立合作社来代替私营企业，那么公平的分配和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就会被忽视，社会利益也会被忽视。不仅如此，历史已经表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也是达不到上述目标。

权力和国有化

经济自由和公正的实际障碍，是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受民主的监督。这种集中可能采取不受限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也可能采取更加露骨的和管理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形式，或者是自私的合作社的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变种有一个基本的错误概念，这就是以为一旦消灭私有制就可以保证自由和公正。这个错误的概念起因于对私有制的错误理解。所有制实际上只是些决策权的总称，它的确切内容和范围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化。只要有关的人们充分行使或至少是部分行使某些决策权，那么即使私有制并没有正式被消灭，也会有一部分经济权力受到民主的监督。因此，重要的在于使决策权真正民主化，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改变所有制。

社会责任的分配

分配社会责任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把以往集中在私人手

中的决策权拿过来，再集中到别的地方，例如集中到政府手里。而是对各种经济权力逐个进行审查，看在谁的手里最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工作和人事问题，最好由企业的劳动者和他们的代表来处理。招工、解雇、工资结构和投资问题，可以由(经过分权的)企业管理部门和职工代表去决定。劳动保护、保健、生产环境保护和基础结构投资应由主管全面工作的社会团体负责。工资和总的工作条件(工时)应由工会同企业管理部门谈判。至于结构政策、社会基础结构和投资监督，那就需要政府的基本计划同管理部门的决策密切配合，以最好地完成经济的社会职能。

怎样在那些负有社会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具体分配决策权，这取决于人民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将有所不同。

社会监督的手段

哥德斯堡纲领关于经济民主化的概念，提出了控制经济权力的各种不同的手段。这些手段是逐步升级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其他手段确实失败的情况下才实行更广泛的控制。纲领把市场看成了经济决策的一种手段，市场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比其他的控制手段更好地完成经济的社会职能。

劳动者对公司的一切基本决定有平等的共决权；
法律保证劳动者对有关劳动条件的决定发有言权；
法令规定最低程度的安全、保健和人道的劳动条件；
有些经济部门设立不谋求利润的公营企业以维持竞

争；

大公司有义务公布帐目，以便让公众监督；

通过竞争政策和投资监督由公众对统治市场的力量加以监督；

用政府补充计划作手段来引导和限制市场趋势，（“凡有可能，开展竞争，凡有需要，实行计划”）；

在分权自治的基础上将各大企业收归国有，同时适当照顾消费者、工人和公众的利益。

实例：

在美国，私营企业的经理总的来说一直可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完全由他们按照经济情况决定招工、解雇、岗位设置和其他许多问题。工人自己的地位是十分不稳定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失去职业。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对于决定哪些劳动队伍的成员出于社会考虑而应该留职，哪些成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较有可能找到新的职业，都没有（通过自己的代表）发言权。不让工人有权参与影响自己切身经济利益的决定，是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尽管美国的工人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增加消费机会并不能补偿在企业一级所缺少的自决权。

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所有职业都有保障。但从整体来说，工人只有建议权，而无权真正参与企业的决策，因为这样做就会同政府对企业的集中管理发生冲突。这些国家的职业保障是以牺牲真正的共决为代价的。此外，工会是执政党的附属品。它们只能提出讨论党所批准的问题和维护党所

批准的利益。这种集中控制损害灵活性和经济生产率。消费品常常供不应求,生活水平低于相应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职业保障是以其他缺点作为代价的。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迄今为止只有钢铁工业实行平等共决,社会民主党人想在其他工业中推广这种做法。当钢铁工业已经无法避免裁员,而工人代表为了保持其他职业也同意裁员时,管理机构和工人代表共同作出了有关决定。他们决定哪些工人决不能解雇,决定被裁工人应得到什么帮助。对那些失去职业的人提供了由公家出钱的改行办法进行其他职业训练或进修计划,使他们更有可能找到其他职业。由全体工人交钱建立的失业保险计划使失业工人可以拿到原工资的四分之三。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想有其他手段来改善对经济发展的全面监督,以帮助减少失业。现有的这种手段包括对投资的管理和政府监督公共基金对私营企业的拨款。社会民主党在本届议会内不占多数,它在联合政府中的伙伴自由党不支持这些措施。

市场和社会利益

一个起作用的市场是服务于社会利益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允许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和允许选择职业的自由。这些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在社会规定的范围内允许自由竞争和管理者的主动性。

哥德斯堡纲领主张在农业部门提倡合作社,以加强中小型农场。这些农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保障。

哥德斯堡纲领坚持在经济方面实行全面社会责任制和自

决这两项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谋求通过多种协调一致的手段，而不只是靠某种现成的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

哥德斯堡纲领写道：

“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断增长的繁荣，人人公平地分享经济的收益，在自由中生活，消除屈辱的依附状态和剥削。”

“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以及自由竞争和管理者的主动性，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基础。工会和雇主协会在缔结劳资合同时的自主是自由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权主义的强制性经济破坏自由，因此，社会民主党赞成凡真正存在着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凡市场受到个别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须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凡有可能，开展竞争，凡有需要，实行计划。”

“公有制是任何现代国家都不会放弃的一种公共监督的合法形式。它有助于保护自由，使其免遭占优势的大经济组织的侵害。大企业的支配权现在主要掌握在经理手中，他们本身又是为那些匿名隐姓的势力服务的。因此，私有主已大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经济权力问题。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能保证把经济权力做健全的安排，那么公有制是适宜和必需的。”

“经济权力的任何一种集中，即使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本身都孕育着危险。因此，公有制应以自治和分权为

原则。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机构既要代表公众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也要代表职工利益和雇主利益。为社会服务的最好方式，不是集权的官僚体制，而是一切有关者共同负责的合作。”

“社会民主党支持农民私人占有土地。必须颁布现代的土地法和土地租佃法，以保护效率高的农户经营，同时，要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加强这种经营。”

“发展合作社制度是提高中小型农户经营的生产率并维持其独立性的最好途径。”

《八五大纲》中经济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市场局限性问题以及政府用以纠正和调整市场的手段，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工业民主国家，政府对经济负全面责任，但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拥有有效地履行这种责任的适当工具。最初，政府想用收支政策达到的目标一般只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全球监督），以防止大规模的失业。然而，它们很快就不得不接管结构性发展，即按地区和产业发展经济。这是因为工业分布的不同和国际竞争条件的变化造成了不平衡。全面的政府补贴只会加剧工业的集中和结构的悬殊。不再有活力的工业最终会得到支持。此外，在许多情况下，私营工业利用政府为减少失业而提供的投资补助，用于进一步使生产合理化，而这又只会使失业恶化。由于不加约束的工业化，环境受到更大的破坏，从而给政府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有鉴于这些新问题，《八五大纲》发展哥德斯堡纲领的经济概念，概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方

式方法。

生活质量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是自然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必须重新考虑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方法。应当更精确和有效地阐明经济增长的人道目标。

市场的弱点

市场具有许多内在的弱点，因此如果任其自流，市场的发展就常常会有损于社会，只有利于经济力量强大的少数人。市场的主要弱点是：

导致权力的集中和竞争的削弱；

只满足有购买力的需求，这意味着市场并不比现行的收入分配制更为公平；

不提供基础结构(如学校、道路、医院)，因此，不能满足公众的基本需要；

市场本身并不保障充分就业、货币稳定、持续增长或环境保护；

不考虑未来的需要和要求。

市场管理

然而市场由于其灵活性而有许多长处，因此不能取消公司一级的非集中的最终决定。与此相反，应把公司决定权纳入政府规定的社会目标的框架之内，从而保持公司决策的长处，消除它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这种类型的政府基本计划确定当前的一切公共开支，向私营企业的经理提供有关目标的信息和为私人企业的投资指示范围，因为私营企业的经理可以看到在什么情况下政府会作出必要的贡献。他们必须把超过一定规模的投资通知政府的计划人员，从而使后者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监督手段来保证整个经济结构的适当发展。从整体来说，这种投资管理是间接地通过投资规定、制止和帮助，以及基本计划和财政措施来实现的。上述各种投资管理手段也能用来照顾环境保护的需要。此外，应在大企业内实行平等共决。各种管理手段合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用混合经济来满足全面的社会利益。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政府计划和市场机制适当地结合。

《八五大纲》明确地宣称，随着条件的变化，必须经常研究和调整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之间的关系，市场力量同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关系。

《八五大纲》写道：

“我国象其他所有的西方工业国一样，也存在将自主的市场机制同政府的计划和指导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由个别产业处理生产资料以及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与此同时，也要求政府能有恰当的手段去影响、促进、计划和控制经济的进程，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

“即使坚持不懈地执行基本经济计划，而且计划又是在对商业趋势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制订的，这也不能完全防止错误的结构性趋势和不如意的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应试用补充手段,其中有些手段是现在已经可以使用的;

具备某种规模、某种性质或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投资,应事先通报(参考建筑法);

由得到授权的政府计划工作人员审查私人企业准备进行的投资是否有可能造成或造成多大程度的不良的或有害的后果;

投资得到批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参考批准建筑施工的要求,以及地方法和环境法的要求)。

禁止投资(如禁止新的建设或生产的规定),环境保护规定,质量标准等。”

“如果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补充手段,那么首先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保证所采取的步骤首先要适合于以下原则:

“非集中的、以市场为依据的管理的替代办法不能只是按理论形式来设想,然后才要求把它们付诸实施。我们还必须保证,确实可以用我们的组织能力在政治上为可行的目的运用它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和应用重新组织非集中进程的手段以保证它们能在我们愿望的范围内起作用。为此目的,必须改进庞大的政府管理机构的有限的能力。”

总结论点二十五至二十九: ~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和《八五大纲》将历史经验同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新概念的见解结合在一起

起。社会主义是在任何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等基本价值的原则。这些基本价值成为在团结中生活和享有平等权利的自由人民的社会目的。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特权将由民主来取代。只有实现自决的人民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是一项永久的任务。它只有通过阐明另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具体概念才能逐步实现，这种社会结构要由多数人来判断，并在民主监督下变成现实。新出现的情况必须总是根据上述的基本价值来加以研究。社会主义政策的手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任何特定的社会情况下都必须有所发展，并用基本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

对社会党人来说，民主本身就是目的，这不仅是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满足平等和自由的要求，而且还因为民主使得有目的地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变革可以实现。尊重人权和在政治上反对派的权利，是民主的必要因素。

有些人追求民主社会主义目标，可能是出于宗教上或哲学上的考虑或其他信念的决定。不需要对此进行政治上的估价。共同的目标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不同信仰的人联合在一起。

自决和满足物质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这些目标不能只通过国有化或集中计划的手段来实现，而需要一种把非集中的主动性、全面的经济监督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制度。最重要的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使人民能真正和切实地参与决策；能以最少的努力保证充分的物资供应和服务的经济结构。

第六章

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

人们曾经长期希望,只有实现全面工业化,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一旦实现了工业化,社会主义就会成为几乎不可避免的。工业福利国家发展的情况使得这种希望破灭了。今天,过度的工业化正在破坏自然环境,从而破坏我们的未来。污染危害健康。大规模的工艺要求等级式劳动组织和服从纪律。对许多人来说,集中化的福利国家过于复杂。直接的自助和社会援助太少。如果现在的原料消耗率继续下去,那就意味着工业社会将在近几十年内终结。工业社会不能就照现在这个样子过下去,也不应该要求这样过下去。

论点三十:全面工业化并不一定导致人道的社会。

工业化的有些效果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而另一些效果则阻碍这些价值的实现。社会决不能成为工业和技术的奴隶,而必须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去掌握工业和技术。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象在其他西方工业社会一样,民

主社会主义的有些基本要求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而其他一些基本要求则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

实例：

现在，即 1981 年，由于实行了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生活和保健都得到了保证。任何月收入少于规定的最低水平的人可以根据法律得到社会救济。任何月收入少于 2800 马克左右的人都享受法律规定的健康保险计划。每个人都有权领取养老金。

在工厂和行政管理部门，法律保障人们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都有严格的条例规定。参政权、基本权利和政治活动自由都得到保证。政府尽可能地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全面负责。然而，大多数工厂中和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中的职工还没有平等的共决权。政府实现经济政策的手段仍然是落后的。政府缺乏管理投资的手段和保护社会利益不受大公司损害的手段。其结果是，多国公司可以破坏政府的经济政策。

经济繁荣正在造成新的问题。愈来愈多的人“退出”富裕社会，吸毒、酗酒和厌世的情绪在蔓延。许多人还在继续过日子，但不再认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宝贵的意义。个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发挥主动性的机会很有限。复杂的社会及其各种规章制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人们愈来愈眼花缭乱。人们由于不知所措而忧心忡忡或咄咄逼人。

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许多领域里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七十年代初以来的发展，使人们在政治上更多地集中注意不熟悉的新问题。

事情愈来愈明显，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以及福利国家责任的不断增加，并没有使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要求自动地和相应地得到实现。人们在长时期中曾经认为工业化和集中的政府责任是进步的保证，而现在事实证明这两者在某些方面是对自由、公正和团结的威胁。

实例，

大公司把废料，有些是有毒的废料，排到过去人们可以游泳的河中，为休息或自我满足而利用自然界的这个机会正在减少。车辆的噪音，越来越危害各地人民的健康。在农业方面，产量提高，肉的质量因为使用危害健康的化学品而“提高”。许多人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呼吸的空气和吃的食物可能有什么毒素。核工厂和化学工业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灾难，并且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意大利塞威索化学工厂的一次事故，使周围地区多少年受到污染。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放射性外泄到周围的环境中，好多万人因而被迫长时期离开家园，他们回来之后仍有不安全感。

新问题

技术无限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仅损害今后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质量、健康甚至生命。

以成本和效益为唯一标准而不断应用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危险的和非常复杂的，其效果同人们的需要相反，这种情况正在给许多人的工作和私生活增加过多的负担。

不断促进繁荣,而这种繁荣一味强调干活和消费,这使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怀疑这种生活的意义,甚至对之感到绝望。这种情况经常造成精神病、吸毒以及用其他方式“退出”先进工业社会。

复杂的工业社会的许多决定是在庞大组织内部作出的,这些大组织的活动往往过于复杂,使个人难以理解,从而使许多人感到无能为力、莫可奈何和异化。

新的见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当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进行讨论时,主要就是讨论上述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虽然这一讨论还将继续很长时间,但已经可以看到某些初步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所谓“基本价值委员会”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几个备忘录:

技术若听其自流对人类社会有可能是致命的。有必要根据人道主义、社会和生态学的标准对技术的使用加以控制。不受控制的技术对人类价值的破坏要大于它通过生产率的增加所带来的好处。

从长远来看,只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并不能保证人们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保持健康的社会关系,使个人能体会生活的意义和在社会上起作用。如果所谓的进步破坏原有的健全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进步只能起副作用。

为了保证民主参与并使个人在社会上得到合适的地位,那就必须制止走向更为集中的趋势。凡有可能,就应将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实行分权。这种做法能最有效地使人们感

到满足、有动力和愿意承担义务，而这些都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

19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关于新问题的论述：

由于对物质进展的自动性失去信心以及采纳了以基本价值为准绳的进步观，经济增长必然不再象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被看成是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我们确实必须避免将增长同进步等同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基本价值为基础的政策可以脱离经济的增长。在一个经济没有增长的社会里，为货物分配而进行的斗争必然变得更加激烈，不只是在工人和经理之间，而且在通过工资谈判决定收入的人们同收入固定的人之间，在产业工人同服务业职工之间，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但是在一个分配斗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公正和团结就会相应地更难实现，而且经验已经表明，如果冲突更加尖锐，自由也会受到危害。以基本价值为准绳的政策显然不能把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排除其他一切标准，从这些基本价值来看，一个没有经济增长前景的世界也同样明显地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世界。

对进步的信念已经成为现代的生活观，这种生活观的核心是坚信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自动性将会促进和保证人道主义价值的实现。民主劳工运动认为，由于工会斗争使工人的物质地位得到改善，社会地位日益安全，由于工人政党的斗争而使社会逐渐民主化，上述的信念看来正成为事实。与此同时，对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人来说，进步的信念已经

缩小为这样一种思想：物质进步和数量上的进步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保障，而且是社会进步本身。只有少数重要的思想家及时地看出，在经济和管理上极为成功的合理化进程和现代世界的官僚化，同时也是权力日益集中、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和个人自由相应地丧失的一个过程。

第七章

社会党国际和第三世界的 民主社会主义

第一节 社会党国际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不可能只在几个孤立的国家中达到，这不只是因为这些目标要求国际团结，而且因为各国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由于存在国际分工，也由于维护和平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国与国之间必须密切合作。因此全世界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必须紧密合作，以达到民主社会主义在各国和在国际上的目标。为此目的，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重建。

论点三十一：社会党国际使各国社会党之间得以交流经验，增进团结和互助。它的结构和目标允许各个国家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取决于各国的传统和条件。

结构

48个成员党在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各有一席和一票。执行局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主要决策机构,因此,任何党都能否决执行局的决定或予以修改。这样并没有使社会党国际的政治工作瘫痪,而是使各党更多地承担责任,从而证明在国际组织内实行民主是必要的和方便的。不仅如此,对于如何在本国实行社会党国际的决定和如何在各国党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不论是以政府、公共关系上的还是党的活动,促进民主社会主义,则由各国党自己负责。各党也有义务对兄弟党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援。这种支援不仅包括帮助,也包括本着团结的精神提出带有批评的鼓励。

维利·勃兰特(社会党国际主席)于1978年写道: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里。但是我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民主的制度而努力,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原则不是由外部或从上面作出决定,而是自己负责作出决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国际的党或我们想成为一个国际的党。我们不是一个密闭的社会,而是一些独立政党的结合,各党代表感到他们能相互学习并能通过联合的努力赢得某些有用的东西……。”^①

^① 维利·勃兰特1978年在温哥华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目标

清除欧洲中心主义

在197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之后,社会党国际在维利·勃兰特主席和贝恩特·卡尔逊秘书长的领导下,通过扩大执行局加强了各个成员组织的参与。它逐渐地减少了欧洲党的比重,增加了非欧洲党的比重。通过这种方式,老的欧洲中心主义让位给逐步扩大的国际主义。今天社会党国际有一半以上的正式成员来自非欧洲国家。此外,还建立了区域性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共同体的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

新的任务

社会党国际的国际化不只是限于组织措施,还包括具体的目标。第一个例子是国际体制的结构改革。首先,逐步地、有系统地使所有国家得到安全和裁军。其次,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整个国际社会提供进行经济合作的公正基础,同时为建立政治上公正的国际秩序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两个目标是互为条件的。只有在一个将安全和民族国家的独立结合起来的和平制度中,发展才有可能。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和平是为个人、集体和国际的充分发展而建立公平的结构。

国际经济新秩序

社会党国际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为了平衡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它认为发展援助主要并不是道义原则,而是有利于一切有关国家的援助,不论这些国家的利益在

于发展，还是在于消灭生产不发达和失业。为此目的而建立的一种具有新的根本内容的秩序，将既有助于减少南北方潜在的冲突，又能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和平解决南北冲突。

图表25. 社会党国际成员党^①

正式成员党

1、阿根廷	人民社会党
2、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工党
3、奥地利	奥地利社会党
4、巴巴多斯	巴巴多斯工党
5、比利时	比利时社会党(弗拉芒地区/瓦隆地区)
6、加拿大	加拿大新民主党
7、智利	智利激进党
8、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
9、丹麦	丹麦社会民主党
10、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革命党
11、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左翼民主党
12、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民族革命运动
13、芬兰	芬兰社会民主党
14、法国	法国社会党
15、联邦德国	西德社会民主党
16、英国	英国工党

^① 根据1983年4月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材料，社会党国际现有正式成员党49个，已停止会籍的有阿根廷人民社会党和南朝鲜统一社会党，新增加的有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和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另比利时社会党分为弗拉芒地区社会党和瓦隆地区社会党两个。咨询成员党17个，增加的有圭亚那劳动人民同盟，秘鲁人民党，波多黎各独立党和圣卢西亚进步劳工党。——译者

- | | |
|---------|------------|
| 17、格林纳达 | 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 |
| 18、危地马拉 | 危地马拉社会民主党 |
| 19、冰岛 | 冰岛社会民主党 |
| 20、爱尔兰 | 爱尔兰工党 |
| 21、以色列 | 以色列工党 |
| 22、意大利 |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
| 23、意大利 | 意大利社会党 |
| 24、牙买加 | 牙买加人民民族党 |
| 25、日本 | 日本民主社会党 |
| 26、日本 | 日本社会党 |
| 27、南朝鲜 | 朝鲜统一社会党 |
| 28、黎巴嫩 |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 |
| 29、卢森堡 | 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 |
| 30、马来西亚 |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 |
| 31、马耳他 | 马耳他工党 |
| 32、毛里求斯 | 毛里求斯工党 |
| 33、荷兰 | 荷兰工党 |
| 34、新西兰 | 新西兰工党 |
| 35、北爱尔兰 | 北爱尔兰工党 |
| 36、北爱尔兰 | 北爱尔兰社会民主党 |
| 37、挪威 | 挪威工党 |
| 38、巴拉圭 | 巴拉圭二月革命党 |
| 39、葡萄牙 | 葡萄牙社会党 |
| 40、圣马力诺 | 圣马力诺统一社会党 |
| 41、塞内加尔 | 塞内加尔社会党 |
| 42、西班牙 |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
| 43、瑞典 | 瑞典社会民主党 |

- | | |
|---------|---------------|
| 44、瑞士 | 瑞士社会民主党 |
| 45、土耳其 | 土耳其共和人民党 |
| 46、上沃尔特 | 上沃尔特进步阵线 |
| 47、美国 |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 |
| 48、美国 | 美国社会民主党 |

咨询成员党

- | | |
|-------|---------------|
| 荷属阿鲁巴 | 荷属阿鲁巴岛人民选举运动 |
| 荷属库腊索 | 荷属库腊索岛新安的列斯运动 |
| 塞浦路斯 | 塞浦路斯社会党 |
| 以色列 | 以色列统一工人党 |
| 委内瑞拉 | 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 |
| 委内瑞拉 | 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运动 |

中、东欧社会主义联盟流亡党：

-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
-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
- 爱沙尼亚社会党
-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 波兰社会党
-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 南斯拉夫社会党

兄弟组织

- 国际猎鹰运动/社会党教育国际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社会党国际妇女组织

联系组织

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党组织
欧洲共同体社会党联盟
国际社会民主报业联合会
国际犹太工人联盟
国际社会民主教师联合会
工人体育国际
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中、东欧社会主义联盟

社会党国际为第三世界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特别包括，以质量为方向的新增长政策、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稳定贸易条件和第三世界出口收入的组织措施、工业国开放市场、适当转让技术和新的能源政策。

要求和目标：

1978年社会党国际温哥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策决议，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目标表述如下：

“社会党国际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将允许各国根据本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它是同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密切相连的。”

“社会党国际忠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承认这种思想关系到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和秩序混乱情况，

这种情况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这样一种世界经济体制内部相互依存的情况，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具体问题上往往相互产生破坏性效果。例如，发达国家由于失业问题，正在加强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多。”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的是在相互依存的现实情况下，本着积极的国际主义而树立一种团结互助的新精神，从而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本国私利而采取的行动，不可能解决饥荒和营养不良、不平等、物资匮乏、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贫困和污染等问题。必须认识到在这些方面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符合贫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第 二 节

第三世界的民主社会主义

同其他制度对比

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共产主义都被作为一种发展的概念而提出来。苏联提出自己的制度作为代替美国的帝国主义战略的方案，后者往往是无情地追求美国大公司的利益。

论点三十二：共产主义同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背道而

驰。共产主义奉行一党专政原则，阻止民主地作出决定。从长远来看，共产主义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由于不允许批评和禁止多元制，人民不能说出自己的需要。共产主义的发展政策依靠的是劳动军事化和强迫作出的牺牲。苏联在全世界都把它自己的战略利益放在第三世界发展的需要之上。它鼓励军事化，将东西方冲突带进第三世界。

为了维持共产党统治，就有必要对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和公民行动团体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进行镇压。这种镇压不仅同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背道而驰，而且从长远来看完全阻止了民主的发展。共产党人宣称他们致力于和平，实际上共产党人无论何时掌权，几乎从来没有对和平作出过贡献。苏联历史的突出特点，是它兼并领土（芬兰、波兰、满洲），镇压或倒转民主改革，镇压较为人道的共产主义或自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在共产党国家中，只有苏联才有权自决和独立发展，而它的卫星国都无权这样做。

在五十年代，苏联象美国一样，支持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它正确地批评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新殖民主义和干涉，支持解放运动。然而它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促进第三世界的独立和发展，而是改善它自己在东西方冲突中的地

位，使更多国家依靠它，牺牲第三世界来谋求军事和经济利益。它不仅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合在一起，还利用这个市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企图维持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比人们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更有利于作为工业国的苏联。

苏联供应军火，提供军事援助和军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化，而损害这些国家的民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自居为共产党国家的领导者，同它所批评的美国一样搞强权政治。今天，国际改革没有苏联和美国的参加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同苏联合作而取消对它的社会制度和国际政策的批评。

民主社会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者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保持殖民地附属国或通过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建立新殖民地附属国的企图。

论点三十三：多国公司和主要工业国新帝国主义为保持他们对世界贸易的统治而推行的政策，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些政策导致经济上的依附性和不公正，阻碍民主的发展。

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有限制的（此处原文如此，但从前后文看，似应为“无限制的”——译注）自由贸易的号召，不是破

坏就是阻碍这些国家建设本国工业的努力。让私人投资享有无限制的自由，也等于让多国公司为所欲为，因为有许多多国公司受到大工业国政府的公开支持。所有这些不仅意味着现存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化，而且还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永远处于依附地位。受主要的新老工业国统治的世界贸易、金融和货币机构，使这种依附地位固定化。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不仅导致国际体制及其机构的改革，并且应导致对于在第三世界活动的多国公司和私营机构实行监督。

民主社会主义和专权主义

专权主义的社会制度往往答应用更好的方法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他们的论点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有必要取消民主和参政权。专权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最极端的变种是法西斯主义，而比较温和的形式是民粹主义（得到群众支持的专政）和家长式统治（提出群众性福利计划的专权政治）。

论点三十四：专权政权同民主社会主义是矛盾的，尽管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或主观上想满足群众的需要。事实上它们剥夺了人民为自己说话和为自己采取行动的权利，从而剥夺了人民的尊严。它们不允许人民自己表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倾向于无视人民的真正利益，尽管

他们的意图可能不同。

享有特权的集团往往企图通过建立法西斯独裁来防止自己的特权被剥夺。为此目的，他们不惜让法西斯政权明目张胆地蹂躏一切人权，甚至有计划地消灭所有反对派和批评者。他们破坏人道社会的基础。

但是这些集团在防止民主发展的努力中，不只是求助于法西斯统治制度。家长式统治和民粹主义是他们新找到的封建主义新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看来似乎顺应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但与此同时，却不让人民参与政治，从而不让人民享有民主。其结果是，人民的利益不再能直接在政治决策的进程中起作用。人民尽管是多数，但却失去了政治影响。人民从民主的主体变成了民主的对象。

民主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

军事独裁往往自称是进步的。它们声称只有它们有力量打破现有的特权和在形势已变得无法应付的情况下打开局面。当年轻国家在政治上“出轨”的时候，军事独裁给人以唯有它们能确保真正的发展和迅速作出决定的印象。当一个国家的各种政治派系争论不休而不习惯于寻找妥协办法时，军事独裁有时看来似乎是至少取得一点发展的最终机会。但实际上它们并不能实现这些诺言。

论点三十五：成百的例子说明，军事独裁只有在必须
采取重大决定的初期才是成功的，而到

实施这些决定的时候,以及在需要解决发展问题的地方,它们就受挫。这是因为在这一活动领域内,有必要将不同的利益结合起来,并动员人民参加工作和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只能在人民对采取措施的需要已经信服和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军事独裁要靠使用武力,因此它们不能促进自愿的参政。

在从法西斯统治下得到解放或摆脱殖民地位的社会,从无到有建设民主制度面临着特殊的困难。有人因为这些困难而责备民主社会秩序本身。他们常常忘记,如果发展中国家只是采取抄袭先进工业国的民主结构和制度,那么这违反它们自己的民主传统(实际上它们确实存在民主传统的开端,但被别的发展埋没了),也违反它们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军事独裁或新形式的封建主义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不同的集团可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又在民主制度的迫使下建立利益的平衡时,经济和社会才能发展。经验表明,那些否定这一进程的人,比被阻止发展或被取消的民主制度更不能实现哪怕是中期的发展目标。主张独裁制比民主制更有效的论据,只在表面上是正确的。独裁统治也需要意见的协调,而且必须不断地保持这种协调——在多数情况下还要比在民主制下投入更多的力量。搞发展的独裁统治也需要有关的人的积极参与。用命令、收买和武力的威胁取得的合作根本比不上出于信念和为发展本

身利益而进行的合作，而后者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所设想的模式的基本信条。尤其在第三世界，发展的进程不应以集中的专政为基础，而应以民主制为基础，责任要下放，即下放到地区、社团和合作社。这一原则不只有益于直接的政治参与和发展，并且有可能比任何独裁的集中制更快、更有效和更持久地处理发展问题。公开地讨论和解决冲突从表面看来似乎效率不高，但这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宗教和种族集团取得一致意见又是建国过程的必要条件。独裁统治也许能暂时避开这些冲突，但它们从来找不到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论点三十六：第三世界在殖民化之前、之时和之后，长期存在同民主社会主义目标一致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尊重所有人保护自身尊严的平等权利和强调争取上述目标时的共同价值，因传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方式。

第三世界的基本问题

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面临的问题是工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或从来没有发展得这样严重的问题。首先是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除非南北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年代里还将恶化。第二，人口过多和缺乏医疗保健问题。第三，失业问题，更确切地说就是缺乏职业和教育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制订了战略，以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本地生产体系以及加强教育、保健和经

济部门的基础结构和公用服务事业。

但这些目标除了因为缺少资本、技术知识和专业人员而受到阻碍，还同多国公司的政策、同工业国改头换面、保住老殖民地附属国的企图，以及同第三世界国家新中间阶级上层分子的利益发生矛盾。这些上层分子把同多国公司的合作放在本国的长期发展之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坚持让自己独立发展经济，也就是坚持建立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度和对多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监督。发展、国际结构改革、建立和扩大同历史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又适合第三世界发展需要的现有民主结构——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农业改革，非集中化，更公正地分配财富，保护少数派和消除种族的、宗教的和人种的冲突，这些是第三世界民主发展的特征。在第三世界，人们愈来愈懂得，民主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而且同时包括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民主和人民更多地参与涉及自己的决策。不能把欧洲的民主和发展模式不加区别地照搬到第三世界。凡是试图这样做的地方都失败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时采用的标准，就是发展和民主的多样化，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和合作，同时注意自己的传统、经济可能性和历史经验。

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 1968 年写道：

“在传统的非洲生活中，人们都是平等的，他们互相合作，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所有决定。但这种平等是穷困的平等，合作是小事情上的合作，他们的政府只是他们自己的家庭、部落、至多是部族的政府。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使传统结构现代化，使它能满足我们提高生活标准

的新愿望。只要我们在适应二十世纪技术的同时，坚持传统生活的基本原则，上述目的是可以达到的。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在全坦桑尼亚建立人们能为了共同利益而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经济和社会集体，这些集体互相联系在一起，使所有的集体也为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一起合作。”^①

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前主席和创建人苏坦·沙里尔说：

“社会主义争取从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统治下解放群众。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应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社会主义争取建立所有人都在同等地位上合作而没有强制和压迫的社会。亚洲的社会党人，尤其是印尼的社会党人，认为自己面临的任务是通过合作劳动成倍地增加必要的产品。在亚洲，这比将所有权从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手中转到整个社会手中更为重要。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处理缺乏生产资料的问题。”^②

总结论点二十九至三十六：

在殖民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符合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运动都主张所有人有行使自由和保护自己尊严的同等权利，而且认识到没有团结、集体精神和把社会组织起来，就

① 尼雷尔著《阿鲁沙宣言以后》，载尼雷尔1965—1967年著作和言论选集《自由和社会主义》第405页，达累斯萨拉姆和伦敦1968年版。

② 苏坦·沙里尔著《印尼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原则》，载《世界社会主义之声》，汉语版1958年出版，第159页。

不能实现这些要求。这些也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实质。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是旨在为人的自决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它同所有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运动都是背道而驰的，其中包括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以及作出各种诺言的独裁或军事独裁。所有这些运动除了直接否定人权之外，从长期来说都不能满足大多数人民的切身需要，因为它们不让人民有权照顾自己的利益。社会党国际是一切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党的联盟。在这个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各党根据本民族的传统和问题决定自己的道路。

（根据托马斯·迈尔：《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十六个论点》一书，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 1981 年英文版译出）

民主社会主义

雅各·德罗兹 著

管震湖 译

民主社会主义是作为改良主义的继承者出现的。从它在西欧和中欧高度工业化的各大国迄今的发展来看，正是如此。在那些国家，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希望却都是不再同暴力革命相联系，而仅仅依赖于新的议会多数在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内部取得胜利。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实现，它从地域上说却仅仅限于这样的一些国家：它们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当中，实现了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经济，建立了得以自由发展民主制度的政治结构。而这些条件，现今无论是在苏联型或中国型的人民民主国家，还是在几乎普遍维持着一党制的第三世界，都是不具备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取得重大飞跃发展的地方是中欧和西欧各国，其表现或者是执政多年，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英国；或者是以执政作为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例如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固然，还不止中欧、西欧两地区，比方说，在前英属自治领地就有社会民主党，还有在以色列这样一个插入阿拉伯世界的欧洲藩属，工党向政府提供部长，向议会提供政治纲领；至于日本，社会主义政党在

那里曾获得百分之三十选票。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广泛解放运动的延续——这个解放运动，无疑开始于中世纪的组成村社，并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得到深化；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并且可以同早期几个世代的社会主义者，同饶勒斯和勃鲁姆，同英国的费边社社员，同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者，同拉夫罗夫和赫尔岑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它却无可争议地是欧洲的现象。我们正是要从欧洲寻找其例证。

“自由”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邱吉尔内阁中某些工党阁员倡议，1946年5月在海滨克拉克顿会议上决定：重组一个社会党国际作为抵挡共产主义及其同情者的堤防。于是，在欧洲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党人防御委员会（国际社会党人协商委员会），在英国和德国社会党人领导下进行工作，结果于1957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国际代表大会，有三十四个社会党的代表出席。除了担任书记职务的国际工人运动史学家——奥地利人尤利乌斯·勃劳恩塔尔外，枢纽人物是当时担任英国工党书记的摩根·菲利浦斯，他在以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循理宗^①的教义说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个新的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清一色都是北约组织国家的社会党，因此，它们都与美国的政策相联系。早在

^① 循理宗为新教的一个宗派在英国的称呼，传入美国后即为美以美会。

——译者

1949年，南尼就已因为拒绝放弃与意大利共产党联盟而被开除出该国际。菲利浦斯当时就说过：“我知道，还有一些社会党人对美国的民主持怀疑态度，而且认为美国人的政治经济体系可能导致战争。其实，美国现行政策主要是进步性质、利他性质的，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力如此强大的国家有这样的特点，假如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那我们不是完全发疯，就是智力上近视。”社会党国际的宪章说：“无论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上，还是建立在其他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也无论他们依据的是宗教原则，还是人道原则，他们都为同一目标奋斗，那就是，争取建立一种社会正义、较好生活、自由、全球和平的制度。”还承认：“社会主义计划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公有制究竟范围多大要看各国结构情况而定”。

虽然后来在各国社会党人之间出现分歧，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干涉事件上和殖民战争问题上，但是，社会党国际各党都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自由世界”，从而加强了相信民主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它们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慷慨援助和马歇尔计划使它们对帝国主义刮目相看；而是斯大林共产主义，因为它迫使被奴役各国人民始终处在可怕的恐怖统治之下。1948年布拉格政变后不久，一生致力于和平主义的哲学家罗素认为对苏进行预防性战争已是不可避免。敌视共产主义，这一向是、今后还会长期是团结那些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们的基本因素。在这方面很有意义的是英国人乔治·奥维尔的著作。他以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著称，同三十年代某种社会主义左派的理想也没有决裂，他在两部小说

——《动物农场》(1945)和《1984年》(1949)——中描述了苏联境内盛行压迫的阴森图景并严厉谴责一切不肯睁开眼睛正视事实的人们。若干采取新政治方向的工党党员合写的《新费边试验》中,作者之一R·H·S·克罗斯曼写道:“由于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就予以排斥,却把苏维埃帝国说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楷模,这无异于抹煞我们自己的一切理想……我们能够同作为盟友的美国人合作,虽然美国非常强盛,我们也能对它的政策施加影响;但是,要是希望同苏联也建立这种关系,那不啻痴人说梦。和平共处?行。订立互利协议?也行。然而,合作?绝对不行!”集中营、莫斯科审讯案,柏林桥事件,然后是在匈牙利的镇压,这就使社会党人更加振振有词地坚持其敏感的反苏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

因此,社会主义看来有必要重新全面考虑自己的全部社会哲学,既着眼于颠覆的危险,也着眼于相应加强社会自我保存力量而带来的危险。同时,它还不能不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角度来进行反省,因为这次产业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一般生产条件,正在用新的经理人员阶级代替旧的握有资本的资产阶级,正在产生一个比旧产业阶级同企业更为密切相关的产业阶级。社会主义的成败,看来与负责推行社会主义的人士有关,与社会主义是否善于利用“迫使人类选择普遍贫困或普遍繁荣的原子革命”(H·威尔逊)有关。

社会主义已经在哪些方面尝试赋予自己新的面貌呢?

民主社会主义关心其成员的社会阶级成分,越来越不力

求仅仅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力求使其组成人员具有较为复合的性质，尤其是力求涉及第三产业。它虽然不想背叛纯属工人阶级的要求，甚至工人成分在党内仍占重大比例，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却已认识到，无产阶级再也不可能成为“多数”，因而就不可能代表全民。由于生产力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丧失其曾导致某些人认为它是历史动力的那种主导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今后将由那些因新生产力而出现的社会阶层而不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各国社会党不得不仰仗新的“中产阶级”，依赖日益大量涌入的“白领劳动者”；它们的选民同反对它们的保守党或基督教社会党的选民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对于它们利害攸关的是，也要表现为“全民”的代表。克罗斯兰写道：“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不可避免地互相对立的单一阶级的经典观点相反，我们面临的是以各中间社群日益增殖为特征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工联主义社会主义者再也没有获得合法多数的机会；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只有超越工联主义才能获得多数”（G·勒弗朗）。

从意识形态上看，新的社会党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现实的图式化的理论，人们只是作为例行公事才引用它，但如果要多少讲求实效，最好还是摆脱它。这些党因而只能有以下的选择：要么仍然信守原来的观点，甘愿丧失对当前时代的任何影响，要么转变为新的世界观，从而能对同代人发挥作用。人们尤其坚持这样的一个事实：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分化现象并没有发生，相反，我们目睹的是各中间社群日益增殖。一般承认，财产并没有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日益成为一个“无人地带”，企业的现实控制权已经不再属于资本资产

阶级，而是属于由于学识和技术本领而掌握权力的经理人员。因此，社会党的理论中开始引入了以下一些人的著作中的结论：詹姆斯·伯恩汉关于资本主义的专家政治传统的理论，J·K·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家》中的理论，丹尼尔·贝尔的理论，他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既已满足，各社会阶级皆已有代表权，“意识形态寿终正寝”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种种学说都乐意承认，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是一个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当时描述的是真实的力量对比情况；它们只是声称，如今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阶级斗争已经停止，革命已成无益的冒险。不仅如此，人们还愿意承认，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缓和，今后已经能够减少失业、避免经济危机。

伯努瓦·马隆、伯恩施坦之类的人曾有过的种种考虑，民主社会主义也有，因而它首先自称为不仅渊源于马克思、同样也渊源于康德唯心主义的一种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是欧洲人文主义的成果。这种解释在雷翁·勃鲁姆的《人类梯级》中有一个概括介绍，而在安德烈·菲利浦的著作以及新费边主义工党人士的著作中更加以发挥。勃鲁姆一再说，人类应该自动地按自由抉择的方式达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历经的一切伟大潮流——精神的和信仰的潮流——对公正和仁爱的向往的终点”。这种倾向促使某些社会主义者同发扬基督教思想的运动如意大利的多塞运动(doss-étisme)和法国的《心灵》杂志的观点接近。早在1946年，荷兰工党(PVDA)即已将基督教义和社会主义在其党内调合确定为原则，并以联合会形式把各霸一方的国内两大宗教教派组成为若干特别小组；1953年3月，根据该党的要求，在本

维尔德举行了社会党国际成员国会议，研究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一方针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仍然得到遵从。

各国社会党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性，对急剧改造社会不抱多大的幻想，满足于注重充分就业，认为这比将自动发生的结构改革更为重要。它们放弃了大规模企业国有化的主张，转而信奉不久前由亨利·德·曼提出的计划化“混合”经济的理论。在它们的分析中，凯恩斯和熊彼特代替了马克思，例如克罗斯兰的新费边主义宣言《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中的提法。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政策的基础是与雇主妥协，所以实践上宁愿着重经验主义改良和合法途径，他们提出的政纲往往竭力及时地照应选民们眼前的打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受到那些体制上和人员上都与政党密切联系的工会和合作组织的指使。至少在以色列^①、瑞典、英国、德国和奥地利是如此，在意大利和法国则不太明显，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会组织始终是一部分受共产党控制的。这些工会和合作组织经常不断起调节作用，时刻促使政党领袖们不再迷恋心爱的意识形态，回过头来看重必须使一个越来越拥护充裕社会

^① 以色列的情况相当特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党(Mapai)，为本·古里安在三十年代所创建，它领导工会运动 Histadruth 取得了成绩，而这个工会运动又领导着大量的工商企业。该党把工人阶级的社会安全提到一个高的水平。它还对合作化运动(这个运动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发展，无论是在组织开垦集体农场方面，还是在按照全面计划开垦个体农地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这两种组织成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突出范例：这种社会主义是自愿接受，而且自由经营的，其基础，至少从起源上说，是人们刻苦努力地生活。

的种种长处的集体得到满足。“对于人,什么更重要,是生活得好一些,幸福稍稍容易得到呢,还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只是在最近,鉴于野蛮罢工的日趋增长,在工会内部才有一种置疑、反抗的思想日渐抬头。政党和工会大体上一致认为,对于国家,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它们看来,国家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度认为的那样,仅仅为统治阶级服务;如果掌握在手腕高明、毅力坚强的人手中,国家可以成为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总是一种支配民族经济生活的独立的调解力量。

民主社会主义最新特征之一,在于它重视欧洲共同体组织。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有必要置身于资本主义内部,信奉市场经济,因而承认,要在从政治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欧洲范围内,它所企求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有几位经济学家以克洛德·勃吕克兰为笔名,在题为《社会主义与欧洲》的著作中力图证明,由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而重振旗鼓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从瑞典范例中增强了说服力,摆脱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的神话,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是组成一个政治上的欧洲的条件。如果说一体化事实上是各基督教社会党努力的结果,如果说因而某些专家对所谓的“黑色国际”^①表示了保留态度,如果说还有一些专家指出了托拉斯力量有所增强,那么,欧洲左派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超国家的共同体是介乎“由于世界分裂而已经没有希望实现的成立国际的空想和民族旧窠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法国的比诺和摩勒就是共同体的辩护

^①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国际,因其僧侣黑袍而被称为“黑色国际”。——译者

士；在这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推比利时社会党人斯巴克；他从1945年至1965年多次担任比利时外交大臣，曾任联大主席，是欧洲经合组织的倡导人，罗马条约的签字者、共同市场的组织者，欧洲防御体的鼓吹者，北约秘书长，欧洲运动的推动者，他曾被称作“欧洲先生”，毕生顽强努力来证明：苏联“今日比沙皇更为狂妄，更为野心勃勃”，在它的可怕威力威胁之下，各国别无办法，只有放弃主权，以求共同支配欧洲的资源。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对于戴高乐拒绝建立超国家的欧洲，一贯甚为猜疑，认为这是旧民族主义死灰复燃。许多社会党，尤其是比荷卢的社会党，对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表示了非常欢迎的态度。

民主社会主义内部的分歧

然而，很快就为社会党内部产生了分歧，可能不划分为左右两派；右派始终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左派虽然居于少数地位，却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努力在刻板的眼前改良之外谋求其他途径对社会结构发挥作用。在这些左派看来，一般对于资本主义前途的结论是过于乐观了：很大一部分居民实际上丧失了经济独立，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少数特权者手中，这样的一种制度事实上是不可能走向政治民主的。有这种看法的，政界人士不多，大量的基层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愿意看见理论传统被牺牲掉。这样，这些人就逐渐转向革命方案，他们竭力把自己的方案确定为既反对斯大林共产主义，又反对“改良主义”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前者产生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后者致力于迫使工人阶级屈从于它只能分享残

羹剩饭的那种消费社会的需要。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尤其是与欧洲社会主义的和平主义倾向相违背的原子军备问题，更加深了左右两派的对立。又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的态度，两派的分歧愈形恶化^①。

在这种情况下，有无可能把民主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五年中的经历大体上作出一个时间划分呢？看来，早期，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整个欧洲社会党内都盛行着根本性质的反共主义，而以冷战为其导火线，因而它们必须把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反对苏联以保卫西方世界作为首要义务。当时的社会党人丝毫不考虑，美国从1947年以来推行的政策不仅是要遏制共产主义，而且是要击退全世界的任何社会主

^① 外交政策问题不仅促使欧洲社会主义者分裂，特别在日本社会党内部也有影响。更甚于关于改良主义、关于使用暴力问题的争论，支配该党的是：承认美日条约问题、对两大强权集团保持中立问题、在日本土地上设立美国基地问题、日本重新武装问题。日本社会党于1945年以片山哲为核心，在艰难情况下建立，1951年重新分裂，1955年重建，1960年从党内分裂出西尾末太的社会民主党。这个社会民主党奉行右的纲领，主张日本军队参加联合国部队，主张日本重新武装、实行美日安全条约。该党依靠劳动总同盟工会运动，这个工会运动同社会党所领导的“总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日本社会党内部，左倾势力受到团聚在江田三郎和成田知巳周围的主张经由议会道路“改革结构”的人们的反对。由于内部四分五裂，日本社会主义党威望急剧低落，被指责为脱离现实，固守过时的不着边际夸夸其谈。日本社会党1960年前后获得30%以上选票，到了1969年就只得到18.6%了，社会民主党仅仅得到6.4%。大量党员脱党，去参加佛教运动创价学会的政治形式公明党，这个运动以类似法国的布热德派精神，激烈谴责现代生活抹煞个性。

类似的考虑在五十年代促使艾瓦特博士的澳大利亚工党内部产生分裂。包勃·圣他玛利亚的有基督教倾向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工业集团”采取反对这个工党的立场。1957年还成立了一个民主工党，它支持自由派，反对社会主义者。

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而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援助是以宣布放弃计划化社会主义经济为条件的。由于采取这种立场，若干党弃绝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有的党例如奥地利和德国的党拟定了维也纳纲领和哥德斯堡纲领，有的党例如英国工党的领袖盖茨克尔，从党章中删去了关于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的词句（1959）。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意图是：确认个人主动性和竞争对于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声称它们从否定派地位转变为负责任的地位，从而自命为多党制下的“阶级间人民”党。然而，自从苏联施行非斯大林化措施，和平共处确立以来，在第二阶段，导致系统反共的原因日渐削弱，因为现在的这种共产主义好像是较少威胁性了，而它的某些因素正日趋开明。但是，尤其是在六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上一个十年期间促使它们拥护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形式的种种因素，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怀疑了：物价上涨和物价稳定，支付增长和支付平衡，这些之间似乎越来越难协调了。竭力计划化也好，推行反现实的收入政策也好，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随着六十年代末经济危机的出现和爆炸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些同 1968 年的骚乱不是没有关系的——对五十年代那种过于乐观的方针开始置疑，而某些经济学家例如基德伦和马提克提供的论证，更加深了这种疑问。因此，尤其从六十年代后半叶开始，社会党内出现了革新趋势，其表现或者是否定某些纯粹改良主义方针，或者是组成新党，这些新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力言反对既定秩序。不过，上述时期划分随国别而异：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已经掌握政权，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英国；有些国家不存在必

须重视的强大共产党,例如德国、奥地利、瑞士;有些国家相反,共产主义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各国的经验,才能够对民主社会主义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作出结论。

一、没有共产党竞争的社会党

公众舆论中瑞典的形象具有二十世纪形成的以下一系列特征: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特别高,工资居全欧之冠,社会平等而没有贫困、甚至没有任何明显的阶级分化,国内政局稳定,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和平主义。

确实,观察家们不会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奇特情况: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以来历经两届首相,始终是执政党。P·A·汉森担任首相直至1951年,T·埃尔兰德(Erlander)直至1969年,前者与农民党结盟,后者单独握有绝对多数。而至少在原则上,瑞典社会民主党是自称反君主制度、反资本主义的。其实,它从来不想动摇国家的体制;它也非常顺应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型的社会是应该在和平讨论和协调一致的气氛中,不经混乱、毫无强制地建立的。来自工会的广大党员也使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乐意优先考虑实际问题并同经济上的掌权者谈判妥协。三十年来的社会安宁的基础是雇主联合会(SIA)和工会联合会(LO)以同等数目代表合组劳动市场理事会于1936年协商缔结的萨茨约巴登公约,以及随后签订的若干协议和建立若干常设合作机构,不受政府约束,自由协商工资问题和劳工问题,而排除罢工和闭厂。就

这样,得以建立这个“混合社会”,其中,私人企业将始终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国家权力却由社会民主党掌握,致力于顺利进行经济活动,努力谋求社会地位一律平等。

繁荣与平等,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战斗目标。政府从来不想动摇市场经济机制和由某几个特别强大的家族集团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对计划经济——即使只是指导性的——也持保留态度。相反,在它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充分就业,因此它全力以赴,而且向来自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就是设立国家工场,而今天则日益重要的是靠职业培训和转业训练。因此,政府的方针是:持久努力,使劳力供应适应需求。照以往的情况看,这种就业政策迅即成为争取平等的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一斗争预计可以纠正出身和财产上的偶然谬误,纠正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正。这一斗争从两方面而进行:一是在各行各业优待某些社会类型的人,例如老年人、病人、残疾人,二是在再分配方面,即,把一切公民,从生到死,纳入一个复杂的保险网,而其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占国家开支的三分之一),从而来自税收。国家对涉及家庭的一切方面负全部责任,对老年人和失业者开支非常慷慨,并同地方自治单位分担医疗和生育费用。根据同样的考虑,政府还进行教育民主化,措施有:各级学校教育一律免费,大学生预领工资,在同一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开展永久性职业培训。政府参与广泛的住房政策,虽然不能满足一切要求,但在原则上,政府应竭尽全力向每一家庭提供一套廉价而舒适的住宅。支付这些社会福利费用的主要手段——税收,被认为是获致必要的收入和生活条件平等的首要手段,因而采取了征收大幅度

累进的直接税(占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的办法,并且予以系统公布,使得偷税漏税非常困难,也有助于破除金钱万能的神话。

政绩似乎颇为卓著。奥洛夫·帕尔梅于1969年继埃兰德为党魁、首相,无论在国有化方面,还是在对美政策方面,都更为左倾。他因而能够在著作中自称,瑞典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象人们经常反复说的那样,仅仅以满足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是导向真正改造社会,自然而然可收加强民族团结的成效。瑞典社会党人尽管不愿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听任私人集团的经济大权保持完整,其实丝毫也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理想,相反,正是因为唾弃脱离实际的革命空谈,而且对一向拒绝接受任何条件束缚、积极掌握自身命运的瑞典人民满怀信心,才得更加提高了全民的富裕生活。固然,谁也不能说瑞典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早在1955年,该党就说过:“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既定地位特权所造成的收入悬殊,但是,如果这种悬殊反映的是努力程度、才能大小、负责与否、首创精神如何的差异,我们还是接受的”;然而,依据“功能社会主义”学说,确定了一种“瑞典社会主义道路”,其基础在于“公民之间随机遇而异的平等”,因为一切公民,不问出身、财产情况如何,都能够发展自然赋予的一切可能性(参照G·阿德勒—卡尔里森的意见)。

工会保证走向经济民主,另一方面无数合作组织竭力保卫消费者反对随意抬高物价,保卫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即“瑞典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两方面支持之下,是否就足以解决那个“福利国家”的一切问题呢?有些悲观的人已经表示疑虑,

担心贫困所产生的弊病一旦消除之后，过度“享福”所造成的弊病甚至更为可怕，例如，会使人感到空虚烦闷，使社会祸患加深，导致自杀、服用麻醉剂、少年犯罪，等等。还有人认为，瑞典人已经为了生活无虞而牺牲自由。也有人根本怀疑这种经济制度，着重指出，税务负担沉重，已经难以忍受——尤其是“超额”税打击了正薪之外的收入来源，——日渐摧毁努力进取并求发展的精神。人们提出警告：须提防悄悄发展的通货膨胀，而政权对此似乎不太警惕，反而更为关心保住充分就业，他们所拥有的预算和税收手段用来对付这种通货膨胀却简直无能为力。不过，社会民主党尤其必须考虑某些前此一直受到特别关怀的行业中对于该党坚持推行的平等工资政策的不满，拉波尼亚的基律纳矿工，由于劳动条件艰苦，也由于对前途有些担心，举行罢工（1970），触发了一系列“野蛮罢工”，动摇了以国家与资本家合作为基础的体系。现在的问题在于：长期保持的社会安定局面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方和工会协议的结果，而不是来自长期有利、然而最近维持不住的环境。不容置疑，早在七十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即已发生老化危机，得利的是左翼的更为革命的分子和右翼的属于“布热德主义”性质的运动。1970年9月大选时选民中出现不安，社会党人为组成政府，不得不依靠共产党，共产党领袖C·H·赫尔曼森则竭力使这个政府表现出较为“令人放心”的形象。1973年9月大选时又出现不安，结果选票略略转向资产阶级政党，不过没有迫使奥洛夫·帕尔梅引退。而对这种社会紧张形势，社会党内有些人士提出疑问：国家是不是将有必要接收生产机构，至少试行监督。因此，他们希望加强国家对生

产、工人对企业的干预,总之,应该确定一种“产业民主”,1971年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愿望。这就提出了“经济大权”的问题。

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几国社会民主党也完成了类似的事业。不过,挪威的社会党人单独执掌政权是到1961年为止;这一年,其左翼组成了一个人民社会党(机关报是《方针报》),这个左翼党反对北约政策。由于这一分裂,挪威党在立法选举中票数顿减,到了1965年又进一步减少。由H·C·汉森领导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于1955年大选中取得政权,1966年选举丧失了一些议席,让该党开除的前共产党员阿克森·拉尔森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人民党获利;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于1968年退居在野地位。此后,丹麦的和挪威的社会民主党都重掌政权,但只拥有微弱多数;这两个党内部在国有化问题和共同市场问题上仍然是分裂的。1973年选举中,它们都遭到失败,“反税收”的党(在挪威是Lange党,在丹麦是Glistrup党)获胜。因此,人们在七十年代初可能问: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整个在遭遇着信任危机。社会民主主义在长期执政以后,已经不是执政党了。滥用权力,横行霸道,为了繁荣而牺牲个人自由,还被指责为“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甚至“精神恐怖主义”,这些都对社会民主党起了不利的作用。在“福利国家”的那种无孔不入的机构之下,国家掌握着居民的福利和安全保障,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退缩现象,“沉默的多数”聚集起来,诉诸利己主义、传统、仇税心理以及一切足以煽动怀旧情绪的倒退否定的思想(参照R·-G·施瓦岑贝格的叙述)。

英国工党的成绩

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外，民主社会主义主要在英国获得了成就。英国工党从 1945 到 1950 年，从 1964 到 1970 年，两次在下院拥有多数，从而得以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重大成绩。而 1951 到 1964 年执政的保守党也认为最好是不要缩回去。从尊重根本自由权利出发，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动摇了某些社会不平等，为一个充裕、宽容社会打下了基础，而这个社会的模式，不容置疑，与其说是苏联，不如说是瑞典。

工党政府 1945 到 1950 年实现的社会变革，原是邱吉尔为了团结工人阶级，共同作出必须进行的工业上的努力而吸收参加民族团结政府的工党大臣们筹划的。但是，工党一方面同意自由党人贝弗里吉制定的战后计划，另一方面在 1944 年提出了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面对未来”方案；除了建立广泛的社会服务机构，工党还要求一系列的国有化，其中包括把英格兰银行、煤业、煤气和电业、铁路公路运输、钢铁工业收归国有。他们主张与经济自由主义彻底决裂，肯定必须由国家经常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

邱吉尔本想利用胜利后群众的喜悦，于是提前于 1945 年 7 月举行选举。不料却是工党获得胜利，取得了三百九十三席，保守党只得到一百六十三席。工党自己也深感意外。他们认为，获胜的原因在于，宣传的成功，尤其是戈兰兹主持的“左派书籍俱乐部”支持这种宣传；也在于，工党领袖战时的表现无人可以指责有国际主义或失败主义之嫌，因而国民寄予同情；而保守党在 1939 年以前所犯错误，人们记忆犹新，工

党则代表着与三十年代思想方法决裂，这是他们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享有盛誉的政治家邱吉尔要求维持信任，工党拟定了一个大胆进取、然而讲求实际的纲领，这二者之间，英国人选择了后者。

内阁的基础在于党的领袖艾德礼和外交大臣贝文之间的密切合作。议会党团由摩里逊领导，社会管理主要领导人则是财政大臣道尔顿（以后由克里浦斯继任）和卫生大臣比万。他们都深信，如果不先把过于陈旧的英国经济结构加以革新，任何社会措施都不可能具有持久的效力。他们也得到工会谅解态度强有力的支持，工会秘书瓦尔特·西特林反对一切垄断机构可以彻底收归国有的幻想；工会在权利要求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这就使得下院可以废除1926年总罢工之后不久通过的“劳资纠纷法案”。至于国有化，预定纲领中的主要困难在公路运输和钢铁业，由于上院的反对，这两个行业转为公有被推迟到下次大选以后进行。事实上，英国始终保持混合经济制度，私营和国营和平共存。至于1946年通过的“全国保险法案”，它的预防项目包罗了最普遍出现的各种风险；保险收入的红利，任何年龄以上的人提出申请，均可获得。同时还有一个“全国救济法案”，组织劳动事故保险。争议较大的是“全国卫生保健法案”，其基础是医疗免费，将医生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因为很大一部分私营企业已转为公有；但是，保守党想保留一部分私营企业不受这种控制，由于他们的反对，比万只好同意设立“教学示范医院”，这种医院是不受“委员会”的监督的，也只好宣布放弃全盘免费医疗。除了这些措施以外，工党政府还制定了广泛的建筑计划（“住房建筑法案”），改造破旧

或不卫生地区计划(“城乡计划法案”),建设新城区计划。在这些措施之外,还实行了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四千英镑以上的巨额收入征收累进税,对遗产继承征收高额税款。1950年,社会服务各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四。

这种政策是在战争考验之后,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之所以可能实现,是由于美国对战争债务问题的态度,由于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实行,由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创建。贝文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首先重视在世界各地保卫民主自由,反对共产主义扩张,这就决定了英国站在美国的旗帜下,如果不说是接受美国的霸权的话。在工党而言,这一政策方针还伴随着对于任何军事组织或欧洲经济合作具体方案不予信任,正因为如此,英国置身于煤钢联营之外。工党不无遗憾,只是作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才承认了大英帝国的解体,1947年又同意了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独立,在他们看来,民族的命运仍然与建立一个新型的英联邦相联系,对于组成这样一个英联邦,较之密切与西欧各民主国家的联系,他们更加寄予希望。

然而,由于财政困难,工党政府不得不于1947年宣布放弃英镑自由兑换,而克里浦斯只好实行厉行节约政策,以求减少贸易逆差和限制多种产品进口。于是,党内左派力量加强,他们批评英国政策的亲美方向,聚集了秘密共产党员,E·休斯之类和平主义者,以及伊恩·米卡尔多、理查德·克罗斯曼、迈克尔·富特等人组成的“靠左边走”运动,这个运动主张由英国领导组织“第三种力量”。在工会内部,共产党支部有了发展,使得继贝文之后领导运输工人联合会的A·狄金惶恐

不安。左派力量在政府内部依靠的是比万，他在苏联和西方国家潜在的冲突中，主张宁可削减军费，加速社会进步，这才是有效地抵御布尔什维主义侵入西方的唯一手段。比万关于对美国必须保持独立、关于奉行扩军政策、关于对资本征税来“巩固”工党内阁已获得的全部成就的种种论点，在《论坛》周刊和《新政治家》周刊上得到了广泛响应。工党虽然经历着困难，摩里逊还是以“现在将胜利坚持到底吧！”为题，为1950年2月大选制定了一个非常明显进攻性的政纲，其中规定发展某些社会服务和教育机构以及进一步实行国有化——虽然数目有限。结果令人失望，虽然选票增加了，工党却只得到三百一十五席，保守党议席则获得二百九十八席。

虽然艾德礼实行了钢铁业国有化，第二届工党政府却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困难之大是比万和克里浦斯的离去（由摩里逊和盖茨克尔继任）所不能解释的。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盖茨克尔不得不同意卫生费用紧缩，致使比万和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辞职，削弱了内阁。艾德礼认为有必要提交全民表决，然而，1951年10月保守党以三百二十一席对二百八十五席赢得了微弱多数。

1955年和1959年两次选举，工党又遭失败，议席降至二百七十七席，再降而至二百五十八，因而人们对今后它还能不能重掌政权表示疑问。对受挫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选举机器运转不如保守党灵；舆论工具不足，除《每日先驱报》外，没有销路大的报纸；保守党手腕高明，除了对于公路运输和钢铁业收归国有，1945—1951年的主要成就一概维持原状，而公路运输和钢铁业的收归国有原本不得人心，同时利用

了普遍繁荣，群众的非政治倾向；不管怎么说，美国的一个记者在1959年指出：“英国选民们怀念工党给予他们的福利国家，但是他们宁愿受保守党的治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选失败加深了党内的不团结，这表现为越来越注重企业效率和企业现代化的“修正主义者”同以比万集团和某些强大工会（铁路工会和机械师工会）为中心、主张尽快消灭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私人占有的“正统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五十年代的对立主要涉及外交政策：朝鲜战争期间，工党领导于1952年原则上同意裁军时，五十七名工党议员拒绝追随，这次票决之后，比万分子夺取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若干委员名额，并从中排斥了摩里逊和道尔顿。1954年，比万由于反对德国重新武装，退出了影子内阁。1955年，六十二名工党议员拒绝同意生产“H₃氢弹”，这场冲突引起了比万是否留在党内的问題，以致他几乎被开除出党。固然，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失败使工党燃起近期内重新执政的希望，阻止了工党内部危机扩大，比万也重返影子内阁，然而左翼反对派并没有因而却步。反对核军备竞赛的斗争，在1958—1962年有了一种近乎神秘教的性质并以某种“宗教信仰复兴”的形式出现，很象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激进派大抗议运动。围绕着“争取社会主义胜利”集团，这一斗争在1959年选举时最为激烈。那次选举使工党左派大失所望，不过，1955年继艾德礼为工党领袖、依靠右派的盖茨克尔，也未能使其取消党章中“关于生产资料、分配资料和交换集体化”的规定的图谋得逞，1960年斯卡博罗代表大会上也未能强行通过他自己关于核裁军的主张，左派希望这种裁军是单方面的，为此知识分子和

工会会员多次举行了示威。党的领袖自从1931年以来第一次遭到失败。工会原本已经支持温和政策，这时转为激进，领导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换成了左派积极分子F·卡岑斯，他反对任何依靠核武器的防御政策，强调有必要“突出社会主义性质”。

于是，几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全国执行委员时，有时甚至在议会党团内，出现了紧张形势。尽管如此，工党领导机构中占上风的经验主义的灵活而讲求实际的路线，并没有因为左倾力量的增长而改变。党仍然为“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管理经济”（managed economy）的理论，而不是国有化的好处；认为更有益于全体人利益的是明智地指导货币机制，而不是有步骤地改造生产条件。在“费边主义新书刊”中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从盖茨克尔的亲信们，从《社会主义评论》派，从“社会主义联盟”的出版物，尤其从克罗斯兰和斯特拉契的表现来看，要求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决裂，同时愈来愈倾向于根据专家治国论所作分析的结论。1960年，在斯卡博罗代表大会上，盖茨克尔在答复一位迫不及待地要求实行国有化政策的代表时说：“我们必须慢慢来。我们扩大公有权的纲领，必须依据选民乐意接受的程度来权衡，简单的道理就是：假如我们换个做法，选民就不会把我们送上执政地位。”执行委员会1960年3月通过的声明从理论上提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民主主义，但承认“公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经济中都有其地位”，“进一步扩大公有权，必须依据环境，考虑劳动者和有关消费者的意见，分阶段来决定”；这种提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前此不久在哥德斯堡提出的非常近似。工党代表会议在1963年和1964年制定了两个宣言，前

者着重技术进步所提出的要求，所用词句使人联想到肯尼迪所说的“智囊团”，而不是阶级斗争学说，后者强调结构的现代化和生产增长。这是因为工党与其说是企图争取其左翼的赞成，不如说是企图就在对方保守党自己的地盘上向对方挑战，企图把对国有化持保留态度的中层阶级争取过来。

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假如我们考虑到，由于一部分工党党员变节，继续去投保守党或自由党的票，也由于工党得到一部分中层阶级的支持，因而工党已经不是站在与“托利党”相反的立场上，而是与它并行竞争。两党在根本原则上实际上是一致的，两党之间的分界线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敌对或社会学意义的对立，不如说是政治心理的差异。起码这既意味着保守党向左靠拢，也意味着工党向资产阶级靠拢，假如这一点是事实，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工党日益修正，保守党日趋进步，二者殊途同归是越来越无可置疑了，尤其是在接受有限的社会化和国家灵活干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争议的不是涉及这个或那个党，而是涉及整个政治制度（参照J·布隆代尔的著作）。

然而，根据永不改变的要求轮流坐庄的两党制，1964年大选又让工党重新执政了。

哈罗德·威尔逊，虽然由于政权个人化而拥有极大的权威，作为首相，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困难不仅在于他只拥有微弱多数（虽然在1966年有所改善），而且在于他继承的是一个灾难性经济局面，而他自己又要求首先充当国民财富的果敢刚毅的管理人。威尔逊原是比较的副手，是一个已经悔改的左派，他所领导的政府中除了乔治·布朗和詹姆斯·卡拉

汉几个工会领袖外，占绝对多数的是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代主张专家治国论的知识分子。因此，威尔逊表现出最为关心的是实现英国经济的现代化，使之更具活力，而不是实行传统的社会主义纲领。他继盖茨克尔为党魁之后，象盖茨克尔一样，坚决摆脱马克思主义，甚至在一次公众大会上声称：“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在处理六十年代的问题的时候徒劳无益地从海格特公墓^①寻求答案”。况且，这个内阁里工人出身的阁员的数目越来越只够敷衍门面，以后干脆一个也没有了，这样的内阁内部根本没有什么人爱听工党固有的抱负，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方面的、实用主义的考虑。威尔逊在小册子《工党要求什么？》中写道：“现时的政治冲突，与其说是涉及两种对立的纲领，不如说是关乎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生产增长，而只有这样，社会开支计划才得以维持下去，而不至于陷入通货膨胀。”因此，威尔逊政策的中心环节是：由国家、雇主和工会商定“收入政策”，预期可以用来协调经济扩展、现代化、充分就业和维持英镑四个方面。于是，威尔逊急于承认英国经济的混合性质；绝口不提国有化的好处，相反，着手改组国营企业，以提高其效益、消灭浪费；谈到经济计划化时，他只是考虑企业中合伙双方之间制定一个“法国式”合作计划。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决定将钢铁业重新收归国有之举，在群众中并没有激起什么热情。从1967年开始，再次出现困难局面；威尔逊被迫再次将英镑贬值，然而这个措施已经太晚了。他担心工资增加会带来物价上涨，从而破坏这一措

^① 卡尔·马克思墓所在地。——译者

施的效果，便推行厉行节约政策，于是许多人认为工党这次新试验失败了，反对的矛头都集中于他本人，不仅银行界反对控制信贷政策，还有工会也不能同意政府有权在集体合同范围内自由谈判决定工资。在1968年斯卡巴勒代表大会和1969年朴次茅斯代表大会上，虽然工会联合会总书记乔治·伍德科克竭力调停，各个工会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对政府的工资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政府约制罢工权的努力命运也不见佳：这样做原本是希望制止日益频繁的、动摇了英国出口贸易——尤其是汽车工业出口——的野蛮罢工，不料，运输大臣巴巴拉·卡索1969年1月提出这项计划，要求有二十八小时考虑时间才举行罢工，举行秘密投票，并决定对违犯者实行制裁的时候，却在内阁内部碰到强烈反对，最后只好在工会联合会保证运用全部权威阻止此类罢工的条件下撤消了这一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可能把财政负担沉重、政府却自称要全力以赴的社会政策维持在高水平呢？阁员罗斯曼认为，如果硬要坚持下去，就必定要进一步加重税务负担。然而，威尔逊自命“讲求实际”，优先看待生产机构的现代化、发展先进科技高等教育、积极干预以促进困难地区的发展。但党内以伊恩·米卡尔多和迈克尔·富特为首，再次组成比万式左翼反对派，而且拥有《新左派评论》刊物。由于威尔逊自食其言，反转来主张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不过，并未能克服法国的反对），党内大批积极分子深感意外，舆论也极为骇异，深恐生活费用进一步高昂，因而左翼反对派的抨击更加激烈。在左派看来，威尔逊的受挫，正如他的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失败一样，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主义理论，只受过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的教育熏陶，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英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所谓“计划化扩大”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为大公司效劳。

工党的第二次经验获得最显著成绩，无疑是在争取实现一般称为“宽容社会”的社会立法方面。工党活动在这条道路上有所进展，是由于受到了群众骚动的压力；六十年代，不仅在知识分子、大学界中间，而且在青年工人中间，这种骚动有了发展。这些青年工人把社会主义当作人生之乐，比作耶稣再度降世般的仙境，那时的世界将没有任何宗教道德禁令，人们的行为举止将得到深刻改造；认为传统价值观念将因而混灭是错误的，它只是表明不承认专家治国主义文明万能。当时便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废除了原有的许多立法，代之以以往异常大胆的法律。例如，1967年关于堕胎的法律准许妇女经两位医生的同意，可以进行必要的手术；再如，从1968年起，夫妇如果肉体分离^①，即使配偶之一不同意，也可以变为离婚。1965年宣布死刑暂停五年，1969年予以最终废除，因为已经证明废除并没有引起犯罪率增加。1966年，禁止吉卜赛人安营住宿的措施予以放宽；1967年，同性恋爱不再干犯刑律。所有这些措施致使工党被指责为驱使全民族走向“不道德”；1970年大选时，保守党就在这个问题于竞选中大做文章。

威尔逊认为厉行节约政策已经终见成效，便认为可以在1970年6月诉诸选民了。也许他没有充分考虑许多党员的

^① 有两种或三种分居：财产分离、肉体分离；以及两种都分离。——译者

思想状况，他们对于政府缺乏社会主义活力感到失望，对于试图靠拒绝承认世袭标准去改造上院而招致失败表示不满。政府关于这一改革提出过一项法律草案，招致左右两方面的反对，只好灰溜溜地撤消了（1969）。妇女选民，由于最受物价上涨的打击，似乎大多数都投了保守党的票。无论如何，选举的结果，以四十多票之差，工党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从嗣后于1970年9月在布莱克普尔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情况来看，威尔逊个人的地位在党内并未动摇。

英国工党在即将再次居于反对党地位之际，内部仍然分裂，对前途还是举棋不定。当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一案提付表决时（1971年6月），有六十九名工党议员毫不犹豫干犯领导层下达的禁令，投了赞成票。工党领导认为，英国得到的保证是不够的。更广泛而言，冲突日益深刻加剧：一方面是整个党越来越陷于彰明昭著的机会主义，思想上墨守成规愈益严重，另一方面少数派党员活跃进取，转向未来，不愿意俯首听命于这个专家治国主义国家的号令，指责其机会主义性质，其号令只能瓦解士气。工党也象其竞争对手保守党一样，表现为一个正在退缩的党，没有能力发挥影响，吸引新的选民。因而开始了向左转，施加此种影响的是安东尼·维吉伍德一本和迈克尔·富特，给予支持的是若干大工会中央。这一趋势使党的政策激进化，导致1973年10月布莱克普尔代表大会通过规模空前的国有化纲领。

工党两次执政所完成的改革，是否促使社会分裂消灭了呢？福利国家的所作所为和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情况，是否已经使全体英国人在起点上有了平等机会呢？应该看到，

福利国家是英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正如1846年在罗伯特·皮尔的推动下，表决通过的自由汇兑法协调了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同样，工党迫使议会通过的立法确定了仍然掌握着私营工商业和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领导权的当今领导阶级同获得充分就业、普遍安全、与国营企业相联系的劳动者之间的临时协议。这座大厦的基础是某种程度的全体一致，是某种“历史性妥协”，而保守党也不想推翻这些；这也是一个平衡社会的样板，它足以协调劳动与资本、公正与民主，它认为任何极端主义，无论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都不符合英国国情而予以排斥（参照F·贝达里达的著作）。然而也应该承认，虽然富裕阶级的生活受到限制，公民参与享受消费资料者越来越多，从而贫富之间有某种程度的拉平，但贫困现象仍然远远没有消除：英国有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工人进大学的还是非常个别的，而原来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聚会于同一俱乐部里和同一董事会中，继续利用他们之间的家族关系和大学同学关系，来瓜分领导岗位，并充斥在中产阶级尽管尊重既定秩序、但也千方百计要挤进去的那种社会机构里。至于公学，工党不去触动其势力，听其原封不动。总之，英国社会的不公平性质并没有因为工党施政十年而得以消除。这种情况，在五十年代末期，受到“愤怒的一代”的强烈谴责，他们以约翰·奥斯本为首，认为福利国家只是把现存不平等予以固定化，而处境最为不利的社会阶层，即使感觉到剥削和不平等，却由于某些宗教传统，或者由于自感无能为力，或者由于接受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渗透，似乎好歹还是逆来顺受的。野蛮罢工只在青年一代工人中间断断续续发生，并没有表现出有心打乱既定秩

序的意愿。虽然工党的主要考虑之一是以“唯才是用”代替“门阀”统治，虽然工党一直把“机会均等”口号挂在嘴上，但是它并没有能力深刻影响他们自己也隶属的社会结构，反而竭力维持其威信，要求广大党员尊重既定秩序。必须承认，工党选民们对掌握这个结构的统治权的看法，并不是“要就是全部，否则宁肯什么都不要”，他们一贯认为，左派政府进行的“小修小补”是社会结构中的重大变化(参照J·布隆代尔)。

德国社会党和哥德斯堡纲领

德国社会党在战后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迟迟才得参加政权，尽管它在1966年只有一名党员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控制的联合政府，1969年只能依靠自由党的支持。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程度都不及德国党，但在一个深受苏联威胁的国家，在德国社会党看来，这是重新取得政权的必要条件。

虽然抵抗运动左翼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虽然有许多人愿意从1933年事件中汲取教训(他们认为那种不幸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两大工人党自相残杀)，如1945年4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成立人民阵线委员会时的宣言所说的那样；然而，这种观点立即遭到占领军的反对，也遭到许多从流亡中回国的、对苏联的一切持厌弃态度的人的反对。库尔特·舒马赫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崇高威望是由于他早在1931年就坚定不移地抗击希特勒，从1945年起就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脑人物，由英国占领区起家重建了这个党。他毫不怀疑，共产党迟早要投入莫斯科的怀抱。

1945年5月他在汉诺威声称：“我们不能，也不愿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专横操纵的工具”。1945年10月，德国党的领导人在汉诺威附近的魏林根会晤时，舒马赫和流亡时期领导委员会委员恩里希·奥伦豪尔一致反对在苏占区领导党的奥托·格罗提渥，决定推迟考虑组成一个统一的指导委员会并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当一个统一社会党在东柏林成立的时候，1946年5月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舒马赫为主席，奥伦豪尔为副主席，同时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将党活动的范围确定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内。对于该党，国土分裂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前此它根深蒂固的地盘是在东部新教各省、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优秀的党员也是来自那些地方；因此，两党制对它是致命的打击（参照A·格罗塞尔）。它拒绝同共产党合并，甚至合作也不肯，从它那方面说，这是在两个世界中有意加以选择的结果，它认为，一方是“极权独裁”，另一方代表民主和自由。不过，它倒不必害怕共产党的竞争，对于共产党，德国工人居民是有免疫力的，共产党也未能把积极党员的日常活动化为政治资本，而且不久以后在1956年就被取缔了。

尽管仇视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党迅即表明愿意朝某种社会主义方向改造德国社会结构。这一立场并不能把该党与其竞争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既然后者也曾于1947年2月，在某些天主教工会积极分子（卡尔·阿诺尔德和雅各布·凯泽）的影响下，在阿伦确定纲领，断言资本主义破产，规定将实行计划化和国有化。舒马赫旋即要求将矿业、能源、交通工具、保险业和银行收归社会所有，并主张在私营

企业和国营企业中实行企业民主。汉诺威代表大会曾着重追述：将希特勒送上台去并从杀戮中获利的是资本势力。于是，舒马赫承认，马克思主义虽非“教理问答”，但对于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为思想基础的党来说，仍然是一种工作方法。不过，他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象民主与集权的对立那样具有根本性质；他不愿设想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争取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此，他势所必然对阶级斗争予以新的解释：认为阶级斗争就是依赖劳动产品为生的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对剥削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主的政治斗争。还有，他一方面愿意在内政方面保持社会主义战斗姿态，另一方面作为拉萨尔的信徒，他强烈表示坚持民族价值观念，而这是为了使社会民主党不致再遭到1919年所遭到的那种抨击；认为在希特勒主义的兴起这件事上德国人民犯了集体错误；他强烈谴责德国工厂被撤走，不断重申必须尽速统一祖国。他在1950年声明反对重整军备，但那根本不是出自什么和平主义。当阿登纳总理优先考虑逐步恢复自由和主权的时候，舒马赫始终认为任何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在1937年的国界内重新统一。他既不愿让德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但也不愿让它与西方结成片面联盟。因此，他同其他西方国家的那些“欧洲派”社会党领袖总是关系不好，而在这一点上他与阿登纳是一致的，尽管无论从体制方面，还是从个人方面，他都拼命反对阿登纳。

舒马赫由于作为抵抗运动战士的历史，由于精力充沛和有演说家的才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主张直到他去世（1952）都没有遭到动摇。尽管如此，党的领导权始终为老朽

的党官僚所把持,从1933年灾难以来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总是承受着魏玛传统的沉重负担。假如组成一个统一党,无疑是可以使社会民主党恢复青春的。这个统一党可以排除共产党,而包罗魏玛革命时期及以后组织的各个反对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革命社会主义战斗同盟(ISK)(它始终信守哲学家雷昂纳德·纳尔逊的思想),“新起点运动”(Neu Beginnen)(它在抵抗运动中与共产党并肩战斗,斗争相当深入)。事实上,这些党派只是被社会民主党吸收,在它的各级委员会中并没有地位。“激进左派运动”反苏的基础是“委员会共和制”,在斯图加特的托马斯-闵采尔派中并通过《星火》刊物,有一定的影响,但存在的时间未能更长一些。社会民主党继续玩弄表而上革命的词藻,搬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公式,奉行感情用事的和平主义,对国家仍然采取否定态度。德国经济的趋势是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并入中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对这样的经济是没有能力改造的。但是,既然它不时号召实行国家领导经济的政策,它就依旧使得很大一部分舆论很不放心,宁愿投票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固然,有一部分人是从讲求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的中心人物是若干大城市的市长,例如柏林的罗伊特、不来梅的凯森、汉堡的布劳尔;或是某些州长,例如巴伐利亚州的双领导克诺林根和霍格纳;但是他们对党的官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在经济方面,党的理论家恩里希·诺尔廷始终坚信,盟国所建立的经济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将导致社会民主党执政,因此任何行动都是没有用的。1949年8月国会议员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几乎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平分秋色(百分之二十九对百分之三十一),尽

管如此,繁荣高潮迅即到来,该党还是猝不及防(德国人认为,这次高潮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既未能预见,又不知如何加以利用,而只会拿自己的政策去投合它。在以后的年代,该党只得眼见着党员人数逐年减少;1947年党员人数为八十七万五千,1950年为六十八万三千,1961年为六十四万五千。连续十多年,该党在选举中得票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极限。

越来越多的党员认为,在这种挫折中,出路在于彻底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决裂,抛弃马克思主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著作中搬用了许多论点,而例如哲学家汉斯·阿尔贝特则在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数千年来的乌托邦。曾经是“新起点运动”积极分子的保罗·塞林,在材料极为丰富的著作《超越资本主义》中设想了一种介乎苏维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新形式计划化并主张对经济实行民主监督,但书中主要还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脱离传统形式社会主义思想的倾向,例如,围绕《精神与行动》杂志的伦理社会主义派,阿莱克斯·米切利希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经济学著作,还有阿道尔夫·阿恩特尝试为一种特别诉诸德国新教村社的新人道主义打下基础的努力。若干知识分子和大学界人士于1947年在黑森州的齐根汉聚会,表示对辩证唯物主义持怀疑态度。不过,舒马赫生前,一切还不太过分。1949年大选之后,该党以“杜尔克海姆十六点纲领”著称于世的方针提到经济计划化和关键性企业社会化;舒马赫为奥伦豪尔所取代之前不久,于1952年举行的多特蒙德代表大会也只作出微弱的革新,而某些人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地放弃了某些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虚伪地掩饰该党的真

正目的。1953年的大选结果令人失望，于是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置疑，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看作阻碍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发展的一大障碍，因为在德国，劳动者感到自己日益长入现存制度，而东德实行的种种斯大林式措施成了反对任何计划化——即使是民主的计划化的口实。各种专家委员会讨论国有化与竞争孰优孰劣，讨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性质，讨论党的目标，主要的发言，在社会主义伦理学方面有哲学家纳尼逊的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格哈德·魏塞尔和维利·艾希勒(Willi Eichler)，在经济学方面有海因里希·戴斯特和卡尔·席勒等人恢复自由发挥供求作用之说，在确定新形式文明方面，有卡尔洛·施密特认为社会主义这一“精神祖国”是德国人本主义的归宿的论断。老实说，并不是顺顺当当毫无激烈争论的，例如1954年的梅勒姆提纲就是如此。这份提纲是格哈德·魏塞尔和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相持不下的产物。后者对于牺牲社会民主党革命传统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同年举行的柏林代表大会原已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全体人民的党”。1957年大选失败向党的领导证明，如果想越过百分之三十大关(这是承担领导政府责任的必备条件)，就必须彻底改变工作方法和政策总前提。1958年举行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建立了以赫伯特·维纳尔(Herbert Wehner)为精神支柱的一个领导班子。这位副主席来自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左派”势力的衰落。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弗里茨·艾尔勒说，“如果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作为1959年原则宣言的基础，那就是最大的反民主。假如我们坚持那些概念，我们很快就会只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宗派。”

作为屡经协商以及党的理论刊物《新社会》上多次论述的结果，哥德斯堡纲领(1959年11月)与其说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不如说是揭示了某些道德“价值观念”。社会民主党从此被确定为“思想自由”的党，建党的基础是“基督教伦理学、人本主义和古典哲学”，它所吸引的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互相一致依据的是“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某些相似的政治目标”。因此，再也谈不上与教会作对，相反，党希望与之“自由合作”并同意“教会享有的社会权利得到保障”。党还申明它完全忠于“联邦共和国的根本法”，今后斗争只能用“民主手段”进行。党在经济方面放弃“国有化这一终极论”，只许国家机构制定一项符合实际的灵活政策，这项政策“基本上应该只限于对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只要不妨碍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有权得到保护和支持……必须加强中小企业，使它们能够经受大企业的经济竞争。”“尽可能的竞争，尽必要的计划化，这是金科玉律。党竭力反对经济权力集中，无论是集中于国家手中，还是集中于私人企业手中，尽管如此，它为避免这一危险，仅仅主张经济非集中化。在新秩序中，将不再有阶级斗争的地位。作为经济公民，工资收入者将参与供职所在企业的共同管理。”纲领强烈谴责共产主义，说它“侵犯人们和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抉择”，然后反复强调社会民主党再也不是“工人的党”，而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党停止宣传它的“亚文化群”，决心并入全民生活。

哥德斯堡纲领当即获得几乎一致的赞成。唯一的反建议来自阿本德罗特，然而过于激进而未能被接受。某些代表，例

如代表南黑森州的维利·比尔克巴赫和代表哥廷根的彼得·冯·欧尔岑,对社会发展提出不同的分析,强调的是集中经济权力,置之于劳动者日益增大的控制之下。党对哥德斯堡纲领予以支持,其中选举考虑和信仰考虑各占多大比重呢?维利·艾希勒毫不讳言,首要的目标是上台执政:“我们不为反对国家而斗争,我们为了国家而斗争,为了我们希望统治而且一定要统治的这个联邦共和制的国家而斗争。”尽管如此,也应看到,哥德斯堡纲领是1947年以来即已极其明显而经长期准备的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

同时,原来长期持中立主义态度的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其外交政策理论。在舒马赫的影响下,该党曾经不断表示断然反对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教权性质的欧洲,断然反对舒曼计划和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指责阿登纳使得恢复德国统一成为不可能,加剧东西方的对立。但是,1959年在柏林危机之后确定的“德意志计划”提出了一个替代政策,其中规定一系列“脱离关系”措施来促成德国统一,然后党通过维纳尔于1960年6月声称:北大西洋联盟是恢复国家领土统一的一个条件,而德国应该承担国防负担,德国不可以退出北约。这样就发展了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合作的思想,表明社会民主党愿意尽可能走得远些,以求脱离反对党的孤立状态。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翻然改变,只是长期以后才收到效益。竞选总理职位的新候选人维利·勃兰特,虽然自从1957年就是柏林市长而且政绩斐然,在柏林墙事件考验中也曾倍增荣耀,1961年大选中却未得突破;1965年大选中依然败北,尽管在党内已当选为主席。在德国某些舆论看来,妨碍

他的是曾为反纳粹战士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穿过盟军军服。只是由于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腐化、经济衰退、自由党背叛,1966年才得以组成“党的指导方针”早在1962年就预期的大联合政府(这种设计受到基层的反对,而勃兰特是竭力维护的),其中勃兰特任外交部长,卡尔·席勒任经济部长,首脑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基辛格。两党合作终于证明对社会民主党非常有利,人们认为由于这一合作得以向东方国家采取外交攻势,尤其是得以在1967年以后重振了经济。一位明显表示与传统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德国保持距离的社会党人士古斯塔夫·海涅曼当选为总统(1969年3月),而9月的立法选举又使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几乎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相等(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对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这就表明该党前此受到的不信任已得克服;虽然不是在市或州的管理方面,但至少管理全国性事务方面,选民是怀疑他们的能力的。勃兰特成功地与自由党磋商建立了联合阵线,因而得以在1969年10月出任总理。在外交部长自由党人希尔的支持下,他制定了“东方政策”,目的在于克服联邦德国始终遭到的复仇主义怀疑,也是为了摆脱它在东方各邻邦方面所处的孤立状态。于是,勃兰特使联邦德国得以在国际上位于前列,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勃兰特已经证明,无须大西洋联盟破裂,德国已经不是“政治侏儒”,而是“经济巨人”了。他的政策成绩卓著,他因而得以在1977年11月提前选举中使他的党一跃而为德国第一大党——选票计有一千七百万之多。

在六十年代的过程中,该党焕发出青春,无论在党员群众方面,还是在领导方面,面貌都焕然一新。它在德国政治舞台

方面以一种“新型”民主的姿态出现。1979年党员已达九十万，而且还在不断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吸引过来，该党在第三产业中和不断进入消费社会的边缘阶层中也有长足进展。虽然它的选民主要是在美因河以北的新教地区，但它也侵吞了天主教选民的很大一部分，对妇女选民也有很大影响。在这方面，哥德斯堡纲领所提出的希望已经实现。至于执政班子，它已经确定不移地脱离官僚主义旧窠臼；勃兰特在联邦德国长期享有肯尼迪那样的威望，而他是介乎新老两代人之间的政治家。元老们中有弗里茨·艾尔勒，逝世过早，未及证明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才能，有卡尔洛·施密特：长期患病，脱离政务，还有赫伯特·维纳尔；顽强争取实现大联合，在小资产阶级看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证明继续被称为“赤色分子”的社会党人不负众望，年轻的一代尤其注重在他们认为没有感情用事的余地的当今世界上必须讲求效率，他们当中有卡尔·席勒：决心奉行“符合实际的明确政策”，尤其要提到的是赫尔穆特·施密特；反对“把政治前景神圣化”。勃兰特对于挑选僚属，采取兼收并容来自大学界的部长（霍斯特·埃姆克）和工人出身的部长（格奥尔格·雷伯尔）的做法。革新后的党领导机构有吸引力，也有效率，虽然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原来的党员因而却步不前，但整个中产阶级还是放心的，同时也不至于把左翼选票放跑了，既然左派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替代出路。越来越优先看待“党外民主”，即，注重党外选民，必须使自己有吸引力，才能争取他们，而不是注重党员，因为可以不管他们的意见，可以迫使他们不断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哥德斯堡纲领在1960年以

后成了问题呢？

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左派，无论是来源于反原子弹运动的德国争取和平同盟（DFU），还是除前马克思主义工会领袖维克多·阿加茨以外，还团聚了亲共刊物《另一途径报》编辑的独立社会主义者联合会（VUS），还是恢复科学社会主义名誉的期刊《社会主义政治》的主编冯·厄尔岑，都持消极态度。远为激进的是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反对派，其中一部分人对党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和亲美方向持否定态度。但也有非常活跃的集团：在汉堡，出版了带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和平主义刊物《具体》；在马尔堡，以阿本德罗特教授为首的人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仍然充分有效，而不加任何民主监督的垄断资本发展是危险的；在法兰克福，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创办的研究所有重大的影响；在柏林自由大学，有许多来自东部的学生上学，历史学家奥西普·弗莱希泰因力求恢复党内批评。对于大学生左倾趋势，社会民主党反应强烈，建立了一个高等教育社会民主联合会（简称SHB），随后又对SDS停止给予任何财政支持。1962年，对党内独裁的反击是1962年在阿本德罗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会。1960年在法兰克福创刊的出色刊物《新批判》为这个“德国新左派”，与美国的C·莱特·密勒斯的学说，与法国的统一社会党、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丹麦的社会人民党建立了联系。鼓动1967—1968年左倾大爆发的理论材料，就是出自该刊的两位编辑米凯尔·韦斯特尔和托马斯·冯·弗灵的手笔。

除了这些孤立的派别，“党领导”的态度长期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1962年科隆代表大会和1964年卡尔斯鲁厄代表

大会都表明普遍支持哥德斯堡路线。但是,1965年选举受挫引起了深刻的失望,原来温顺听话、很守纪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Jusos)因而焦躁不安,而即将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威胁更加深了这种迹象。哈里·里斯托克关于1965年选举的“提纲”指出,社会民主党做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尾巴。在“左派”有一定势力的地区,例如南黑森州和西柏林,这种置疑尤其有影响。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67年美因茨全国代表大会上加强了组织,次年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表示声援“国会外反对派”(APO)所提权利要求,还在机关刊物《社会主义青年杂志》上刊载了该派要求的主旨。他们在党内激起的反响绝对不可低估:1968年纽伦堡代表大会上,维纳尔和勃兰特的政策只是勉强通过。尽管对某些派别采取了制裁措施,例如1969年党同几年前促其成立的SHB断绝了关系,这些派别还是在党内结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反对派”,它打算在以后若干年内从改革政策过渡到非集中化的集体经济,眼前要求对巨额收入征税政策,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扩大自治管理的范围,限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德国中立化,在中欧设立非核区。Jusos得到党内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例如约阿希姆·斯特芬(属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有法兰克福党支部主席瓦尔特·默勒。社会主义青年团1969年12月慕尼黑代表大会指责哥德斯堡纲领对现实情况的分析是不符合实际的。1970年5月,在党的萨尔布鲁克代表大会上,Jusos团聚在“党内反对派”(IPO)之中,在诺贝特·甘塞尔领导下,促使大会谴责了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这是不是就足以动摇党的总政策呢?Jusos虽然拥有二千个“工作共同体”,在党的代

表大会上有一票数，却从未能达到它所希望的财政独立，因而不能阻止党的领导对它进行干涉。而且，七十年代初，他们自己在应该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以沃尔夫冈·罗特（1972年2月以来是该反对派的领袖）为首的一些人认为，党的革新应该从内部进行，而其他一些人，例如 Stamokap（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则采取与德共相当接近的立场，主张建立一个人民阵线，导致反垄断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言而喻，他们助长了保守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祸患的攻击，尽管如此，他们并不觉得羽毛已丰，可以与党决裂了，归根到底，还得支持勃兰特，例如1972年10月在多特蒙德代表大会上就是如此。11月的选举对社会民主党有利，在这之后不久，他们重新提出原来的要求，再次谴责倒向经济成长的思想，主张由集体承担起社会投资的责任，然而，总理在1973年5月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予以断然拒绝：当选的党员都是根据既定纲领被选中的，因此纲领不可以推翻。至于Jusos提出的那些问题，党干脆予以“相应不理”。不过，党内也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代表人是政治学家理夏德·勒文塔尔，集中在拉恩斯坦派内，指责Jusos是迫使社会民主党重蹈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摆脱的百分之三十那种绝境。虽然有些人滔滔不已，Jusos还是竭尽所能避免被党开除，而这个党他们根本不想完全自觉自愿退出。

对于社会民主党党内六十年代开展的批评，工会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也表达了工人阶级在哥德斯堡以后出现的某种不安情绪。德国总工会（DGB）的活动，始终围绕着企业共管问题；1951年的法律使总工会得以在矿业和钢铁业中有

对等数目的代表，但一年之后通过的法律又大大缩小了这种共管的作用；职工代表在监督委员会中压缩到只占三分之一。1963年在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上，DGB制定了一个非常温和的纲领，表示并不要求改变现存经济结构（Neuordnung），只要求通过指导性计划化和企业民主化来改变现存框架（Umgestaltung）；因此仍然是个共管问题，为此进行了热烈的宣传。此外，无论是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还是在紧急状态法（Notstandgesetzgebung）问题上，DGB的立场都比党的立场强硬。金属工人工会和化学工人工会谋求建立一个“工会左派”，弥补没有国会反对派的不足，抵御行动自由和民主权利所受威胁。然而，更进一步是不可能的；金属工人工会的势力强大的主席奥托·勃伦纳原来在《新社会》上发表的观点有许多与最激烈抨击波恩共和国的反对派很接近，自从社会民主党分担政权责任以来，似乎竭力避免给政权制造麻烦了。不过，问题是不是就此解决了呢？1969年秋德国爆发的“野蛮罢工”（人们乐意认为其中有重建后的德国共产党捣乱），说明在德国也象在瑞典或英国一样，只要工会中央没有失去对自己队伍的控制，也就天下太平，自认为通过纯粹物质利益满足了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要求。DGB于1971年5月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指出，假如无产阶级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社会安宁就有被扰乱的危险。事实上，各大工会始终摇摆不定，一方面想要避免基层众叛亲离，一方面又不敢危害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1971年巴登-符腾堡金属工人大罢工表明政府处境艰难，无法调停雇主和工人群众；雇主方面凶相毕露，有决心一决雌雄，而一部分工人群

众则由于再度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而生活水平受到打击，已经失望，怨气冲天。

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确定的政治路线得以维持并得到肯定，又是由于“国会外反对派”(APO)的失败。这个反对派的产生是受鲁迪·杜契克的影响而激进化的社会主义学生集团(SDS)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活动的结果，而当时的骚动波及整个大学界，大学生们为反对整个社会结构而起来造反，根据毛泽东、马尔库斯塞、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全盘否定既定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尽管由于受到盲目暴力镇压和施普林格系报纸的诋毁而在1967至1968年运动有了广泛发展，内部却四分五裂，内讧不已，以致对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影响——看来，这些工人并不想对本国的社会结构进行革命变革。以争取民主进步行动集团(ADF)为代表的极左派在1969年大选中的失败表明，极左派脱离了国内有生力量。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倒向社会民主党——这在德国是一个新现象，——而且以马丁·瓦尔泽为核心人物，早在1961年选举时就主张要有一个社会主义“转变”，但终于拒绝了支持青年骚动。象京特·格拉斯那样著名的作家，早就采取拥护社会民主党上台的立场，对组织大联合政府却表示遗憾，认为那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在其著作《政治证词》中指责勃兰特同前纳粹分子基辛格和民族主义分子施特劳斯打得火热；然而，1969年他仍然积极从事竞选运动，而这一次是为了击败反党的极左学生运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由于其民主传统——“民主不缺少于循规蹈矩的革命分子，缺的是极端的民主分子”——扎根于理性和文明教化之

中,因而秩序是一种“正常的义务”。在波恩共和国初期即已受到“47年集团”和汉斯·维纳尔·里希特的影响,以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和《法兰克福手册》杂志为核心的人士中间,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反应。左翼知识分子尽管反对现社会结构,对产生于“德国奇迹”的现社会不予信任,但并不愿意看见反对派堕落成为“革命的空中楼阁”,因而除了少数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马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此人是《指示》杂志的编辑,深受中国文化革命和古巴事态发展的影响),都摒弃极端主义观念,竭力促使实现“首尾一贯的改良主义”。

也象英国工党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归根到底不能、也不想变革德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正如新教神学家赫尔穆特·戈尔维策所指出,统治阶级继续居于统治地位,而由于集中过程的加速,垄断更加发展,严重威胁着公民自由。1969年大选后一年在札雷布鲁克举行的代表大会一方面沿用哥德斯堡纲领,另一方面却宣布:“为了社会民主,前进!”但十八个月后(1971年11月)在波恩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上,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和主张改革的合作部长艾拉尔德·艾普勒尔互相对立,证明了不可能考虑实施对巨额收入课以重税的改革,也不可能以大公司红利为基础设立工人福利基金。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于1972年6月变成了一个非常低调的“1973—1985年政治经济方针范围”。勃兰特在1972年提出、又于1973年1月组成他的第二任政府时重申的“新中心”观和“民主社会主义”观,只是以“重新意识形态化”为掩盖,悄悄牺牲了改革政策,尤其是关于建立工人福利基金和普及共管制的改革政策,以利于实施多党制民主政治,而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民主自由

党特别是 1972 年选举中势力加强以来，反对任何国家领导经济的社会政策。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各个指导性机关报刊，依据 1971 年 2 月通过的一项决议，郑重其事地宣传今后党内再也不容许有人脱离哥德斯堡纲领或设想与其他左翼团体——“无论是什么倾向的”左翼团体采取联合行动。1972 年种种极端主义表现（例如在巴德尔逮捕“帮派分子”），销路很大的施普林格系报纸又加以夸大，其结果无非是：社会民主党支持九个州内政部长的决议；从公众机关中开除一切“属于反宪法组织”的分子；尽管如此，对总理“纵容”“革命”左派攻击之词并未稍敛。1973 年 5 月在汉诺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机构最大的考虑，如前所述，是证明再也不允许动摇既定社会经济秩序，最多只能通过引导投资和指导性全面规划的办法纠正市场经济的缺点。从此，任何要求改变的意愿都遭到维持现状的企图的反对，而维持现状是为了保持各种社会力量相安无事，同时疏导冲突，——对于各种冲突，今后将毫不犹豫采取专断方式加以解决（H·格雷宾）。

阿本德罗特出色地分析了社会民主党难以解脱的党内深刻矛盾，认为它从旁支持了资本主义统治：“一方面，社会民主党部分地成为反对它自己所依靠的社会阶级的现制度的一个机构；另一方面，它仍然依靠这个阶级，不断从这一边受到推动，把它推向另一个方向——它就这样在矛盾中前进。”因此，几年前开始的“非意识形态化”过程是继续下去呢，还是对于一个阶级社会和一个维护私人资本利益的国家的批判终将改变党对自身的看法，还有待分晓。

从奥地利共产主义到奥地利社会主义

没有哪个地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象奥地利那样迅速而全面。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之间在第一共和国时代原是根本敌对的，现在这两大政党自称为“社会伙伴”，敌对的关系已经改变为无疑欧洲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平衡状态。维也纳解放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立即合并为SPÖ。这个新党参加了由卡尔·伦纳领导的三党（人民党、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1947年以后，该党不得不在联合政府中退居次要地位，从而同人民党（ÖVP）一起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参与政权，并从“比例制”中获得利益：这一制度让各方都在政府中按比例有其地位并通过各方代表数目相等的若干委员会来解决一切问题。1966年大选以后，由于党内几起丑闻，社会民主党暂时退出政权，政府成了“清一色”的人民党政府；但是，1970年社会民主党又夺回了政权。不过，在这个期间，已经深入体制、深入人心的两党“伙伴关系”并没有因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要了解这种情况，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左边有一个共产党，它的选举影响虽然有限，但它一贯拒绝任何妥协。1945年，奥共由于它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和多次声明维护奥地利独立而享有盛誉，因而得以登上奥地利政治舞台，在伦纳内阁中有多名代表参加，但是该党未能克服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它无条件拥护苏联占领当局。1945年11月选举中，该党只有四人当选，表明奥地利人民讨厌它。以后几年，人们指责该党让苏联使用通过没收德国产业（USIA）而收归社会所有的企业，而这些德国产业早已是宣

传的热门题目。冷战爆发以后,唯一的一名共产党部长卡尔·阿特曼博士退出了政府,社会党员内政部长奥斯卡·赫尔默在副总理阿道尔夫·歇尔夫的同意下,开始了清洗,把共产党员统统从原来的领导岗位上赶出去。固然,有些社会党员,例如埃尔温·沙尔夫,反对这种做法,但沙尔夫遭到开除处分,只好组织了一个对抗的党——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这个新党一直气息奄奄,最后不得不并入共产党。奥共试图引导1950年夏在林茨地区爆发的自发罢工运动以利于该党自己,并使之最后成为总罢工的起点,然而这一图谋终于失败了,部分原因是苏联占领军袖手旁观;无论如何,这样一来,社会党人弗朗茨·奥拉反倒加以利用,夺回了工会领导权,还组织了一些突击队使用暴力粉碎任何起义尝试。事实上,从此以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间再也不起明显作用了,而后于1959年连最后一个国会会议席也丢掉了。维也纳知识分子中有些优秀人物,例如恩斯特·菲舍尔,他对社会党的实利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他还在共产党圈子里促使恢复了卡夫卡的名誉;再如《途径和目标》社长弗朗茨·马雷克。六十年代人们考虑了某种形式的aggiornamento^①并寻求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奥地利道路”。领导人由约翰·科普莱尼希换成弗朗茨·穆里,使人们产生了巨大希望,这是因为他支持“布拉格之春”人士,然而这种希望使次年的“正常化”未得实现而且导致开除马雷克和菲舍尔。但是,在整个这段期间,社会民主党坚持不谋求极左派支持这一原则。

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奥

^① 意大利语:革新。——译者

托·鲍威尔的前战斗伙伴尤利乌斯·多伊奇 1947 年拟定的行动纲领,尽管非常厌恶任何形式的独裁,并没有远离奥地利共产主义一般原则;该纲领坚持 1926 年在林茨确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十年以后不是这样了。十年以后,经过长期协商,委托贝内狄特·考茨基在布鲁诺·克赖斯基和工会领袖弗里茨·克兰内尔(Fritz Klenner)起草一个新纲领。贝内狄特·考茨基是那位德国社会主义大理论家的儿子,曾被关进集中营,对集中营制度分析有素,而作为工人教育家的经验和作为《信贷机构》负责人对工业新社会经济问题的实际知识,对他起草纲领的工作大有助益。新纲领载有这样一个时代的烙印:奥地利签署了 1955 年国家条约之后,已经取得完全独立,经济有了惊人的振兴,分享政权的两大党之间似乎和谐一致之至。因此,1958 年纲领比起所有以前的纲领来,有其深刻的创新:它绝口不提反革命暴力,也不愿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专政作任何辩解,即使只是退守性质的辩解;它强调宗教信仰和作为“兄弟友爱教”的社会主义同出一源;宣布放弃系统地把企业收归社会所有(事实上早在 1945 年已有许多企业收归国有),认为只有在涉及全体利益时才可以考虑,而且必须给以赔偿;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前不久维护的观念相反,提醒说“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按照历史先定论法则产生,而是要求劳动者作出贡献”。奥地利社会党赞成多党制,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绝不考虑同二者作任何妥协。1958 年纲领还引入了“伙伴关系”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价格问题和工资问题都应该通过以奥地利总工会(ÖGB)和劳工会为一方,资方组织和国家为另一方之间

的仲裁来解决，其突出范例就是 1957 年即已建立的对等委员会。

1958 年肯定的这些原则直至 1966 年以前并未遭到否定。1966 年，奥拉丑闻强烈震撼了社会民主党。奥拉当时是内政部长，在工人中非常有威望，但人们指责他挪用交给他支配的美国资财去资助种种政治活动。他终于被开除出党，于是为反对 SPÖ 而组织了一个进步民主党 (DFP)。这个新党更接近于第三帝国意识形态，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该党未能有所突破，却使社会民主党在 1966 年大选中受挫。对这一挫折进行反省的结果，促使社会民主党加速向民主方向发展；布鲁诺·克赖斯基从 1959 年起任外交部长，1967 年继布鲁诺·皮特曼为党魁，此人战时流亡瑞典，得以见识该国体制机构，因而极其叹服；他希望，党遵循激进实用主义方向而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其实 1958 年纲领对这个传统丝毫未曾提及；他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的前提条件。这就是 1969 年党代表大会确定的著名的“人的纲领” (Humanprogram) 内里的含义。这一纲领以“人”作为一切社会考虑的中心，自称从民主中去除了它的形式主义方面。克赖斯基也作出类似的努力，首先关心的是使奥地利“现代化”，在现存体制机构范围内予以革新，从而组成一个专家、技术人员参谋部，粉碎 ÖVP 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垄断地位。他在与天主教社会学院院长、耶稣会士瓦尔特·里纳尔会谈之后，竭力证明天主教选民是没有理由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经过 1970 年 3 月大选，社会民主党得以第一次单独掌握政权；次年弗朗茨·约纳斯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以及 1971 年 10 月立法

选举使PSÖ获得绝对多数，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选举胜利实现了奥托·鲍威尔长久的梦想：超过百分之五十选票！这一胜利对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党内就此进行了激烈争论，涉及的是奥地利社会主义前途问题：集体论著《赤色标志》的出版和1972年6月菲拉赫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克赖斯基对他的信徒们的影响并未因而动摇，而是恰恰相反。

与纲领改变相应，社会民主党内部也起了变化。党固然始终保持着将近七十万党员，但也同时扩大队伍，从第一共和国时代所局限的维也纳逐渐向外省扩展，尤其是向克恩滕和布尔根兰扩展，而从中等资产阶级、甚至从农民中争取的选民数量日益增加。左右两派仍然争执不下：右派以弗里茨·克兰纳和克里斯蒂安·布罗达为代表，满足于使社会主义适应恢复了生气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左派，以约瑟夫·欣德尔斯为代表，强烈谴责参加联合政府，以卡尔·切尔内茨为代表，拒绝认为改良主义除了上台当官之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也尽管有些人担心会出现官僚主义“工会国家”，但是，关于必须维护奥地利民族观念，大家意见还是一致的，而原来在四十年代末由于大德意志传统，对此是强烈否定的，只是经过了抵抗运动的考验才得到了巩固。尤甚于人民党，社会民主党认为，奥地利再也不属于德意志民族，其独立是必须保全并予以捍卫的一大成就。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未来》（由奥斯卡·波拉克在其晚年领导）多次抨击通过大学生组织、运动员协会、登山俱乐部渗入奥地利的泛日耳曼纳粹思想。许多人士，例如从1965年至1970年任维也纳市长的布鲁诺·马雷

克,还有布鲁诺·克赖斯基和弗朗茨·约纳斯,政治战斗生涯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护奥地利民族观念。伦纳的朋友、为他写传的雅各·汉纳克也是如此,他以文学刊物《论坛》为阵地,积极参加争论,证明神圣罗马帝国观念已经寿终正寝。民族国家理论家之一是社会党哲学家京特·嫩宁,他力求在天主教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多民族古老帝国故都无数次集会上他都是折衷主义的精神支柱,在他的著作《联系未来》(1963)中,阐述了奥地利所继承的过去以及可以期待的未来。

瑞士社会民主党

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和维也纳的考虑,在瑞士党 1959 年纲领中也有反映。瑞士社会党在 1904 年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 1920 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借以挫败共产党,在 1935 年力求有效抵御法西斯危险,现在却决心永远抛弃无论远近、无论形式或内容上足以使人想起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瑞士社会党宣称与共产主义毫无牵连,并不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党,而是自称为全体人民的党。它只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上,严格合法范围内,在它放弃确指单一形式的联邦国家中开展行动。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明天就会灭亡的,它放弃变革社会结构的意愿,而满足于在某些情况下将关键性产业收归国有、整治国土和开展“诚实的竞争”;它诉诸一切派别的基督教徒,只要其信仰能够作为制度的“主要动力之一”;它还自认为既继承法兰西革命成果所产生的自由主义,又继承基督教义的教诲。在日常政策方面,这种态度使有代表参加

政府的瑞士社会党不可以以反对党面貌出现。瑞士政府奉行的中立政策以及“经济依附”论，对于瑞士社会党长入本国政治生活起了加速作用并成为对党的宣传的严重障碍。

不过，解释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瑞士党强烈希望抹去马克思主义标记。很大一部分居民，尤其在德语地区，根本仇视共产主义，有时甚至达到麦卡锡式迫害的程度，因而有许多同情社会进步、然而摇摆不定的选民不敢投社会党的票，因为害怕有一天“赤色幽灵”会出现。鉴于这种把政治简单化的魔教^①似的幻觉，社会党尤其小心翼翼，不敢在意识形态上依附于莫斯科。况且，在它的左边并没有一支足以使它真正惊慌的力量：瑞士劳动党(PDA)战后不久曾在日内瓦多少有点群众，1952年起只剩下几千党员，而这一年还把主席雷昂·尼科尔开除了，而且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只能称之为高级职员党，几乎只在法语各州发展党员；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东西方缓和促使它也考虑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士道路，却未能避免极左分子大唱高调。

二、面对共产党的社会党

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②到新的法国社会党

与上述各国相反，法国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也是如此)

① 原文为“摩尼教”(即明教，又被称为魔教)的形容词。其教义之一说善恶并存，并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译者

② 原法国社会党的全称。——译者

有这样一个特点：它的左边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它的选民众多，它对工会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经过短暂一度甜蜜生活之后，由于冷战爆发，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不得不承受仇视其竞争对手共产党的反作用，因此，它成了保守政策的支柱，于是，整个第四共和国时代以及第五共和国初期，选举基础削弱，在全国影响消退。六十年代后期，社会党重新抬头，其表现是组成一个新型的党，得以把全部非共产党力量重新聚集起来，同时与它的头号对手进行谈判，以求达到一个执政共同纲领。

丹尼尔·迈尔在抵抗运动中重建的SFIO解放后似乎一帆风顺。这样的信念当时相当普遍：旧统治阶级已经破产，法国已准备好迎接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然而，自从1944年11月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上把八十五名曾经投票赞成组成贝当政权的议员开除出党——以来，看来，该党只是勉强接纳来自党外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奉行一种国有化和指导经济的纲领，在当地积极分子中受到猜疑。因此，该党与全国解放运动(MLN)断绝了关系，而且拒绝如《战斗报》所希望的组织一个与统治英国政治生活的工党相似的广泛工党运动；这方面遇到的阻力是对人民共和党的世俗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很难指望对抵抗运动的理想采取关门态度的法国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有所革新。固然，勃鲁姆在其著作《人类阶梯》中，而后在1945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本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却不能认为它是一种足以解释世界的形而上思辨；他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宗教为同盟

军；继承饶勒斯的思想，他毫不含糊地断言，社会主义既然是人民拥有主权说的延续，就必须具有民主性。勃鲁姆从未能控制党的机器，他的观点被《社会主义思想》杂志指责为新修正主义。该刊撰稿人，除马尔索·皮维尔外，还有来自阿拉斯的年轻议员居伊·摩勒。摩勒坚持 SFIO 保持其阶级斗争党、坚决反教权的性质。1946 年 8 月代表大会上，迈尔的报告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否决，接着，摩勒就担任了党总书记。表面上看，是理论上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一种“现代化了的盖德主义”——在党内占了上风，其实，该党很快就淹没在“学院式夸夸其谈”之中，但这并未能掩盖它在理论上的空虚（参照 M·杜维尔歌）。

解放后，人们原曾期待社会党与共产党密切联系。事实上，也曾于 1944 年 12 月建立一个协约委员会。但是，从德国回来的勃鲁姆对共产党猜疑甚深，认为它是苏联政策的工具。大概就是在他的影响下，1945 年 8 月代表大会继《人民报》上多篇文章之后，表示反对组织统一；10 月大选前两党分别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结果社会党员有一百四十二人当选，共产党当选者有一百五十八名。社会党担心遭受人民民主各国社会党那样的命运，拒绝同极左派商谈，指责他们有“极权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考虑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共和党三党的联合政权。在这种政权中，社会党由于象以往激进社会党那样采取中间立场，得以占据国家机器中关键性部门。担任国民议会议长，而后，宪法通过以后，又于 1947 年 1 月出任共和国总统（当然并不是仅仅挂名而已）的，就是一名社会党员——樊尚·奥里欧。正是在那个时代，表决通过了一些不容

忽视的社会立法：社会保险法、企业委员会法等等。其实，社会党不得时常玩平衡把戏，这成了党的力量削弱、党员士气不振的根源。第一次公民投票时，社会党未能促使公民接受它关于宪法的主张；第二次公民投票正当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失去三十议席之后，为这次公民投票，它只得同人民共和党协商。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政府，就是一个社会党员——保罗·拉马狄耶在三党基础上组成的。但是，除了印度支那问题之外，由于雷诺汽车公司爆发罢工，而共产党不愿表示反对，拉马狄耶只好与共产党部长决裂（1947年5月），这在SFIO党内激起了强烈反应。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加深，法国左翼两大党的对立是与这种情况相联系的。在欧洲分裂的情况下，法国社会党同意这样的看法：振兴欧洲离不开美援（1946年3月勃鲁姆访美时就已经要求过美援），还必须接受马歇尔计划。社会党虽然容忍某些党员赞成中立主义，但它正式谴责中立主义。在任何情况下，该党都认为，“外国民族主义党”共产党对于法国而言，比自由资本主义祸害更大。内政部长于勒·莫克采取粗暴办法粉碎被他看成革命的1947年11月和12月的罢工，议会通过镇压法（只是由于迈尔的努力，才删去了一部分实质性内容），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鸿沟，并将SFIO无可挽回地扔进了反共阵营。美国和民主欧洲亲善，在勃鲁姆这样的人士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拒绝把纳粹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等量齐观，并不是人们时常把他说成的那种冷战理论家。

SFIO党外人士为反击该党蓄意反共进行了努力，但无论是以若望·鲁斯为精神指导，以萨特的革命民主联盟为标

志,并有《现代》杂志支持的努力,还是例如在埃马努埃·穆尼耶的杂志《心灵》上基督教徒和“开放式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对话,双方都关心“遏制共产主义与其他居民之间致命的分裂”,都未能消除人们不信任共产党的心理,而这种猜疑,在苏联集中营被D·鲁塞揭露以后,在莫斯科审讯和布达佩斯审讯以后,在斯大林和铁托决裂以后,在共产党和法国其他左派之间反而加深了。

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戴高乐派的第三种力量中,SF-IO 位于它的左翼。尽管没有社会党,任何多数都不可能形成(这使它产生幻觉,自认为强大),但它很快也就认识到处境非常尴尬,由于必须支持不理睬社会主义的政府,它事实上作了“左派在中右政府中的人质”。勃鲁姆 1947 年底争取成立不要右派支持的纯第三种力量政府失败之后,社会党失去了总理职位;1950 年以后,它只好退出政府了事。固然,1951 年选举,由于实行选举联盟制,结果对第三种力量各党有利,社会党当选的有一百零六人;但是,由于巴朗惹关于私立学校经费法案问题,它们与人民共和党不可能再合作下去;学校问题仍然在多数派各党之间造成裂痕。比内政府于 1952 年 3 月成立以后, SFIO 转入反对党地位。整个那一届议会期间社会党都持这个态度,只有一段时间例外,1954—1955 年支持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不过还是不出部长。

摩勒当选总书记标志着社会党态度转趋强硬,但并未能抵挡住欲求掌权的诱惑。摩勒其人就是 SFIO 党内社会主义积极战士最完美的典型(参照 J·屠沙尔)。作为“摩勒主义”特点的是:倾向于看重组织问题超过理论问题,倾向于加强党

的机构。在党内，各分部候选人提名自主，但主要还是那些凭年龄上去的老资格战士才攀得上领导岗位。至于领导委员会，其成员依原则上代表各种倾向的单一名单选举产生，实际上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而他则依靠几个大分部：诺尔省、加来海峡省、上维埃纳省，这几个大分部又为他保证多数。假如各革命力量仍然活跃，这种控制党的做法是不可能的；然而，SFIO正在迅速资产阶级化，党员中虽然工人还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尤其是在诺尔省），却主要是在小城市的职员和公务员中，也在法国中部和南方过去属于激进社会党的农村里，吸收党员。社会党对知识分子颇多猜疑，因而自甘“没文化”（最坏意义上的“没文化”），宁愿固守习惯用语和习惯思想，不肯冒冒探索之风险（R·基约）。在殖民地问题上，尽管历史学家夏尔—安德烈·于连和推动创办了《社会主义突尼斯》的一班人一再警告，法国社会党还是死抱着雅各宾派那种同化观念不放，“小白人”^①的殖民主义精神在党的内部起着破坏作用；社会党员艾德蒙·纳热朗1948年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立即在选举中舞弊，抵御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党在法国本土注重市政管理权（有六万市政委员是社会党党员，即占党员总数的一半），急于让党员当官发财，丑闻迭起，搞得声名狼藉，于是日趋“老大”，已经不能象盖德和饶勒斯时代那样大规模动员群众。这幢“老房子”表面上还完好无损，其实墙壁都已经到处裂断，无法对年轻党员们的热烈辩论发出回声。党在意

^① 法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北非经同化的阿拉伯人都是白种人的分支。——译者

意识形态方面完全持否定态度：反共主义根深蒂固，1947年法国总工会—工人力量总工会联合组织的建立更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反共立场；反教会立场也顽固不化，完全不正视现实情况。自称维护“小人物”的利益，却保持资产阶级社会保险理想不变，它在表示支持国有化之后，并不能提出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政策。因此，党员人数锐减：1946年总数为三十五万，到了1960年初就跌落到不满十万了。

尽管摩勒实行极权主义领导，社会党在五十年代还是发生深刻分裂，大者有三次：

一、在欧洲防御体(CED)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有些社会党员，例如莫克和迈尔，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是以德、意、法三国基督教社会党联盟为基础的“黑色国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走向重新武装德国的道路，而这个德国必然会提出广泛的领土要求。尽管1954年5月特别代表大会，在狂热欧洲派摩勒的要求下，决定要采取票决纪律措施来赞成CED，当孟戴斯—弗朗斯政府把这个问题提交议会时，议员们还是各行其是。12月表决从法律上肯定德国回归欧洲集体的巴黎协定时，不得不对十七名屡教不改分子予以惩戒。

二、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对于这场战争，许多党员多次表示反对，于是，受命在1956年1月以“共和阵线”为标志进行选举之后组织政府的摩勒，匆匆出巡阿尔及尔，然后决定让社会党党员罗伯·拉科斯特以停火、自由选举、谈判三部曲为幌子，继续实行镇压政策。不仅孟戴斯—弗朗斯退出了政府，这一政策还在社会党内激起了强烈反应，特别是以马赛市长、海外领土部部长加斯东·德费尔为核心的党员们的反

对，终于导致摩洛哥—突尼斯事务国务秘书阿兰·萨瓦里辞职，既然他不能同意逮捕本·贝拉，而这时法国军队滥施酷刑而不受惩罚，出现了第一批群众抗议。分裂更因11月远征苏伊士而加深，许多人认为这次远征是为了谋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未能得到的军事胜利。安德烈·菲利浦惊呼道：“一个社会党政府怎能把我们搞到这种地步？社会党怎么堕落到这种程度？我国人民的革命希望怎能变成一种反动民族主义的力量？”1957年7月图卢兹代表大会批准了“民族摩勒主义”，但对少数派采取了纪律措施。

三、对待1958年5月政变。一定数目的分部认为戴高乐提名竞选是向共和法统的挑战，而党的领导，在摩勒和奥里欧的影响下，却与戴高乐书信往返，接着又自己跑去晋见，认为团结在他个人周围是唯一既能逃脱军人独裁、又能避免由共产党主宰的人民阵线的办法。1958年5月，授权戴高乐仅以微弱多数通过。9月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摩勒接受了国务秘书职位，德费尔予以支持，并使大会承认只有戴高乐才能不流血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另一方面，大会上许多人反对现政权，以刚刚建立了一个民主力量同盟(UFD)的爱德华·德普勒为首，宁愿另组新党。

这种种分歧并不是SFIO特有的现象，而是所有党派共具的，它们表明了法国政治素质的实质。严重的是：理论纠纷对于党的生活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常例行公事与观念之争二者互不相干；正如人们正确指出的，SFIO是“老古董教条和凭经验办事的敷衍应付之间的妥协”。当然，仍旧不乏社会主义革新尝试：“凭理性和技术嗜好”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莫克，

力求对照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经济现实,于1957年创建了一个“理论学习小组”,常在《社会主义调查》上发表文章,努力从两个新观念——国内市场扩大和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角度重新全面探讨社会主义问题。至于安德烈·菲利浦,因为出版《社会主义被出卖》一书反对“摩勒独裁”而被开除出党,他尤其认为社会主义是“对人——人性的人,自由的人,对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人命运负责任的人,能够对历史现实有一定掌握的人——的价值的肯定”,是争取实现企业内部和劳动关系中的民主的努力。尽管如此,法国社会党在整个第四共和国时代未能起到抵抗运动似乎给予它的作用。一方面,它从根本上说不现实,未能摆脱革命神话;另一方面又不肯提出必须改革结构的问题,满足于只是资本主义寄生物的一种“假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它依然同一定程度的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无政府主义相联系,同某种马尔萨斯资本主义相联系,同对于经济决策始终无权左右、觉悟不高的无产阶级相联系。它的选民一成不变,成了使其意图不能为人相信,使这个党不能吸引年轻一代的主要障碍。作为陈列社会主义历史的博物馆,这个党“之于工人阶级斗争史犹如残废军人院之于路易十四的战争^①”(J·芒德兰)。

不过,在第五共和国时代人们也看见社会主义左派作出改弦易辙的努力,屡经起伏之后,于1971年终于组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

新房子并不是从“老房子”里面冒出来的。SFIO也象其

^① 巴黎的残废军人院原为路易十四所建,用来收容安置他历次征战中残废了的军人。这些人当然对于斗争已毫无用处,但有过功绩。——译者

他政治团体一样，被 1958 年 6 月事件打得晕头转向。社会党原来通过摩勒参与政府，戴高乐将军当选为总统之后，就退出了政府，以便不必对他的厉行节约政策承担责任。但是，摩勒坚持指出，他对戴高乐的宽大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是同意支持的，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社会党内激起了强烈反应。不过，社会党尽管已经僵化而且参加了“一概反对”联盟，好歹还是存在下来了；而且在 1962 年选举中，由于同共产党协商结成选举联盟，使用撤销某些候选人的办法，居然刷新了自己的选举记录。但是，一方面固然有些思想开放的人士，例如阿尔培·加齐耶和乔治·布吕台尔组织“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竭力通过联系工会界人士的办法摆脱日益沉重的官僚主义监护，另一方面由于摩勒和德费尔之间闹摩擦，党的日常活动却始终瘫痪；摩勒对任何开放政策都抱敌视态度，而德费尔则力求把年轻的力量团结过来，使党得以摆脱共产党的监护，反过来使共产党听命于社会党。

1958 年以后社会主义左派的改弦易辙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组成了一个“新左派”，它与一切传统政党拉开距离，而是相当密切联系于统一社会党 (PSU)。应该说，这种新方向是与大批信仰天主教的积极分子接近社会主义学说相联系的。这些积极分子的这个新动向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远在 1939 年以前马可·桑尼耶和《青年共和国》就为它作了准备，不过，成为举足轻重的事情只是在 1964 年：这一年，在彼埃尔·韦尼奥和《重建》一班人的影响下，在总书记欧仁·戴刚的支持下，一个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以后，实现了把前法国天主教总工会

(CFTC)非宗教化,改组为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这些社会主义新信徒反对SFIO的保守传统,认为该党不能适应现代,也反对该党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这些新人以后成为他们希望创建的社会主义新党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党的组成部分形色不一:有社会主义左派同盟(UGS),它是由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分化的一些人士于1957年创建的;他们中间有的成了社会主义者(例如克洛德·布尔戴和吉尔·马提内),有的成了以《法兰西观察家》为核心的基督教左派;有SFIO分裂出来的人;他们不愿同戴高乐公民投票发生牵连(德普勒,萨瓦里,维尔迪耶),分裂出来另组自主社会党(PSA);还有《共产主义论坛》集团;以塞尔热·马勒和若望·波珀朗为首的这些人是从共产党内脱离出来的。这样就在1960年4月成立了统一社会党(PSU)。其总书记是德普勒,但并不是没有遇到麻烦的,因为彼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也竞选总书记一职。孟戴斯-弗朗斯作为《共和国手册》成效卓著的鼓舞者,曾试图革新激进社会党而未能成功,这时已被那个党开除出来。不过,有些人认为他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PSU表现为既独立于社会党、又独立于共产党的左派力量,尽管它立即采取明确立场反对“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论调而且党员们为此积极努力,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旦结束,就出现了在政治局势的分析方面众说纷纭的各种“倾向”;PSU应该把各个旧政党团结到一起呢,还是支持一切新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工会?戴高乐是向一种专家治国主义发展的新社会的产物呢,还是传统反动势力的新式表现?“新派”和“老派”就是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1963年1月阿尔福维尔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六

个不同的派系,对立分歧就彰明昭著了。PSU在选举中没有根基,却有众多知识分子追随,摆脱了传统政党概念,而是作为民族有生力量汇聚场所出现,毫无疑问,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着酵母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对当代社会极其深刻的分析研究,例如塞尔热·马勒的著述,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左派的作用在于:克服改革、革命旧观念,通过摒弃官僚主义准军事服从来使生产机构民主化,同时长期增进工人自治。PSU在许多方面支持发展CFDT内部的这样一种理论:该组织在1970年代表大会上自称信奉社会主义,大致上明确了它想努力开创的新社会的三大原则: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民主计划化,自治管理。这一纲领既反对人民民主国家洋洋自得的那种集体所有制观念,又反对各社会民主党以为满足的收入分配观念。

与PSU诞生同时,重大事件还有各种政治“俱乐部”的发展,其中有些是在五十年代建立的,但主要作用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代替衰落的政党。其中突出的有传统的“思想社团”(托克维尔俱乐部,六十年代公民俱乐部)和政治战斗团体(雅各宾俱乐部,社会主义与民主俱乐部,七二年目标俱乐部)。最重要的大概是1958年为反对伞兵行动而成立的若望—穆兰俱乐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中有行政管理学校的高级官员,发表了一些研究国家改革的严肃文章。作为不排斥某种技术专家治国、有时追求通过计划化使资本主义aggiornamento〔革新〕的“现代”左派的喉舌,这些俱乐部共具这样一个特色:它们都象以往孟戴斯—弗朗斯一样,努力开导选民,为反对非政治化和政治经济集中化而斗争,但始终不排斥受到类如杜维歌和韦德尔等大学界人士拥护的总统制。从

1964年开始,各俱乐部分别合并,有些是通过在维希等地举行会议的方式,有些是通过共建“共和机制公会”(CIR)的方式。后一团体的发起人是夏尔·埃尔努,不久以后密特朗成为其中心人物,机关刊物是克洛德·艾斯蒂耶领导的《共和战斗报》。该团体最初并没有标示社会主义,从1938年开始,正式提出主张“投资、生产、交换的基本资料社会化”,承认阶级斗争原则,但并不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些俱乐部主要关心的是反对尤其是青年中厌恶传统左派的情绪,年轻人看到这种左派现时的破产,但还是希望它经由社会思想深化而振兴起来。这也是1966年5月社会主义者在格勒诺布尔会晤的用意,这次大会排除掉任何选举策略和任何近期目标,为拟定一个左派共同纲领交换了意见。这些俱乐部起初只是不牵涉私利的压力集团,后来却日益介入政治生活,成为一个起点,重新组合而形成相似于政党的集团。

在此期间,以《快报》周刊为喉舌的若望-穆兰俱乐部为1965年总统选举提出加斯东·德费尔为候选人。这位马赛市长深具务实精神,反对国家指导经济,主张“管理型社会主义”,人们期望他能够为反对戴高乐而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基督教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有这样广泛的支持,这位候选人原本可以迫使在总统选举中已经处境不利的法共依附于他。德费尔在纲领性小册子《新前景》中写道:“唯一促使共产党行动的办法,就是在它身边建立一个比它强大活跃的组织”。然而,事情办来不易,因为在SFIO内部,摩勒关于总统权力范围的看法同德费尔并不一样,而德费尔并不能迫使PSU和孟戴斯派接受他自己的观点;这两派都反对经由普选产生共和国总

统。虽然1965年3月格勒诺布尔市政选举中，俱乐部共同候选人于贝尔·杜德布当选，表明国民对于左派联合力量支持到什么程度，但是，由于人民共和党的反对，德费尔未能组成左派“大联合”，到了6月只好放弃参加竞选总统。相反，密特朗依靠共和机制公会，参加竞选反对戴高乐，指责他想“政变持续不断”；不过，密特朗竞选是以一个更加集中的左派的名义，这个左派还得到共产党的善意看待，并没有要求它以协商为先决条件。就这样，SFIO、激进社会党、共和机制公会和各俱乐部聚集起来，在1965年9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左派联合会(FGDS)，而且密特朗迫使戴高乐第一轮未能获得足够选票，举行了第二轮投票，密特朗获得已投票额的将近百分之四十五(1965年12月)

就是利用这一成就，密特朗力求使联合会成为现实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在野政府，为1967年3月第二轮立法选举与共产党商定了一个成效卓著的协议，1968年2月又与法共发表联合声明说明一致点和分歧点，而分歧主要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涉及共同市场和欧洲一体化过程。因此，看来左派是谨慎地走上了统一的道路，尽管同共产党一起讲民主的可信性仍然相当微弱。这一切还不意味着革新了政党旧结构，因而也不可能为1967年选举提出新人候选。尤其是CIR在选举中代表人数非常有限。密特朗也未能做到把PSU合并进来。在PSU内部，新总书记米歇尔·罗加尔同马勒和波珀朗对立，使新原则占了上风，根据这个原则，该党面对着仍然固守传统的左派，必须保持距离，奉行独立的政策。总之，各政党并不愿意放弃自主以利于一个真正联合会性质的、将由密特朗个人

主宰的组织。不仅如此,1968年5月事件对统一的趋势起了刹车作用,而随后举行的选举表明民主力量不乐意同共产党联合,共产党则指责密特朗意图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同共产党磋商,利用戴高乐派暂敛锋芒的局面,然而共产党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即将孤立。1968年5月标志着FGDS的死亡,密特朗也辞去了总书记一职。修改宪法失败,戴高乐于1969年4月辞职,社会主义左派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应付总统选举:一部分人追随摩勒,为自居中派的幻想所吸引;一部分人例如德费尔,试图重建1965年破了产的大联合;另一部分人把社会主义与民主俱乐部创始人萨瓦里当作看来不牵涉以往迭次失败的人物;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密特朗才是唯一最有代表性的候选人。结果是人所共知:第一轮,德费尔只得到百分之五选票;第二轮,共产党选民弃权,从而保证了最反动的右派重掌政权;蓬皮杜当选为总统。

这是不是说,民主左派的联合终于停止了呢?各派虽然互相猜忌,唯恐被吞并,走向统一的进程看来还是不可抗拒。1969年7月在伊西莱穆利诺举行代表大会,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党,在新党内部,SFIO同波珀朗领导的社会主义团体与俱乐部同盟(UGCB)和受萨瓦里鼓舞的振兴左派俱乐部同盟(UCRG)合并。萨瓦里当选为新团体的书记。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将逐渐消除以往的后遗症,使社会主义左派各家族重新和解,奠定一个统一战略的基础,使社会党得以作为强大力量去同共产党进行纲领谈判。最激烈的争论是在被新党搁置一边的民主机制公会内部。这场争论,尤其是在1970年12月絮伦代表大会上分为两派:一部分人

认为统一组织之前应该先统一行动，另一部分人以密特朗为首，希望尽可能广泛扩大联盟。1971年6月，由于接纳该公会，埃皮内代表大会巩固了社会主义左派的联合，选举密特朗为总书记。若干年来，密特朗已成为一切统一要求的核心，他事实上主张制定一个同共产党联合执政的纲领。在长期批判“老房子”的偏向和妥协——例如，雅各·芒德兰的出色小册子《社会主义，还是社会庸俗主义》(1969)中就进行了这种批判——之后，以埃皮内代表大会为标志的深刻混合使得有可能为了共同任务而团结种种分歧复杂的力量，例如原来的SFIO各分部的主席德费尔(罗纳河口省)、彼埃尔·莫罗瓦(诺尔省)等人，若干行政管理技术专家，彼埃尔·若克斯等人，还有主张以若望·彼埃尔·歇维纳芒推动组成的CERES(社会主义学习研究教育中心)为核心采取革命行动的人们。随着摩勒——有些人曾指责萨瓦里没有同他拉开足够的距离——自愿隐退，前SFIO这一次是确实确实寿终正寝了。

从此，共同纲领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党执政纲领应该简单明确地大致规定上台之后五年内实行的措施。这个纲领的制定引起了许多分歧，特别是在工人监督和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问题上，在国有化的范围和自治管理的定义问题上。终于在絮伦代表大会(1972年3月)上通过一个文件——这是一个各种倾向之间平衡的体系：国有化施及整个银行业和依赖国家订货为生的大工业、构成事实上垄断的大工业；认为自治管理是一个通过国家和劳动者在公有企业中达成协议、通过扩大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的办法来达到的目标；愿意采取一系列涉及教育、卫生和体育的措施来“改变生

活”；经双方同意可离婚；废除死刑；制定一种议员任期合同以排除恢复“第三种力量”；同时解散北约和华约，深化欧洲体制。在欧洲问题上，蓬皮杜试图离间社会党和共产党；下令就英国进入共同市场问题举行公民投票（1972年4月），对于这次投票，社会党主张弃权，共产党主张投反对票。尽管如此，左翼两大党还是进行了谈判，互相作出让步——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同意经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原则上承认“轮流执政”，社会党在欧洲共同体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之后，确定了一个共同文件，有效期为一届议会任期，于1972年6月27日草签，左翼激进社会党人也予副署。共同纲领的制定却未能做到团结一切非共产党左派。CFDT不愿意为了一个临时政治联盟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各极左团体、甚至PSU（它于1972年12月在图卢兹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一个以自治管理为基础的纲领，认为自治管理是“组织经济的基石”）都未能克服坚持不信任共产党而造成的敌对情绪。对于新的社会党来说，签订共同纲领不仅意味着与SFIO传统和方法最终决裂，放弃同右派或中派联盟，而且意味着抛弃那种在欧洲其他国家流行的、以工人阶级长入资本主义社会为存在依据的社会民主主义。如果说法国现在是社会主义似乎摆脱了瘫痪状态的唯一国家，那么这要归功于这个共同纲领。这个文件不仅是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基本文件，而且体现着千百万人意欲依靠它改变生活，不仅在国家机构方面，也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获致自由的希望。

1973年初拥有十万党员之众（其中半数是在埃皮内代表大会之后参加的）的社会党是一个蓬勃扩展中的党，其面貌已经

焕然一新；这不仅是因为知识分子、青年大量涌入，天主教团体纷纷参加（《新生活》、《基督教证词》），而且是因为党在企业中势力与日俱增。它的影响扩展到 SFIO 从来未能打入的那些地区。能够把思想意识、社会出身分歧复杂的人们，从极左分子一直到进步资产阶级，团结到一个组织里面，这是同密特朗这个人分不开的，因为他一向善于既唤起人们的希望，而又使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放心。在他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法国社会主义新道路，它在 1973 年 3 月选举中的胜利说明它是不可能迁就恢复原样的，社会党的选民当时大体上与共产党的选民社会地位相当（左派重新均衡），只要是提出共同纲领，社会党就获得进展。1974 年 4 月总统选举中密特朗得票很多，证实了社会党进展甚速；几个月后，罗卡尔和很大一部分统一社会党员也参加了社会党。在密特朗的思想中，目标是证明社会党在同共产党的竞赛中是能够超过共产党的。固然还有人持保留态度，而且由于同法共结盟，SFIO 的某些传统选民疏远了；但是，社会党内的争论现在已经不是赞成或反对左派联合，而是在于接受共同纲领作为既成事实，同时贬低其作用，仅仅把它当作选举跳板的人们，同坚决把它当作动员人民群众的的工具的人们之间（参照 P·吉多尼）。显然，在那些仅仅从选举和议会角度看待执政问题的人们和那些认为群众独立自主行动具有头等重要作用的人们之间，法国社会主义有生力量今后在于后者。

意大利社会党

无论称呼意大利政治制度为“两极分化的多党制”（G·加

利),还是“不完善的两党制”(G·萨尔托里),无论强调的是“支离化”,还是“两极化”,反正,意大利社会党自从1945年就只能是第二流的力量,更加摇摆不定;一种想法是上台参政,这就使它趋向于同基督教民主党进行某种合作;另一种想法是深化工人阶级的、革命的传统,这就使它希望或迟或早把共产党引入政府。不过,社会党也并没有被这两个比它强大的集团挤垮。挽救它的,是政治派系错综复杂,因而社会党对于意大利政治生活不可或缺,也使它左右逢源,有了必需的灵活性,从而避免了正面应付社会政治对抗性矛盾。

也象法国一样,意大利左翼人士曾抱希望,一旦扫除法西斯主义,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裂会得结束。事实上,意大利左翼的历史最近二十五年来却充满着危机和分歧,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正如南尼若干年前所说,总是“这个永恒的错误问题,五十年来我们一直拿头往这上面撞。”在这方面,重大的年份有1947年,这一年,发生了萨拉盖特的党(SPDI)和南尼的党(PSI)之间的分裂;1963年,这一年,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组织了一个革命倾向的社会党(PSIUP);1969年,这一年,PSI和PSDI短暂合并之后,由于有同共产党亲善的危险而再度分裂。

1943年8月,团结流亡归来者和抵抗运动战士而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SIUP)。这个党立即同意共签订了一个统一行动公约,相似于1934年缔结的公约。看来,当时许多社会党人估计短期内工人阶级两大组织即可合并,而且对社会党有利。然而,由于意共的组织功能,这种幻想并没有长久维持。尽管如此,1946年社会党佛罗伦萨代表大会

讨论党的组织方法时，还是共产党的榜样占优势；伐瓦瑞利提出的民主方案规定各少数派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规定由负责保证自由权利的Provirii^①对领导机构实行监督，但是，大会终于通过的是莱利奥·巴索的方案，它规定由党机关按照集中制掌握全权。但是，1947年1月罗马代表大会上，改革派和极限派之间对立复起；萨拉盖特从美国回来后得到相当多的集团的支持，其中有《社会主义倡议》、《社会批判》，它们都指责党的新领导人南尼供意共驱使。于是发生了“巴贝里尼宫”分裂，至今对意大利社会党的命运还有严重影响。

意大利社会党于1947年恢复旧称，并自诩为信守马克思主义原则，事实上以1955年为分界线，前后奉行的政策非常不同。

从1947到1955年，支配着这一阶段的是总书记罗多福·摩兰迪的坚强个性。他的权威长久无可争议。党的组织发展遵照列宁主义模式，按照民主集中制学说，组织方面的宗旨是防止前不久还危害甚大的宗派再产生；尽最大可能排斥“领导总委员会”这种形式，而是要求集中化单一领导，结果是发展了新的一批干部，他们忠心耿耿，颇具才干，但自由讨论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党还希望能够依靠“企业社会主义核心”（NAS），这种基层组织应该能够使党更深扎根于工人之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称为“社会党的葛兰西”的摩兰迪主张极左翼两大党几乎绝对一致，因而也主张遵守与共产党签订的统

^① 意大利语：仲裁员。——译者

—行动公约。这种立场使社会党不能保持中立，不久也就把它拖入了苏联集团；1949年佛罗伦萨代表大会正式谴责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以及北大西洋公约（被它比作神圣同盟）；甚至铁托分裂主义在它看来也不可饶恕。要击退反动势力、夺取政权，舍人民阵线，别无他途可循。

然而，早在1953年就有了一种演变，摩兰迪在1955年逝世，许多人对他有了疑问。在对待意共方面，出现了一种“独立自主”趋势，助长这一趋势的是基督教民主党内由总书记从1954年以来采取的态度：总书记范范尼主张“向左开放”和通过一种新的“结构改革”来使工人群众长入当时的意大利政治社会。被称作都灵“转折”（svolta）的，是南尼表示的这样的意愿：一方面仍然维持同意共的统一政策（他说，这是“不可割让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谋求“另外一种可能”：去向基督教民主党靠拢，以求组成一个新的执政多数。鉴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政权的揭露，然后是匈牙利事件，意大利社会党在1977年威尼斯代表大会上迈进了一步，在这次大会上社会党人受到未来的约翰十三教皇——隆卡利红衣主教的礼节性欢迎。1958年出版了当时与南尼的主张非常接近的巴索所著、供广大公众阅读的一本著作，正式为“另外一种民主途径”辩护。从此，党的迭次声明都强调，不接受自由观念，任何社会主义出路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要纠正政权的走向，使之朝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前进，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政权——用南尼喜欢讲的话来说，就是“跻入掀钮表决策的大厅”。从此有了可能考虑同萨拉盖特那一派恢复统一，以及接受一种能够促成某些必要

改革的议会民主制度。与此同时，党着手寻求一种新型的组织方式；1959年那波利代表大会上，南尼正式谴责民主集中制。但是，十分明显，这样的一种方针——何况在意大利总工会(CGIL)内部还有极大的争论——必然引起摩兰迪认为已经消灭了的派系斗争再起，不仅在议会，即使在中央委员会都会如此。同年，不久以后，摩兰迪的最干练部下之一拉涅罗·潘齐耶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官方组织，提出“工人监督”论调，顺应了《红色手册》内部发展起来的左派潮流。关于中左政策的内里含意，南尼和里卡多·隆巴第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南尼认为，中左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而隆巴第认为，社会党人参加一个稳健政府，就可以促成某些显著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构改革，但他认为，假若不能迅速改变力量对比，那就应该放弃中左联盟。1963年，中左政策形成时，隆巴第竭尽全力要挫败它（1963年6月圣葛雷哥里奥之夜）；当终于组成莫罗政府而南尼当上副总理的时候，社会党左翼一部分人拒绝投票赞成授权（1963年12月）并于次月另组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SIUP)。新党领袖巴索长期以来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阵地，同摩兰迪的信徒们并肩战斗，反对他所谓的左派妥协；他认为，社会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抱着离奇的幻想，其实这个社会里敌对利益的两极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剧烈；他强调资本主义各种根本性质持续不变：利润法则、积累机制、垄断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不应该谋求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从属力量”，而要成为“代替它的”可怕力量。这次分裂虽然没有对社会党成为灾难，可是去掉了党员的百分之二十，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抽走了最积极进取的干部（韦

基耶蒂,福阿,巴索)。

这一分裂驱使社会党更加右倾,至少推进了长期盘算的与意大利社会民主党(PSDI)的合并。PSDI诞生于巴贝里尼官分裂;这一分裂,于次年由于1948年社会党损失惨重的选举而形成,一个由I·M·隆巴多领导的新派,小说家伊尼亚齐奥·西洛内等等名流参加进去而使这一派声势更壮。PSDI是在1952年1月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上确定地建立组织的。该党同意参加基督教民主党历届政府,但由于选举势力甚弱(至多只得百分之五选票),并不能直接影响总的政策;不过,它至少有助于基督教民主党内某些派系同右派拉开距离。这是一个高级职员和名流的党,对于工人群众从来没有号召力,它的党章给予各省分部以极大的自主权;它内部也数次分裂(1953年科迪尼奥拉和卡拉曼德雷;1959年马泰奥蒂);但由于它根本上反共的立场以及把欧洲统一神秘化的做法(对萨拉盖特来说,这还不仅仅是个政治选择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文明的问题),它在中等资产阶级中仍有相当数目的忠实信徒。萨拉盖特个人威望颇高,因而得以在1964年12月出掌最高司法权,任内他作为国家权威和公民自由之间的调解者(参照J·诺贝库尔),企图推倒传统的壁垒,使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在自由主义中合作。意大利社会主义两大派的恢复统一,南尼和萨拉盖特1956年举行的会谈第一次加以讨论,而社会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社会党又参加了中左政府,因而促进了统一,于是在1966年10月两党就举行了一次联合大会,PSI占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二,PSDI占三分之一,宣告统一社会党(PSU)成立。不久以后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

入党；这些知识分子希望建立一个英国工党式的大党，认为这是现代议会民主良好运转的前提。

他们很快就失望了。新的统一充满着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从来不起别的作用，无非是机构垒床架屋而已；各级机构都必须均等成双。在新党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各种派系，同过去的分歧对立犬牙交错。在极左翼是萨拉盖特领导的“社会主义灾祸”派，它正式谴责同基督教民主党的任何合作，认为中左尝试，在范范尼的时代虽可接受，在其继任者时代已经无可助益。左翼是这样的一些人士，例如弗朗切斯科·德·马蒂诺、安东尼奥·乔利蒂；他们并不一贯反对中左尝试，但希望强迫基督教民主党接受较为革新意味的政策，尤其是在制定纲领以促进一项收入政策方面；他们谴责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他们还提出离婚问题；社会党议员洛里斯·福尔图纳在议会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主张允许离婚。右翼仍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坚持“社会党独立自主”，例如南尼，或者绝对不愿听到什么向共产党开放之类的说法，例如原萨拉盖特派（“社会主义革新”派）。大体上，对立的是两种人；一种人认为改革政策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有可能，让意共参加政府一级的行动是不可避免；另一种人，例如议员奥尔兰迪，断言“共产党称霸并不能带来社会新秩序，只会产生不同的一种政权，任何其他政治力量以及自由在其中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前PSDI的代表之一马里奥·塔纳西甚至这样说：“我们是党内的黑奴，我们的肤色不一样。”1968年5月立法选举尽管有许多选票转到左翼，对这个新党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就加速了新的分裂，虽然南尼一再企图妥协，社会党国际也于

1969年7月进行干预。于是,前社会民主党恢复了自由,谴责社会党又向共产党秋波频传。

这再一次分裂之后,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呈现出怎样一种总的形势呢?右翼是PSU,1971年2月又恢复了PSDI名称,它仍然对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有号召力;它可以自夸拥有二十万党员,即使在罗马也有不容忽视的势力,但是要吸引自由派的选票,它必须越来越具改革精神。它的对立面PSI则相反,肯定了自己作为左翼政党的天职;总书记先是马蒂诺,后为季亚科莫·曼契尼,都证明确为联合组阁中的可畏的谈判对手,而曼契尼在1971年甚至促使议会表决通过了“实现进一步平衡”的主张,也就是说,希望看见共产党参加政府。作为一个群众党,它可以依靠五十万党员,它的选民主要在城市,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但已经逐步向南方扩展,尤其是在手工业者和职员中间。至于PSIUP,它的发展很迅速,既然已有二十万左右党员,其中城乡无产者占很大的比重;党内设立了一个群众工作部,任务是联系劳动群众;在总书记韦基耶蒂看来,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推行工人阶级所希望的政策。

这个党,有些人把它的位置定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也有些人认为它位于共产党的左边;其实它始终是四分五裂的,一部分党员是卡斯特罗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泛工会主义者,而巴索则号召寻求一条走向革命的“大陆道路”。他写道:“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够设想为议会道路,也不能够设想为苏联势力范围扩张,更不能够设想为十五世纪的起义,只能设想为一个毫不停顿进行斗争的持续不断的过程,狠狠打击社会结构、社会不平衡和权力对比关系。”

因此,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历经 1947、1963 和 1969 年接二连三的分裂,到了七十年代初呈现的面貌还是各自为政、派系林立。就这样,它们象其他政治潮流一样,承受着意大利各党各派共同的不堪信任、威信扫地的命运;党的组织机构瘫痪,没有出类拔萃的领袖,嗜好嘴皮子上的妥协,官僚机构臃肿庞大,执政党联盟内部缺乏互相信任。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派系多样、不一而足,在那个选民也极其分歧复杂的国家,社会主义各派才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有其影响。如果说派系的存在增长了各党内部的纷争,它却毫无疑问地减少了各党之间的斗争。每一政党内部都有极端派别,互相之间相去遥远,却与邻近的他党甚是接近,这就起了中介的作用,不仅方便了选举时选票来回转移,而且便利了政治协议的缔结(参照G·比贝斯)。例如,隆巴第的党羽们使得社会党得以同PSIUP和意共保持密切联系,既然在共产党内他们与阿门多拉所代表的派系和谐无间,相反,南尼派则使社会党被PSDI和基督教民主党认为可以接受。而在基督教民主党里面又存在着与工会组织(如意大利天主教劳动协会ACLI)相联系的几种左派,从而使得这个党也可以同社会党合作,无论是新力量派(卡尔洛·多纳特—卡蒂纳),它力求扩大劳动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还是主张专家治国的“基础”派(奇里亚科·德·米塔),还是“新左翼”派(佛罗伦蒂诺·苏洛),它接受经济学家帕斯夸莱·萨拉切诺Pasquale Saraceno的计划主义观念,都起这种作用。这些派系在基督教民主党内占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它们对于当代天主教世界普遍掀起的改革运动非常敏感,作出种种尝试,试图重新团聚基督教左派和

非教会左派,例如,利维奥·拉博尔在“政治文化协会”内依据梵蒂冈第二确定的“和解共事”的精神作出的尝试,以后他组织了“劳动者政治运动”(MPL),这个团体的领导有天主教徒,也有社会主义者。由此可见,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并不是死抱住预定的态度不变的,但他们也在各种类型的联盟和联系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他们属于政府时,是政府中的反对派,能够迫使政府作出假如自愿就不会作出的激进抉择;对于极左翼的共产党,他们是反对的,但并不因而就不同共产党紧密合作,在这里或那里组成当地多数派。也不能忽视他们的精神影响,这又是同行动党相一致的,这个党虽然在1947年解散了,但它源于《公正与自由》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仍然存在,特别是表现在诺尔贝托·博比奥在《文化与政治》上进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论战中。社会主义思想得以更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若干俱乐部,例如米兰的屠拉蒂俱乐部,其会员是共和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之后,社会主义者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例如保罗·西洛斯拉比尼),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布鲁诺·齐韦)或农艺方面(曼利奥·罗西-多里亚),而且在管理国营大企业方面(围绕着恩里科·马泰伊)和革新官僚机构方面(围绕着计划部长安东尼奥·乔利蒂)。

“中左”,是不是一种未来的出路呢?在基督教民主党内以范范尼(他以前是积极推行中左联合的,现在却反对同共产党的任何合作)为首的保守分子态度转趋强硬,在1969年“火热的秋天”事件之后意大利社会党向工人阶级重新靠拢,这些都意味着这一联盟已经动摇;乔万尼·雷奥内1971年12月依靠

右派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社会党退出了政府；1972年5月提前选举中，社会党相对停滞，新法西斯党却大有进展，安德烈奥蒂政府依靠中右，把社会党员和基督教民主党左派人士排挤出政府。但是，在热那亚代表大会（1972年11月）上宣布自己为“左翼阶级党，历史环境赋予它以潜在的执政责任”的意大利社会党，是不是会长期听任自己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放弃为反对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成为威胁的两极分化而斗争？非共产党左派力量面临着的选择是，或者支持在朝派基督教民主党，或者支持在野派共产党，但无论哪一种选择，这个左派今后只能起从属的作用。

三、民主社会主义总结

民主社会主义内部的分裂

从上面的探讨中，显然应该得出结论：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体系。阿兰·萨瓦里写道，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必须是民主的，这个“民主的”是用其基本词义，即，“作为通例，一概排除使用暴力，相反，必须服从选举制、多党制民主的根本规则”。如果说在这一点上还可以取得一致的话，那么肯定无疑的是，只愿意做改革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否定现存秩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则远远没有填平。社会民主主义仍然自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演变了的形式”，而资本主义利益它是能够为工人阶级的最大福利加以管理的，既然市场经济已经遏制危机的爆发，专家政治家的开明权威已经代替自私的旧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相反，在

社会主义看来,生产机器仍然在少数人手里,经济日益技术性的最新发展与为一己私利瘫痪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工人被剥夺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而由于经济的这种发展他们本来是应该更加有权利享受的。区别革命和改革的,并不是“要就全有、要就全无”政策,而是改革含义本身;社会主义改革是“决定事物应该怎样的改革,不是承认事物能够怎样的改革,而是为了一种必须通过斗争来建设的合理性而否定现存制度的合理性的改革”(参照C·雅纳尔)。没有哪一个国家,这个由于社会主义屡受挫折而严重化、受到毒化的争执是熄灭了的,相反,1968年的事态发展使争执再度炽烈,既然那种事态发展以激烈的方式提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否迫在眉睫的问题,从或多或少长远观点来看,不可能加以回避的问题。

老实说,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最近几年中逃脱了“新左派”各种班子使之恢复青春的努力,相反,197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气喘吁吁的迹象、资产阶级政治的日益解体,使得他们更加振振有词。无论他们中间表现出怎样有时互相对立的方向,无论他们是愿意在现存政党内部积极努力,还是谋求同更加革命的政党结盟,还是宁愿采取纯工会的行动(例如法国的CFDT),他们都否定社会民主党用以故步自封的合法拜物教和严格限于改革的做法。在这方面,怎能不提到英国《论坛》派的影响呢?这一派继承比万主义,1974年选举以来在工党左派青年议员中已经深入人心。在德国,Jusos集团内部论战再起,德特莱夫·阿尔贝斯和约翰·施特拉塞促使争论深入开展,探讨社会民主党有多大可能利

用国家机器和依靠议会多数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取得突破，左派还是在该党党内触发了一场“身份”危机，促使该党重新考虑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奥地利党的左派领袖兴德尔斯在1975年选举时，要求党放弃“社会伙伴”论调，认为这只能巩固资本家特权，而损害劳动者。在荷兰，“新左派”已经使荷兰社会党分裂。法国社会党内，CERES的贡献尤为显著；这一派揭发出斯大林主义与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狼狈为奸的关系，从而证明了左翼两大党联合起来，终将不得不互相改造。

对于这种种新启示，各社会党参谋部的答复迥然有异。无论我们可以根据它们各自所属的政治文化传统而确定有多少种变异，仍可指出，在社会党国际内部出现了一个北欧—日耳曼分裂派，它尤其表现为以《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为题，公开发表帕尔梅、勃兰特和克赖斯基三人1972年至1975年的长期往来书信。这三位党魁主张健全管理资本主义，主张奉行一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主张实行现代专家政治来搁置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他们的根本立场仍然是反共。冷战爆发以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延续了斯大林方式，从而反共势力继续活跃；他们认为，正是斯大林方式的延续使得他们各自的国家有理由对不同意效忠于美国政策的人们进行“搜捕女巫”式的迫害。在各拉丁大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演变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些党面对着对工人阶级有极大吸引力的强大的共产党。当然，冷战也有其影响，但是，任何行动，若不与共产党结成联盟——那怕是策略性临时的联盟——看来是不可能的。自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同苏联拉开距离，走上多中心道

路以来，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可能遏制进步力量的进展。意大利的社会党长期被束缚在中左政府上，在七十年代初没有作出靠拢的姿态，然而，法国的社会党则已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执政前景决裂，与共产党缔结执政共同纲领，结成了左派同盟。

民主社会主义的贡献

现在可以确定民主社会主义对于当代政治思考的贡献了。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可以在许多著作中看到。促成这些著作的广大公众，尤其是围绕着1968年危机，目睹社会封锁、不公正、不安全、思想混乱和世事颠倒错乱，越来越胆战心惊。当代政治思考来源于俱乐部、工会、政党所设立的工作组的主动，这个广阔的创造运动一旦接触到共产党人士同时作出的贡献，就有了确定不移的表述方式。

这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新工人阶级”的所行所为，在有些人看来，这个新阶级命定要溶入拉平了的中产阶级，就象美国那样，但另有一些人认为，这个阶级尽管会在行为上和思想意识上发生变化，却将继续保持它特有的社会面貌。是塞尔热·马勒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剖析了技术发展是怎样产生这个新的工人阶级的，这个新阶级极为敏锐地接受效率观念，但与马尔库塞断言的相反，他们成了革命派。这一分析在社会学方面得到阿兰·屠兰在1968年5月、尤其是6月事件之后进行的调查的证实。马勒写道：“假如革命意识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愿：不管使用什么手段，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首先夺取政权，只在以后的一个阶段才以新的方式去组织社会，那么，无可争议，新工人阶级并不是革命的……然而，假如革

—— — —

命的意思是根本改变现存关系的要求,那么,新工人阶级活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使它成为首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先锋队。”正是因为新工人阶级位于资本主义组织的极其复杂的机制的中心,在马勒看来,它就必然比其他阶级更快地认识到此制度固有的矛盾,因而它的行动倾向于从根本上说不仅否定资本主义,而且否定指导经济的一切专家政治的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工人阶级规定的目标和战略是什么呢?这正是安德烈·戈尔兹根据许多意大利工会领袖的证词和布鲁诺·特朗廷的分析,在一篇分析建立“艰难社会主义”的条件文章中试图回答的。在先进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不会从反贫困起义中自动冒出来,既然贫困在那些国家只是作为沉积而继续存在,所提出的生活要求只是资本主义未能消化掉的。但绝不是把革命推至遥远的未来,而是应该设想为一种不断变革的过程。当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是不会发生的,也免不了要同资产阶级较量,但是,社会主义战略必须是渐进的,还必须渐进地创造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可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并不必然统统是改良主义的;只要这种斗争提出的目标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否定生产具有目的性,这种斗争就是革命的。至于社会主义,要满足其要求根本不能通过夺取物质资料,它应该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一种新的优先次序,一种新的生活与文化模式”,其中考虑的是劳动关系(使劳动者恢复行使知识技能和行使责任)、劳动的目的性(生产一个人性世界)、建立一种新形式的文明(消灭浪费)。戈尔兹写道:“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应该要求永远有权持续不

断地决定劳动关系的一切方面,决定报酬标准,从而使得生产过程的任何改变都必须同工人运动协商,使工人运动能够对企业管理政策施加重大影响并引导这一政策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经由这一途径,民主社会主义也就必然提出了自治管理的问题,基本上将自治管理设想为消除异化的良方,设想为使劳动者有可能恢复与自身的协调、重新主宰自己、重新享有生之乐趣的办法。在这种前景下,自治管理不再表现为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表现为社会主义在前进中;自治管理不是任何一种重叠于专断传统之上的权利要求之表现,而是与被压迫者古老梦想相吻合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称谓,使得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以及在闲暇活动中旺盛发展。自治管理将不是被赐予的,而是由劳动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人的尝试和自己获得成就的尝试而强迫实行的。自治管理从根本上有别于阶级合作的工具——共同管理。自治管理并不表现为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全社会性质的政策。关于自治管理的思考,产生于否定依然存在对劳动者剥削和劳动者异化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体系,受到最近几十年来南斯拉夫进行的试验和捷克人奥塔·希克在“布拉格之春”中所作分析的影响,它在1970年前后在法国成了PSU(米歇尔·罗加尔)、CFDT内的社会主义者(丹尼尔·肖韦)以及新社会党内的某些集团(例如CER-ES)的共同立场,虽然长期遭到不仅共产党、还有许多认为它不现实的社会主义者“专家政治家”的置疑。尽管如此,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建立自治管理,同没收财产归集体所有、同计划化结合起来,就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要素之一。

民主社会主义在六十年代对现世界批判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反对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的集中主义；同时也意欲提倡一种“地方主义革命”。固然，各国社会党曾经长期抵御民族主义诱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例如，在已经背弃詹姆斯·康诺利遗训的爱尔兰工党内，象康诺尔·克鲁斯·奥勃里安那样的名人，原来是反对爱尔兰分治的，后来却投入了反对盖尔民族语言^①的宣传运动，强调英国在爱尔兰留驻的积极意义，终于归向新联邦思想，出于对IRA的憎恨，暂时放弃了统一爱尔兰的主张。但是，鉴于欧洲某些地区不断发生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冲突，各国社会党虽然过去持“雅各宾主义”态度，现在却不能不希望维护并明确制定一种“联邦主义”方针，促使各敌对居民集团较为和谐地发展。尤其是在比利时，华隆^②的社会党，在安德烈·勒纳尔的带领下，在1961年采取反对“单一法”，认为它威胁着物价和工资间平衡；为反对佛莱明^③霸权，它主张华隆族有权自决并选择自己的社会经济扩展道路；由这个党产生出华隆人民运动，而这个运动正是主张辅以深刻结构改革的联邦制的。尽管比利时社会党迟疑不决，未能彻底走上这条道路，它在几次代表大会上还是采取了主张改革宪法，从中取消单一体制机构的立场。即使在法国，社会党根据罗伯·拉封和彼埃尔·傅惹罗拉斯的分析，承认各个地区的经济动荡应该从殖民主义型的局势的角度来考虑，

① 盖尔语是凯尔特语的一支，泛指爱尔兰流行的各种地方方言。——译者

② 华隆族是比利时的两大民族之一，说法语。——译者

③ 佛莱明族是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也是其主要民族。佛莱明族分布在比、法、荷三国，说荷兰语。——译者

因而必须进行远远超出行政管理非集中化的改革。地方主义，以前是怀旧反动的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特别是布列塔尼^①教师爱弥儿·马松强调其某些先锋作用，今天则被肯定为一种进步观念，它孕育着地方不发达状态从受剥削和异化中得到解放。由于种族差异经常与地区动荡相一致，种族的文化要求又立足于日益觉悟的经济上非殖民化的愿望，各种族自身就成了一种发展动力；布列塔尼、欧萨迪、俄克地区^②在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中所起重要作用，不亚于农民暴乱和工人战斗，它们成了这两种斗争的一个方面。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意欲达到的目的，确实是全盘修正现在这种类型的社会。它的雄心在于：通过改造劳动条件，改造职业培训，改造闲暇时间的利用，通过终于使劳动者得以监督管理，来改变总的生产条件。民主社会主义打算使用减少资本家利润的办法来改善人的卫生健康状况、人的生活环境、人的教育文化，从而粉碎大资本权力，粉碎今日将劳动者日常生活桎梏于狭隘范围之内而且唯一见容于特权资本主义的种种僵化和种种屈从（据密特朗）。1789年的革命造就了推翻专制主义暴政的国家中的自由公民，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造就在一种经济民主范围内的负责任的公民。

民主社会主义提示的政治方向所涉极广，这就不容规避

① 布列塔尼在法国西北角，与英国隔海相望。布列塔尼族原为凯尔特人，早已成为法兰西民族一要素。——译者

② 俄克地区：今指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译者

归根结底它的最后成功所系的这一重大问题：劳动者当真希望那种作为任何社会再生的前提条件的自由么？瑞士党的女活动家若望娜·埃尔希 1956 年问道：“人愿意自由吗？人确实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者吗？或者，人只是在窥伺，一有机会，就要自暴自弃委身于一个主子的掌握，一个主子阶级的统治，一种作为教条强加于他、从而使他得以获致确信和牢狱的安宁的学说的控制？”不容置疑，假如民主社会主义以“福利国家”的名义，为了满足安全和平等愿望，使自己成为某种充斥一切的工会主义，那就有可能迅速沉没于行会主义而使整个体系僵化。民主社会主义要求既在经济方面、也在政治方面进行竞争。它要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财富分配问题，不如说是自由问题。然而，R·H·S·克罗斯曼在《新费边试验》中写道：“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的最后目标，不在于追求幸福，而在于扩大自由”，他这就是促使社会主义走上一条很难说它已经胜利走完的道路。

（译自雅各·德罗兹主编《社会主义通史》第四卷
第七章，法国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社会民主主义

卡尔·兰杜埃 著
帅 扬 译

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及其信条的基本原理

1891年,德国社会党改变了名称,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工党”改为“社会民主党”。虽然这次更改名称,一部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仍标志着一个超出德国范围的进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由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严厉镇压,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了一大段空白。当时,在社会主义运动曾蓬勃开展的几乎所有国家,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在经受这场生死考验。这些派别之间只有松弛的组织联系,甚至毫无联系。大家都在探索一种共同的思想体系,却又因对社会主义万应良方各有信奉、互相对立而障碍重重。经过这个遭受严厉镇压的时期,虽然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在理论问题上没有取得完全一致,在一些国家,主要是法国,甚至在组织上也未团结起来,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缩小了,遗留下来的分歧也大部分被普遍接受的基本准则所掩盖。尽管后来分歧又公开化,但是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各派之间还是相当团

结,足以保证协调一致的、总的来说很有成效的行动。在这中间有助于相互协调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国际论坛,即八十年代末成立的第二国际。这时各国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已较前统一;第二国际既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比起它的前身,即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国际工人协会亦即第一国际,在组织上就更加稳定了。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新鲜,早在第一国际时期,甚至还可能在此以前,就已经开始融合在一起了。正是在这个融合过程基本上结束以后,并且随着党员人数和选票的增加,组织力量的壮大,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个有自己哲学的工人政党建立起来了。这个党有足够的力量在议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形势也越来越促使它去适应有关的要求,以发挥这种作用。^①

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显然这个运动是民主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它继承了前者关于普选权、被统治者管理政府和保障公民自由权等的要求;从后者继承了生产工具社会化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思想的

^① 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不比社会民主主义信念中的各项要素出现得早。1849年春天在法国,一个叫做山岳党的政党(模仿古典雅典各派主义而得名)与一年前的敌人社会主义者和解,结果组成的党(其社会组成仍然是中产阶级分子多于劳动人民)叫做社会民主党。

在德国,爱森纳赫派自称“社会民主工党”。该派是1875年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两派之一;另一派即拉萨尔派的报纸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镇压时期,该报在国外印刷,秘密运进德国)也采用了这个名称。尽管已有这些前例,但德国社会党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后,立即在党的名称中加上了“民主”一词,这件事仍然具有代表性意义。

理解接近圣西门学派,而不是欧文或傅立叶的想法,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倾向于采取切实的措施,集中管理资源,而不主张实行“社团主义”。他们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联合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完全民主的未来社会的力量。这是继承了卡尔·马克思和斐迪南·拉萨尔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人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只有达到经济平等,起码要十分接近平等,民主才能彻底实现;而只有当有组织的社会支配了生产工具,才可能达到经济平等。另一方面,既然社会民主党人把平等看作根本的社会准则,所以,如果把平等限制在经济领域,并且把政治权力完全给予或优先给予任何个人或集团,那看来就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既然他们认为搞阶级斗争是正当的,所以当有的工人不同意他们的信条,并且采取了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是违背工人阶级团结义务的行动(例如加入某个公司的工会),以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的时候,他们有时就不免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于是加以对付。不过,社会民主党人总是解释说,工人的这类行动是对不完善的现存阶级社会的退让,而他们则要尽量控制这类事情的发生。他们决不认为,因为当代社会是邪恶的渊藪,所以只要邪恶的事物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所用,就成了合理的东西。与此恰恰相反,甚至在当代政治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也主张道德纯正主义,并且自认为是人道主义的拥护者,致力于废除死刑、改革教育、解放妇女,特别是反对战争。这样,在科学的怀疑主义已经瓦解了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时代,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了一支道德力量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人道主义与他们从激进民主主义那里继承来的对革命的信仰水火不相容。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始终没有注意到这个矛盾，因而他们的革命信条不仅由于受到加强进化倾向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减弱（这一点后面还要说明），而且连那些一直信仰革命的人有时也加以和缓的解释。例如，他们认为革命不一定要理解为“拿起干草叉搞暴动”。可是，至少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群众是不折不扣地这样来理解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在其联合劳工运动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成为一个阶级政党，而且坚信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工会必须以团结，以“一损俱伤”的思想以及以组织起来是实行这一原则的唯一手段作为基础。分裂，即“建立双重工会的主张”，不管有什么理由，都被视为弥天大罪，这是工会的传统。因为分裂对统一行动有害，而统一行动是一个有组织的阶级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社会民主党既然视加强工会为己任，政治上为之服务，思想上给予支持，所以它也象工会那样高度重视党内在组织上的一致，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然而，思想和纲领对于一个政党比对于工会更重要，因为工会首先是完成实际任务的工具。有些想法可能有助于党的团结，却不能为某些党员问心无愧地接受，如果一个政党要求它的党员赞成这些想法而不置一词，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呢？组织上的一致受到这样高度重视，实为社会民主主义以前的运动所未有。以一致为重的思想常常与左、右两派坚持己见的愿望相抵触，这不断引起运动中工人阶级多数派和知识分子少数派之间的摩擦；前者是由工会的传统培育起来的；后者

则首先忠于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并不以组织起来本身为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英国以外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各派没有广泛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可能结合起来成为相当统一的运动。马克思不仅提供或传播了社会民主主义信条中的许多思想原理，而且已经把其中一些原理熔铸成一个整体。特别是马克思比其他理论家更坚决地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维护和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使这个阶级强大起来以完成上述历史使命。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矛盾也要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去，那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既信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又相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而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逻辑，阶级斗争就应该是残酷的斗争，无论民主主义的准则还是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都不能对它加以限制。马克思不仅没有把这个关于阶级斗争的辩证概念的推论解释清楚，而且他的一些提法似乎还排除了辩证的解释。例如，在他的1872年的一篇演说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宣称没有官僚主义传统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也许可以在现有的民主政体下向社会主义过渡。

社会民主主义从马克思的思想那里接过来的另一个矛盾是决定论和能动主义之间的矛盾。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探索道

德上最理想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则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宣称自己不相信“超阶级”的道德，尽管他的这一观点是否坚定不移，以一贯之，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应该探索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并认为这种探索能够成功，因为工业技术可以通过计算预测社会形态的发展，而这样一些计算的结果将确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然而，要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出现，想办法促其实现，甚至为此作出牺牲，有什么意义呢？尽管马克思本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费了许多心机，仍没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

不过马克思的决定论毕竟使社会民主党人便便当地免于具体描绘那个未来社会，否则他们的描绘一定会备受抨击，虽然这些抨击有的可能直截了当，有的可能拐弯抹角。若说历史自会解决这些问题，依据这个论点，那是比较保险的。可是这一来，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就出现了分歧：一方面要求立即实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一套历史哲学，说未来社会所遵循的是几条非常笼统的原则，而这两者却无法沟通，也就是完全没有说明当前采取的行动怎样靠革命的或发展的手段改变现行制度，才能使之符合那些原则。当时，改革现存社会的政治活动蓬蓬勃勃，而对未来社会的信仰虽然还能产生希望，但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甚至领导人的思想中，已日趋淡薄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机似乎成熟了，社会民主党却感到自己无所遵循。那时已和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感到不能从自己的信条中获得指引，所以只好进行一场人类生活和命运的长期试验，而且至今尚未结束。

一般来说，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只吸收马克思的思想中适合其政治策略的部分，而置其余部分于不显著的地位。例如，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把它列为社会民主党举办的多种训练班的教学内容，但侧重点却与马克思的原著有所出入。马克思曾经把人类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一基本命题作为他分析因果关系的第一步，这种分析是否正确应不以道德标准为转移；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对马克思的著作中仅仅暗含的道德观详加论述，而且把它摆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中心位置上。他们从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一论点引伸出这样的基本原理：无论资本和土地在生产中起了什么作用，工人都应当获得产品的全部价值。

马克思传给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多思想当然也是以前各历史阶段的遗产。例如，马克思本人就深受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接受雅各宾思想的媒介之一。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还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人文主义哲学家的门徒，是他们的思想的传播者。这些哲学家中，甚至最坚决的现世主义者也受到强调人的价值的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强烈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接过这个传统的学说之一，尽管马克思和他的门徒总是表白他们信奉“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了最显著的影响，但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简直无处不在，尽管有时不是那么直接的。甚至在英国，在工党已经终于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化身的情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不是仅限于自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堡垒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这个较为狭小的范

圈内。在更早的时候，宪章主义者与马克思交往，特别是与恩格斯交往，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同样，英国最主要的工联主义者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合作，无疑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费边社的一些领导人虽然对马克思基本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在制订纲领之前，也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在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通过许多中间人传给各个社会党的，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人朋友，如保尔·拉法格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乃至自称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分子，如贝努瓦·马隆、菲利浦·屠拉梯和让·饶勒斯。

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除了源出于或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部分，还有很多另有出处。不过在这一方面有时要提到的拉萨尔主义，主要是传播马克思思想的途径，而不是一派有影响的独立思想。尽管拉萨尔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辱骂，但至少他本人从主要方面看来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评价，是他们的门徒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拉萨尔的门徒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有较为独立的影响。他也许是当时德国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同时对形成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策略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大的贡献，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件工作都毫无兴趣，关于它也无可教诲。冯·施韦泽十分注意进步立法的具体细节，以及通过议会联合在进步立法方面取得最大成果的斗

争艺术，这对于后来社会民主党特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来自英国。如果没有工会在党内曾起过的作用，就不能想象社会民主主义终于得以形成，而现代工会主义传统的发祥地正是英国。虽然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都各有其现代工会主义的根源，但是只有在英国的“新型”工会从宪章运动的失败中脱颖而出，其特性和成就传遍欧洲之后，欧洲的工会才开始上升为一支社会力量。

更有意思的是合作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也基本上起源于英国，因为罗伯特·欧文首先大力促进了它的发展。法国和德国的保守主义者（B·J·B·毕舍、维克多·埃梅·胡贝尔、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弗埃森）和自由主义者（赫尔曼·舒尔采—德里奇）在十九世纪中叶接受了这一思想。虽然拉萨尔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仍未能避免生产合作社走上绝路，但他的影响却可能有助于使德国工人对消费合作社的思想有心理准备，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德国劳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考虑到国家的大小和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强弱，合作社运动可能在比利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国家，英国的影响与蒲鲁东的mutuellisme〔经济互助〕传统相结合，成为工人阶级行动的准则。正是英国的消费者自助传统与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比利时工人阶级成了无产阶级“亚文化群”的典型，这个问题将在稍后加以论述。

法国大革命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一部分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媒介，一部分则没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集爱国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于一体的雅各宾主义，是自行发挥其影响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当然不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总结，但他和恩格斯的这个提法表明，他远非雅各宾派的精神继承者那样笃信国家的价值的人。社会民主主义者象十九世纪的所有人民主权论者一样，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拉萨尔与马克思的主要区别在于他比马克思更赞成民族国家；巴黎公社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它的雅各宾精神（按照无产阶级的说法）。不过，即使没有拉萨尔和巴黎公社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中大概也不可避免地埋藏着对民族的强烈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使它不能暴露出来。及至1914年，这种信仰乃破土而出。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能找到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残余，而这在社会民主主义中已经荡然无存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组成部分几乎丧失殆尽的原因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布朗基主义的观点是，少数职业革命家将摧毁现存制度，夺取政权，并且只有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之后，才通过有了觉悟的选民的投票，使新政权合法化。马克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这个观点的影响，这里不宜作出定论。在他自己的思想里，有一种信念是与这个观点相抵触的，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①即意味着要有一个工人的群众运动。然而《共产党宣言》仍然为革命的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留有余地。因为《宣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译者

说,虽然这些杰出人物“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①,但又说,他们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将来,所以他们为了确保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将来,可以不以当前大多数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采取行动。尽管恩格斯在1895年曾亲笔写道:“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②,但正如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和革命工团主义者对“积极的少数人”的迷信所表明,杰出人物统治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这一理论只存在于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中间,而没有被核心人物所接受。

左右两派的斗争

一个运动的思想体系,即使不是一致的也可以发挥作用。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是各种原理的混合物,尽管内部有矛盾,却还是行得通的,只是摇摆不定罢了。革命的辩证法和进化的民主主义哲学之间的冲突无休无止,并且不断威胁着这个运动的组织上的统一。内部对峙的双方总是一左一右地把运动拉向不同的方向,而外部条件又加强了这种拉力。

把运动向右拉:最重要的起因在于这个运动的发展本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仅由虔诚的信徒所组成,它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过去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接纳了大批工人和中下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译者

层的一些人，而这些支持者当中很多人的主要兴趣在于当前社会民主主义可能带来的各项改革。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总是热衷于数量上的优势。对左派来说，社会民主党得到更多的选票，似乎就预示着革命的到来；而对右派来说，则预示着取得更大的议会实力，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开展改良活动。但是只有在通过进步立法方面取得成就，才能把大批人留在党内。不过这一来，就使党和现存社会联在一起，而把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这个社会的打算置于不显著的地位。况且，一个政党，即使很有力量，如果在大国中不居多数，要在议会活动中取得成就，就必须与其他政党合作，这又是与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过激理解背道而驰的。议会合作与竞选联盟仅一步之差。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竟于不同时期和自由主义者结盟竞选（“左派代表团或联盟”，“大联盟”），这真令左派惊愕。这些竞选联盟提出了如何利用共同胜利的问题，有时就终于计划组织联合内阁。1914年以前，这种做法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确曾遇到极大的阻力，米勒兰事件就是一例。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这一禁忌，社会民主党人才得以加入战时内阁和两次大战期间的联合政府。

外部的影响加强了内部的改良主义倾向。所有国家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把社会民主党人看作维护或争取政治民主的可能的或实际的盟友，有时还看作反对教权主义的文化卫士。不过结成这样的同盟必须具备若干先决条件。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国家干预的原则，以保护贫弱者，因为社会民主党只有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取得成就，才能在他们的拥护者面前

证明自己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是正当的。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党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办法行事，在取得共同的胜利之前支持资产阶级，而随后又用这场胜利所创造的那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①，这样的政党是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政党都不能够也不愿意与之结盟的。因此，左翼自由主义者在越来越乐于接受社会改革的想法的同时，又试图劝说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那种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精神大大缓和下来，以便有可能与之合作。

然而，自由主义者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的盟友，而专注于民主要求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向右转的唯一途径。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前一阶段中，许多保守分子就曾设法与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建立联系，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例如，“托利党—宪章主义者”，自命有社会抱负的路易·拿破仑，与拉萨尔和冯·施韦泽接触的俾斯麦，靠拢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洛贝尔图斯，他们都抱有这样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并非完全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关于“有机”社会的模糊想法也提供了双方修好的某种思想基础。^②

当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保守派的这些成果几乎已经烟消云散，在一些国家仍与社会民主党人结成联盟的保守势力只剩下天主教的政治组织了。这种组织由于教皇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的影响，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5页。——译者

② 在这里，有意思的是，社会主义一词在用来称呼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学派之前，被天主教学者们用来称呼他们所要建立的有机社会，与极端个人主义相对立。

经适应了进步的社会立法的需要。所以在德国，1905年巴伐利亚选举和1907年全国大选时，都曾出现这类联盟。这是两次先兆，预示着1918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天主教“中央”党为保卫魏玛共和国而缔结的联盟，1925年比利时为促进社会改革而缔结的天主教—社会党联盟，以及意大利社会党与人民天主教组织为了不让法西斯分子掌权而试图建立的合作关系，可惜他们的种种尝试都劳而无功。

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向左拉，是由若干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每当阶级关系异常紧张时，例如在一次大罢工期间，社会民主党就易于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其次是留存于社会民主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包含的意思按社会主义运动的说法就是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进行一场最后的革命斗争（咬文嚼字的正统派时常坚持说，必须严肃对待革命的准则）。最后，各国都有一些不民主的制度，例如有限选举权等。这些制度似乎堵死了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合法道路，所以武装革命和革命的群众罢工看来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武器了。

把社会民主主义向左拉的外部力量，大概不如把它向右拉的外部力量那么大。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就摒弃了无政府主义，而且已经相当彻底地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社会民主党普通党员的眼里，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有内奸的嫌疑。但是他们对待无政府主义的产物，即革命的工联主义，却有所区别。工联主义者作为工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拉丁语系的国家里，工联主义者反对议会的态度在社会民

主党的队伍中引起了某种共鸣。社会民主党对米勒兰事件义愤填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因为他们对整套议会把戏及其必然结果——内阁制，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正是革命的工联主义者播下了怀疑的种子。把社会民主党人向左拉的另一股力量来自俄国的民粹派以及后来代表了这个运动的社会革命党。他们的影响由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敌视和鄙弃而减弱，但并未消失。虽然直接受到影响的只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但通过他们，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受到波及。

1905年革命爆发后，俄国的事态对西欧和中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德国党受到的影响最深刻，这不仅仅因为两国地理位置接近。俄国革命通过总罢工粉碎了沙皇政府的抵抗，制定了一部规定建立全国性立法机构的宪法，从而取得了辉煌（虽然只有一部分是持久的）成果。德国在联邦和州这两级都有宪法，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也是在相当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然而在普鲁士州，由于对选举权的财产要求极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由于复杂的联邦制结构，普鲁士议会对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却具有间接而巨大的影响。难道不能成功地运用在俄国卓有成效的战略，摧毁普鲁士的障碍吗？

德国党中很大一部分人热衷于这个想法。鼓吹群众罢工的大多数人是左派，但甚至一些温和派也被卷了进去。而另一方面，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总罢工或群众罢工却有保留，因为这样一来，党就得依附于工会，而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是坚持政治组织的首要地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群众罢工计

划的疑虑增加了；工会反对这个计划；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也认为这件武器可能引出适得其反的结果，会给政府一个镇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借口，还会使自己再也不能在立法机构中找到盟友。到最后，差不多只剩下诸如罗莎·卢森堡这样的极左分子仍支持群众罢工的计划。

群众罢工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对左派是不利的。在关于这个问题产生争论以前，除了被视为起码是半异端的右派与党内其他成员有分歧之外，德国党从表面上看是团结一致的。而争论产生之后，党内出现了三个派别：右派，占多数的中间派和人数很少的左派。换句话说，左派已经孤立于大多数党员之外，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懂得，要提防被驱使去从事冒险行动，那将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末日。在其它国家，俄国事态的这种间接影响不那么明显，但其结果在本质上一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三个派别。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争引起的革命带来的后果是，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多数”、“独立派”和共产主义者这三派，他们与战前最后几年出现的三派显然十分相似。二十年代初期“独立派”与“社会主义者多数”合并（在德国全国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则通过第二国际的残部与维也纳国际的部分人马组成社会主义和工人国际而实现这一合并），似乎是战前右派改良主义者与中间派联合的重演。显然，这种相似绝非偶

然,但这并不能证明,即使不发生战争,战前三派的分化(虽然预示着战后的分离)也一定会导致分裂。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被破坏了,这不仅是由于战争本身,也许更主要的是由于战前那个国际中的一些成员党在不同国家的迥然不同的条件下取得了政权,这样形成一种不利于团结的倾向。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经历了这场严峻的考验之后,比战前既软弱又强大;党内人数减少了,而且对手中又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左派党;但是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脱离却加强了运动内部的团结。由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取得了政府的部分权力,在另一些国家则有可能决定政府的命运,它这时已进入了一个进行必要的实验的阶段:国家机器的效力已不再象战前那样受束缚人民意愿的桎梏所限制,那么怎样才能利用国家机器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呢?

社会民主党在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情况下能够致力于利用这些新出现的种种可能性,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年时间。战后初期的经济动乱断送了意大利的政治民主,并在英国和法国引起了政治观点上暂时的两极分化。对于一个在所有采取政治行动的集团中已不再是最激进的政党来说,这种分化很不利。情况十分严重,危险迫在眉睫,社会民主党只好全力对付,而无暇顾及那些更基本的问题了。1929年后,世界经济发生危机,民主在德国遭到扼杀,可以利用的机会更少了。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及其基本哲学、战略和困境等等,到二次大战前夕,已经比1914年以前更清楚了。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尽管这一点常常

被带有革命的阶级斗争观念痕迹的词句和含糊思想搞得模糊不清。不能把人类看作可以任意摆布的历史工具，这是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则信仰个人的价值。他们所要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应用于经济制度中的人道主义。人作为公民而享有的权利不能中止，这是建立以及必要时改变经济制度的条件。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托洛茨基洞察了这一点。这位在苏联领导人中可能除布哈林之外最深刻的思想家，在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小册子《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中承认，关于目的与手段问题的争论是他自己的主张与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误入社会民主主义迷途的某些前共产党人的观点之间的决定性分歧，而他认为他的主张也可以看作是斯大林掌权以前共产党人的主张^①。

社会民主主义把民主制度奉为唯一能够实行人道主义的政体，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的道德相对论，仅仅保留了它的一些细微的痕迹，因为马克思曾认为一切道德观都有阶级性，尽管这并非他的一贯观点。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也摆脱了马克思从未明确解释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怕思想。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已经参政，他们对政府的行动就要承担责任，这又

^① 然而，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有一方面却会使人有错误的认识。问题不在于目的能否证明某些本来不正当的手段为正当。为了救人生命当然可以违反车辆速度限制法；至少在核时代之前，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为拯救人类自由而发动战争是正当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目的可以证明什么手段为正当，以及是否有些手段，尤其是恐怖主义手段，并不能由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证明为正当，因为（姑且不提其它原因）这些手段伤害了将去建立新秩序的人们。

给自己带来了难题；政府必须制服那些不驯服的公民，至少要用武力威胁外部的敌人。即使在这两方面政府都极力克制，其行动也会使人民遭受苦难，起码会伤害人道主义的感情。况且，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者社会民主党所支持的政府不可能马上取消他们基本反对的全部历史性义务。当德国的某届社会民主党政府命令军队枪杀要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工人时，当英国军队在第一或第二届工党政府指挥下在英帝国各地维护殖民主义统治时，社会民主党人声称他们正在努力创造更人道的社会的言词，就黯然失色了。当社会民主党人出于处在这个仍然充满明争暗斗的世界里而产生的一种责任感，或者由于负有履行与其它政党达成的联合协议的义务，拒绝单方面裁军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外的和平主义者就都认为这种态度是对其原有原则的背叛。

在当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政治生活中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促使政府的行动尽量人道一些。这个道理太复杂，群众是不易理解的。然而，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早在二十年代就表现出来的极其残暴的行为，却帮助了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工人看来，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不是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者，但是只要他们掌握政权，就不会发生极权主义的残暴行为。然而大萧条年代的痛苦生活使很多工人忘记或者忽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教训。

尽管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得许许多多工人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但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有害无利。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看来，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最后阶段的一种表现。因

此他们认为，一个工人的政党和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联合在一起以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除了与非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或者在立法机构中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之外，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领袖找不到其他办法（因为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来抑制法西斯分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布吕宁政府实行容忍政策，法国社会党人与中产阶级的激进派联合并终于组成勃鲁姆内阁^①，以及比利时和斯塔的纳维亚各国出现的类似做法，都是出于这种动机。这些政策遭到工人的反对，其程度在各国差别很大，如对容忍政策的不满就很强烈，而对勃鲁姆内阁的反感则比较缓和。不过，有一个令人恼火的因素始终存在：因为法西斯主义猖獗之日正是大萧条最严重之时，所以大多数联合政府或者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的政府都不能为工人们创造满意的条件。在很多国家，这些政府除了削减福利或者降低工资以外，找不到摆脱财政困境的其他出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党对这些措施负责，不管这种责任是直接的还是由于压制工人的反对意见以使非法西斯主义政府继续执政而承担的。因此，他们一心认为，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不会有什么益处。结果，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确实相信了这一点，因而使共产党人从中渔利。若不是因为共产党人有时也与法西斯分子妥协，在某种程度上结成联盟（这是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先兆），并且至少于1934年以前，在法西斯主义威胁的阴

^① 勃鲁姆内阁甚至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局势，这种局势使苏联和西方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

影笼罩之下，仍然一直把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当作主要敌人，他们本来还会获得更多的好处。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限制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自由，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更加难以找到伙伴，在议会中结成联盟了。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已经用自身的表现证明，只要民主制度还存在，法西斯主义就几乎打不垮他们，但中产阶级的政党则不然，它们的很多追随者已经被法西斯分子争取过去，有些已沦为微不足道的小党了。所以这些政党常常担心，若与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主要攻击目标社会民主党关系密切，它们的损失会更大。况且有些资产阶级政党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总的来说不论是好是坏，至少向它们提供了一个另作选择的机会，从而不一定必须与社会民主党人结盟，或者花费代价来换取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或默认。把这套手法玩弄到底的只有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果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不过，那种认为独裁者们正在“乘着未来的浪潮前进”的看法却是整个这一时期中阻止社会民主党采取行动的重大障碍，也是象法国勃鲁姆内阁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寿命不长的部分原因。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给社会民主党带来好处的首要因素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所产生的结果，而仅仅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而来的一种情况，即自由资本主义会产生累累善果的神话破灭了。这同法西斯政权一样，基本上也是大萧条的产物。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几乎断送了自由经济。杰斐逊思想和杰克逊思想的基本原理与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些想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少许观点结合了起来，成为一种比社会

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还要自相矛盾,并且几乎一样不稳定,但同样行得通的混合物。从这种混合物中则产生出一整套切实的措施和看法,在很多方面与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所做所为相类似^①。若不是有这套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就几乎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欧洲各国政府合作得那么密切。但是在当时,美国国内的动向对欧洲的局势却没有什麼影响,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只好自行奋斗。

社会民主主义的“亚文化群”

在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和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之前,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1918年后才全部完成的运动内部的一些发展进行一番讨论,是必要的。其中占首位的是一直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亚文化群的形成。

工会和合作社与各社会民主党的联系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已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工人个人的经济生活中了。精

^①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发展,这些发展有助于强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除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争论之外(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讨论),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方面对历史所作的解释,至少那种比较偏激的讲法,备受抨击。偏激的讲法倾向于把生产技术的发展当作所有思想和制度发生变化的唯一决定因素。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道德观的独立发展,从而严重削弱了作为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中一个基本部分的道德力量的重要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比利时人亨利·曼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心理学》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技术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所作的批评,影响最大。

神上的共性补充了这一联系的实际原因：不仅是共同的信条，而且还有因共同的事业而遭受的苦难和危险，都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中牢固地树立起一种关于团结的强烈信念。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大家也应该站在一起，这在他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与其影响下的工会和合作社就为了实际的目标而建立起很多组织。它们代表着一种广泛的兄弟关系，一个生活团体。这种结合不仅是出于权宜的考虑，而且还有思想感情的坚实纽带。

一批以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合作社为中心，致力于开展业余活动和提高文化教养的形形色色的工人组织发展了起来，使得这个生活团体逐渐完善了。这就形成了制度化生活的一个完整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几乎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在社会观点相同的人们当中生活。与工会和合作社一样，很多这类组织的建立，不是出于个人或运动的实际需要，就是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其结果却超出了任何只图眼前实际利益的目的。

社会民主党对于建立一支组织者、编辑和议会专家的队伍非常关心。这些人不仅要受到完成技术性任务的训练，而且还要学习共同信条的基本原理；他们还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普通教育，超过国家为他们提供的初等教育的水平。因此，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建立了一套培训制度来教育这批人。社会民主党对于工人业余活动中产生的一些技术服务事业也加以注意。群众集会需要有急救站，“工人行善会”的会员们通常就组织起这些急救站，他们引以自豪的知识是从主要由社会民主党的医生讲授的专门课程中获得的。在竞选运

中,党的指挥部要随时调遣通信员,工人的自行车俱乐部就承担起这项任务。在五一节和类似的场合,工人体育俱乐部和歌咏俱乐部就表演节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民族主义精神至少在德国和奥地利渗透了其他登山俱乐部的时候,工人旅游俱乐部“自然之友社”就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自然之友社”的各个休憩处成了所有受到民族狂热和种族仇恨之风迫害的登山者和旅行者的山中避难所,从而明显地标志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乃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信条。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参加这些或其他工人社团(例如还有剧艺社、读书俱乐部、棋艺俱乐部、殡仪社等)的原因大部分是由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分层造成的。工人们交不起非专为工人成立的俱乐部所收取的会费。并且,由于生活方式和教育程度不同,他们在大部分成员是中产阶级分子的俱乐部里也感到不自在。有些这样的俱乐部,即使工人想要加入,大概也会被拒之门外。工人们建立自己的社团,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们只希望与由共同信念联结起来的人一起进行业余消遣和娱乐活动。

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从事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的社团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那些腐蚀人们的资本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个想法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大的工人剧艺组织,即“人民舞台”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这些剧院在其他私人兴办或政府资助的剧院都回避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潮流时,先后培植起这两种“现代主义的”戏剧,但是这些革新并没有导致独树一帜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终于

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因此，西欧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希望，即工人们除了能找到机会接触现存的中产阶级的文化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作为，被实践证明是与后来那些共产党国家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即“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完全是一种幻想。事实证明，大部分地区的工人甚至不仅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文化方面的各种革新，而且比起中产阶级的一些人来，他们受维多利亚传统束缚的时间还要长久。“人民舞台”之所以起了革新的作用，与其说是观众推动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某些出于政治上的同情而参加到工人组织中去的天赋极高的导演（柏林的欧文·皮斯卡特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努力的结果。不过，在后来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青年工人中的知识阶层开始奋力冲出这个因袭的传统了。

无产阶级的“亚文化群”产生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阶级感情加深了；亚文化群的出现有时被认为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工人们将在旧社会内部孕育起他们自己的社会，这个社会终将冲破障碍而产生出来。另一方面，亚文化群的各个组织使工人们能够接触当代文化，他们在文化方面不再是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了。这样，亚文化群就有助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各个阶级之间教育差异的缩小做好准备。在这方面，可以把工人的文化组织（“文化”一词在这里应从广义上理解，即包括体育运动和其他业余消遣）比作美国的移民团体。那些团体一方面倾向于把移民与当地的社会分开，而另一方面又在新来者还不能以任何其他形式彻底美国化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习惯，通过原籍相同的早期移民的影响，教会他们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的那些移民团体一样，这

些工人社团所起的文化桥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事实上比它们所起的加深阶级隔阂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社会主义的新经济理论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同经济领域有关,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变得特别重要。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而且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这样认为,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似乎是充分利用当代社会可能出现的技术的唯一障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模模糊糊地谈到了可能扩大生产的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根本不同。而这种区别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甚至在富裕的社会里,即使工程师们能够为各种生产制订出计划,可供使用的资源也绝不许可耗用于所有这些生产。这是首要的原因,使得任何社会都一定要把精心筹划的生产活动的产品的经济重要性即价值,拿来与必须投入的价值进行比较;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盈亏核算即簿记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同样重要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二十年中,一些经济学家力图使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一事实,而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文献也表明对这种批评有所接受,尽管这个问题尚未为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党员普遍理解。大战以后,又出现了新的一派批评家,其领袖是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坚决认为,价值只能取决于真正从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买卖的

双方的竞争，从而比起那种认为价值计算是合理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他走得更远了。既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卖主只有一个，即政府，同时至少就生产资料来说，买主也只有一个，还是政府，所以价值数字就只能是任意决定的，并不表示商品的真正的经济重要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利用仅靠一套合理的价值或价格制度就可以提供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将是“盲目的”。

共产党人无视这一论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领会它，但随后就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加以反驳。这些文章部分地回复到战前的那条思考路线。它们说，首先，供与求，自然还有表示商品的经济重要性的价值，可以在没有实际竞争的情况下，通过一方面计算每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计算消费者按其需要和购买力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来决定。第二，甚至在全部生产工具为政府所有的社会里，如果政府的企业的经理人员得到相当大的自主权，并受命努力做到产品价值最大限度地超过投入价值，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那么，也是可以存在实际竞争的。最后，社会主义的价值计算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其数量是可以减少的，方法就是不坚持把所有企业都收归国有，况且，既然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不必触动中、小企业，那就更无须实行全部企业国有化了。

这些论据，尤其是第一点，迫使那些批评家后退了。米塞斯的门徒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承认，原则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是可以计算的，但他又坚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在这一经过修正的形式中，米塞斯—哈耶克的论点

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改进和统计学的进步(当然,这些都是哈耶克在三十年代著述时无法预见的),依靠不可能进行极为复杂的计算这一点来提出的论据,已经不再有说服力了。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来说,这场论战非常重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也可能进行价值计算,并且社会主义生产还得受商品价值的支配,而这种商品价值又与出现在消除了各种不正常影响(例如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商品价值完全相同,这就表明了这两种模式的社会的运转型式并不象前辈著述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具有根本的差别。因此,逐步的、非革命的过渡似乎就更加可行了。另一个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认识到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国有化建议最感不安的,一直是政府权力由此增长而无法控制;即使政府要按法律规定利用经济资源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最想要的而不是政府认为他们应该要的东西,很多自由主义者还是怀疑,在一个全部企业或者哪怕是许多企业都收归国有的社会里,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各种商品的经济重要性能否得到足够清楚的承认,以指导政府制订计划。经济理论方面的那些新的发展有助于驱散此类疑云,因为这些新的发展使以“为消费者服务”为方向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有了具体的含义。

社会民主主义有前途吗?

尽管各个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以经历了法西斯镇压的某一传统的光荣肩负者的姿态出现,但它们很决

就发现自己处于新的危机之中。建设福利国家的趋向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而在二十世纪又大大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这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努力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趋势的发展速度更快了。生产力的提高给所有先进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福利立法实现了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出的很多要求,致使这些要求在工人们的眼中大部分失去了紧迫性。工人们终于获得了不少过去留给上层阶级的舒适条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概念似乎已毫无意义了。况且,在已经实行国有化的国家,象国有化规模相当大的英国和法国,实践都证明国有化只不过是某些情况下有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害的一种办法,当然既非万应灵药亦非某个梦想的实现。

在这种情势下,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或多或少地决心并坚持清除其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因为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只不过是一大堆思想瓦砾了。这是一次必要的牺牲,因为不论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作为一个能统一思想的信条曾有过什么价值,这时候已经消失了。由于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口号,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满足了政治战略的迫切需要,而且使党的领袖的真正信仰与他们在宣传中使用的言词也终于一致起来了。早在1899年,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曾引用席勒的话告诫社会民主党说:“她真的是什么样,就应当敢于以这个样子出现!”换句话说,你们既然是一个从事实际的社会改良,为政治和社会民主而奋斗的党,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摆出一副以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思想为指导的革命者的样子呢?然而直到三十年代,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大量

宣传中，却一直没有去掉那些革命的言词。

不过，摆脱这种言行不一的状况，却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的，因为前述的清除过程所抛弃掉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残余，而且还有党的纲领和目标中最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成分，从而留下了一大片空白。社会民主党仍然保持其深厚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就使它具有相当的独特之处，足以说服大批的，有时甚至是越来越多的选民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而非其他政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没有一个独特的经济纲领，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那么社会民主主义能够制定出一种既保持运动的传统而又对当前有意义的经济纲领吗？

看来只有根据计划经济的思想才可能制订出这样一种纲领。而所谓计划经济，并不是从经济的集中管理，而是从经济的系统预测以及利用这种预测来促进合乎需要的趋势、抑制不合需要的趋势这个意义上说的。当然，预测机构的建立和活动都将是政府的职责，而国家则必须运用各种刺激（例如低息贷款、优惠税率和在极少数情况下发放补助等）来促进合乎需要的趋势，同时运用各种限制（例如提高税率和限制贷款等）来阻止不合需要的趋势。然而，整个经济并不是要硬性接受这些刺激和限制。法国的例子已经证明这套制度是行得通的。南斯拉夫也接近于这个模式。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与叶·利别尔曼的名字相联系的各种趋势似乎慢慢减少了各国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力，迫使它们也采取刺激和限制。因为它们已不能再直接发号施令，而允许各个企业象地道的资本主

义国家企业所做的那样，至少象法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企业在原则上所做的那样，根据反映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的重要性的价格制度，由赢利动机来支配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计算问题的讨论，对上述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经济预测必须既按价值又按物质来进行。例如，需要弄清楚的，不仅仅是可以得到什么、得到多少物质资源来满足想要投入的资本，而且还有这些物质资源的成本，以及消费者的收入是否足以按照成本价格来购买产品。尽管今天已不会有人（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者）想以“纸上”市场或“影子”市场来取代“实际”市场^①，但重要的是要懂得，价格是可以根据已知的或预计的供求而远离实际的市场活动来计算的。当这样来计算是否可能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来时，人们设想，国家将占有全部生产设备，因此将从事至少是生产资料的全部买卖，并将用国家自己的价格计算代替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所得出的价格。今天，已经没有一个非共产党国家（在更小的程度上甚至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打算这样做了，但政府机构却有必要对适应于预期的供求的价格进行预测。价格预测以可能脱离买卖来计算价格为先决条件，这种可能性，对于不等很有可能的价格在

① 如果在实际意义或比喻的意义上把市场确定为一个场所，在这里供与求相遇，那么，通过以统计调查或估计为基础绘制的供求曲线，市场概念也可以应用于纸面上的供求相遇。为了把这个意义上的市场和真正的买卖双方相遇的市场区分开，“纸上”市场和“实际”市场这两个提法似乎是合适的。“影子价格”这个名词已为经济理论所广泛采用，以表示“纸上”市场中的价格，所以把“纸上”市场称为“影子”市场是不矛盾的。

实际市场活动中出现就必须加以掌握的政府机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想要知道合理价格以便在整个经济中实行的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有组织的经济预测的益处，即便不是毫无争议，至少也是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怀疑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虽然关于这种预测从前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早已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成分了。而且看来至少可以想象，对计划经济的强调或许会在现已主要是欧洲的运动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各洲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亚、非两洲的大多数社会党都不再和西欧的党同属一个国际组织，现在另有一个“亚洲社会党会议”，其中有一些非洲的联系组织。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人既是这一组织又是主要包括西欧、英联邦和美洲各国的党的“社会党国际”^①的成员。前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人另立门户，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地位，这是几乎无法挽回的了，但是只要这两个国际组织建立友好关系，也将有利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就经济预测和根据预测采取的行动这一意义上来说，计划经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被看作是它们希望达到同欧洲和北美一样的富裕水平的手段和象征。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带头提出在自由制度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则和方法，那么，在具有自己的古老传统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那些正在探索以求赋予自己的社会主义以具体内容的各个新国家的那些组织之间，或许

^① 社会党国际重建于1951年。东欧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目前正过着流放生活，这些党也得到该国际的承认。

就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目标。

这样一来，如果摆脱了经济专制主义的所有要素，计划经济这一想法似乎确实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新的经济纲领的核心。但是，计划经济的概念能够具有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所必需的那种感情力量吗？这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专家们向正在探索不发动群众而进行改革的可能性的广大学者推荐的思想，是不同的。取消资本家的利润，或者剥夺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来资助社会改良，这个主张投合下层阶级的自私心，也符合更广泛阶层的正义感。改进经济机构的活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这类计划在象三十年代那样的萧条时期，即所谓“物质丰富而人们挨饿”的时期，曾经有过强烈的吸引力。实行计划经济的建议，尽管当时还不成熟，但在很多国家却几乎比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建议更得人心，因为对于受苦受难的群众来说，找到工作比起以减少利润来获得较多工资，似乎更为重要。但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长期繁荣的时代。群众难道会对改进一部显然运转正常的经济机器感兴趣吗？当然，经济科学可以指出情况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真正令人满意的种种原因。过去一直引起衰退和萧条的各种因素至今还未消失，尽管我们已经学会缓和其影响；甚至在繁荣时期，在富裕的社会中也有贫穷的孤岛出现。国与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生活水平上的地区差异；这些差异即使在绝对意义上丝毫不比从前大，但也在引起更大的不满了。计划经济虽然不是万应灵药，但还是可以为采取补救措施以解决所有这些潜在的和实际上的失调现象开辟道路的。不过，计划经济的潜力即使能够给经

济学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前，它能够吸引群众的兴趣吗？

人们也许会问：社会民主主义要是没有经济纲领，就会衰落下去以至终于消亡，为什么这将是极大的不幸呢？一个政党或一个运动在它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大部分纲领的时候就不再存在下去，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已经接近实现的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要求。尽管法西斯主义已被打败，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倡导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却至今还没有获胜。社会民主主义没有经济纲领就几乎无法生存，可是目前它的主要历史作用不在经济方面，而是使社会人道化。社会民主主义并不垄断这个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作为为此目标而奋斗的一支力量，尚无别的力量取代它。

（译自卡尔·兰杜埃，《革命的国际，1864—194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